

奇特的一生

【精装珍藏版】

柳比歇夫坚持56年的“时间统计法”

〔俄〕格拉宁/著 侯焕阁 唐其慈/译

用一生实践“时间统计法”的男神——

柳比歇夫

激励无数人追求高效而有意义的人生

随书附赠导读手册

《如何阅读<奇特的一生>》

**收录李笑来、秋叶、战隼
邹鑫、吴刚、知乎大V张兆杰
深度好文**

**帮你学会、用好“时间统计法”
找出时间黑洞，过上很好的一生**

版權信息

奇特的一生

作 者：〔俄〕格拉寧

譯 者：侯煥閱 唐其慈

責任編輯：張 萌

ISBN：9787550272149

品 牌：磨鐵數盟

關注我們的微博：@磨鐵閱讀

關注我們的微信：motieyuedu

問題反饋：mtsmapple@motie.com

網 址：<http://www.motie.com/>

本電子書版權歸北京磨鐵數盟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所有，未經版權方許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發行、傳播等行為，禁止私自用於商業用途，違者版權方將追究其相應法律責任。

目 錄

[版權信息](#)

[編者的話](#)

[第一章 柳比歇夫一生的秘密](#)

[第二章 崇拜者眼中的柳比歇夫](#)

[第三章 令人驚歎的一生](#)

[第四章 發現「時間統計法」](#)

[第五章 精確感知時間](#)

[第六章 緣起：一生的奮鬥目標](#)

[第七章 人生的容量](#)

[第八章 時間之鏡](#)

[第九章 時間統計法的勝利](#)

[第十章 光亮的背面](#)

[第十一章 井井有條的生活](#)

[第十二章 一切皆有代價](#)

[第十三章 瞭解一個人，就要看到他的矛盾](#)

[第十四章 比時間更寶貴的](#)

[第十五章 成為時間的朋友](#)

[第十六章 超越自己的可能](#)

[附錄 與時間統計法無關——談《奇特的一生》的創作](#)

編者的話

最初知道《奇特的一生》，是通過李笑來《把時間當作朋友》一書，該書講述蘇聯科學家柳比歇夫將自己的一生用時間來計劃。怎麼看都覺得此人必是奇葩，每天都記錄自己哪塊兒花了多長時間，豈不是要把自己累死？而看到笑來老師採用「時間統計法」規劃生活的效果，並慶幸遇到柳比歇夫這樣一位了不起的老師時，我習慣性的挑剔與漫不經心閉嘴了。

於是到處去找全文來看，找來找去只從網上找到電子版，初看時覺得真夠無聊的，怎麼還不進入「時間統計法」的主題呢？忍著看了十幾頁，差點就放棄了。熬過前兩章後，開始覺得有意思了，再看每一頁，覺得都像遺落的珍珠，平實、樸素的文字熠熠生輝。讀書向來會產生焦慮的我，讀《奇特的一生》安靜了下來。

看完書，我開始尋找這本書的譯者。不太好找，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一篇名為《日常生活中的極樂島》的博文中找到了譯者的名字，他是老翻譯家侯煥閱，而博主張寧是他的學生。張寧又恰好是我大學同學閻方博的研究生導師。這些巧合，現在想來真是非常有趣，也感謝每一個默默為我提供幫助的人。

2012年的一個雪天，我登門拜訪侯老師，80歲的老先生精神矍鑠，精神頭十足地跟我講這本書中文譯本的由來。1978年，侯老師跟唐其慈老師摘譯了一部分，由北師大蘇聯文學研究所當作內部材料刊登出來，反響很大，1979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全文出版。這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中國出版的第一本蘇聯文學作品。據說當時廣受歡迎，印刷量超過14萬冊（暢銷書啊）！

遺憾的是，自從2001年海燕出版社出版該書後，就再沒有新版本了。得知2013年再版的消息，兩位老師一直激動地對我說謝謝，而我早感動得一塌糊塗了。

類似於我這樣的讀者，在豆瓣上到處都是。一本絕版近15年的書，豆瓣上評分8.5，2600+的人評價，7000+的人想讀，真令人驚訝。這也說明，這麼一本幾乎遺失的明珠般的書，自己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人們通過口碑不斷傳遞著好內容。

作為一個從來都不知道時間花到哪裡去了的傢伙，我也嘗試做時間統計。剛做了沒幾天，就放棄了。真的，「時間統計法」一點都不稀奇，甚至太過枯燥了。而柳比歇夫能56年如一日地堅持，為什麼？

其實，這跟技巧無關，而跟人生志向、人生目標密切相關。因此，本書對我們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於時間管理，而在於引發人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究竟該如何規劃，就像作者格拉寧結尾時說：「看來應當由每個人自己來制訂自己的時間使用法，但不管怎樣都應當深思一下自己的生活怎樣度過。」

或許，我們永遠學不會用時間統計法，永遠不能成為柳比歇夫這樣一個人，但至少，我們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光輝的人曾經存在過，他自己設定了很好的一生。好像在茫茫人海中，看到這樣一個人，你覺得，甚至自己都亮了。

第一章 柳比歇夫一生的秘密

我確實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我的主人公的日記和文檔，從中得到的一切，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新發現，使我參透了一個人一生的秘密。

這個秘密是——怎樣才能生活得更好。

談這個人的事，很想做到實事求是，又想寫得生動些。這兩個要求很難捏到一塊兒。只有在「不一定要實事求是」的時候，事實才會叫人感興趣。本來嘛，可以想辦法發明一種新穎的手法，用它把事實炮製成引人入勝的情節，有秘密，又有鬥爭，又有險風惡浪，同時又翔實可靠。

比方說，很容易把這個人寫成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孤膽戰士，單槍匹馬對付強大的對手，獨個兒對著大夥兒干。更精彩的是大夥兒對著他一個人干，以強凌弱，一下子讀者就會同情他。可是事實上，恰恰是他一個人對著大夥兒干，是他主動進攻的，是他先跳出來開火的。他的學術鬥爭，意義相當複雜，相當成問題。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學術鬥爭，誰也不會落個絕對正確。自然嘍，也可以替他把事情弄得簡單些，編上一套。不過，這樣一來，就不好用他的真名實姓了，其他許多人的姓名也該一筆抹去。結果，誰也不會相信我的故事。

其次，我想對這個人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特別是現在他已經去世了，更有必要這樣做。

我想叫大家看看：人是多麼了不起，看看我們這裡有多麼出色的人。

真人真事當然是有妨礙的，捆住了手腳。虛構的人物好辦得多。虛構的人物任人擺佈，並且纖毫畢露——他的一切想法和意圖，他的過去和未來，作者都一清二楚。

另外，我還有一個任務：向讀者灌輸一些有用的知識，介紹些材料。這些知識，不用說，會令人驚詫莫名，但遺憾的是，對於文學作品並不相宜，倒是適合於科普小品。《三個火槍手》¹的半當腰，如果插進一段介紹劍術的文字，你看該多麼煞風景，讀者肯定會跳過這幾頁。我可是得讓讀者看我介紹的知識，因為這恰恰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希望看這本書的人越多越好，我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寫這本東西的。自從我發現了我的主人公的主要秘密之後，我就開始構思。

至於秘密，也大可利用一下。一說到秘密，總能吸引人，何況這一秘密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我確實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我的主人公的日記和文檔，從中得到的一切，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新發現，使我參透了一個人一生的秘密。

然而，說老實話，這一秘密並沒有驚險百出的情節，沒有跟蹤追擊，沒有陰謀詭計，也沒有險灘暗礁。

我開門見山地說清楚：

這個秘密是——怎樣才能生活得更好。

在這個問題上，我也很可以激發讀者的好奇心。我可以宣佈：「這玩意兒是最佳生活方式，最有教育意義的樣板，提供了某種獨一

無二的生活方法。

「任何領域，任何職業，本方法均能使你取得重大成果！

「即使才能十分平庸，本方法仍可保證你取得最大的成就！

「你學到的方法並不抽象，而是可靠的，經過多年的經驗驗證，切實可行，行之有效.....

「消耗最小，效果最大！

「舉世無雙，首屈一指！」

.....

我也可以向讀者預告，我要談的是一位當代的傑出人物，是他們沒有聽說過的。我要描繪一位精神上的英雄，他的道德信條是如此崇高，以致如今看來似乎是不合時宜了。他的一生，表面上再平凡不過，從某幾點上說，竟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以小市民的眼光看，他是個典型的不走運的人。然而就生活的內涵而論，這個人心靈和諧，很幸福，而且他的幸福是一種最高級的幸福。老實說，我原來以為這種氣質的人已經絕種了。他簡直是恐龍.....

好比拓荒者發現土地，好比天文學家發現星座，作家也有發現人的福氣。性格和典型性讓一些作家有過一些偉大的發現。岡察洛夫發現了奧勃洛摩夫，屠格涅夫發現了巴扎洛夫²，塞萬提斯發現了唐吉訶德。

這也是一個發現。他不是普遍性的典型，算是我個人定義的典型；與其說是典型，不如說是理想人物。不過，這個詞也不貼切。柳比歇夫當理想人物也並不合適.....

我坐在一間不舒服的大教室裡。沒有燈罩的電燈刺人眼睛，照亮了斑白的鬚髮、禿頂、研究生們朝後梳得服服帖帖的頭髮、亂蓬蓬的長髮，還有時髦的假髮、黑人們漆黑的髻發。教授們、博士們、大學生們、記者們、歷史學家們、生物學家們……最多的是數學家，因為就是在數學系開的會——哀悼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的第一次紀念會。

我沒有料到會來那麼多人，特別是青年。他們來可能是出於好奇心，因為他們不大瞭解柳比歇夫，不知道他是搞生物的還是搞數學的。是個半瓶子醋，還是個業餘愛好者？好像是業餘愛好者。可是業餘愛好者又怎麼著？圖盧茲的郵局職員——偉大的數學家費爾馬³不也是業餘愛好者？貝色麥⁴也不是專門搞煉鋼的，同發明煉鋼新工藝的托馬斯⁵一樣；托馬斯不過是警務法庭的一個辦事員。柳比歇夫是個什麼樣的人？不是活力主義者便是實證主義者，再不然是唯心主義者。反正是左道旁門。

連做報告的人也沒有說清楚。

一些人認為他是生物學家，另一些人說他是搞科學史的，也有人認為他是昆蟲學家，還有人說他是搞哲學的……

每一個做報告的人都介紹了一個新的柳比歇夫，與旁人介紹的迥然不同。各有各的說法，各有各的評價。一部分人把他說成是革命者，是造反派，敢於向進化論、遺傳學的某些牽強附會的定理挑戰。

另外一部分人描繪了一位最善良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形象，對待對手寬宏大量得無邊無際。

「……不論哪一種哲學，其中切實的批判性和創造性的思想，他都很重視！」

「.....他的力量在於不斷地開動腦筋；他提出問題，他激發思想。

「.....某一位偉大的數學家說過：『天才的幾何學家提出定理，高明的幾何學家證明定理。』他就是這樣一個提出定理的人。

「.....他的精力過分分散。他本來應當集中搞分類學，不該馳心旁鶩於哲學問題。

「.....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是精力集中、富於創造精神、有明確目標的樣板，他一生貫徹始終.....

「.....數學家的稟賦決定了他的世界觀。

「.....他在哲學上知識淵博，所以能就物種起源問題提出新的見解。

「.....他是個唯理主義者！

「.....唯物主義者！

「.....幻想家，往往迷途忘返，是個直覺主義者！」

他們同柳比歇夫是多年之交，對他的著述也瞭解有加，但每個人都只是介紹了他們所瞭解的柳比歇夫。

他們過去當然也知道柳比歇夫博學多才，可是只有到現在，聽了旁人的介紹，他們才明白，他們瞭解的柳比歇夫，只是他的部分面貌。

在這次紀念會之前，我花了一個星期閱讀他的日記和書信，探究他的腦力活動史。我開始只是泛泛地瀏覽。無非是些別人的信件，無

非是些寫得挺好的文字，表露了別人的心靈，記錄了別人往昔的憂慮以及已經成為過眼煙雲的憤怒。這種憤怒之情，我也是涓滴在心，因為我也想過同樣的問題，只是沒有想到底.....

用不了多少時間，我就相信自己過去並不瞭解柳比歇夫。認識倒是認識，同他見過幾次面，我知道他是一位難得的人才，但是他的個性如此恢宏開闊，卻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懷著羞愧的心情回想起：我過去竟把他看成是個怪人，一個聰明可愛的怪人；我很痛心，錯過了許多同他促膝相對的機會。有多少回，我打算到烏裡揚諾夫斯克去看他來著，我以為來日方長。

不知是第幾次了，生活教我對什麼事都不要因循拖延。仔細想想，生活實在是個任勞任怨的好當家，它一次又一次地給我機會，安排我同許多當代最有意思的人物見面。可是我不知忙些什麼，來去匆匆，不斷拖延，以致失之交臂。我拖拖拉拉是為了什麼？忙些什麼？當初瞎忙的那些事，如今看來是那麼渺小，而損失是那麼慘重，主要是再也不能挽回彌補了。

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大學生聳聳肩膀，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講話的人聚訟紛紜，他沒有辦法統一起來。

柳比歇夫去世不過才一年，大家就弄不清楚他實際上是個什麼樣的人了。

死者是屬於大家的，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做報告的人從柳比歇夫身上挑出他們喜歡的東西來講，再不然就是選擇他們需要的東西來做他們的論據。年復一年，他們塑造的柳比歇夫的各種形象會融合成某種中性的東西，說得確切些，融合成一種人人都能接受的折中的東西，沒有矛盾，沒有難解的謎，給磨平了稜角，很難辨認出原型。

然後，人們會對這個折中的形象加以解釋，判斷他的錯誤所在，確定他在哪些方面走在他的時代前面，把他的形象變得人人都十分理解，然而並不真實。

當然嘍，這還得看他就範不就範。

講台上方，掛著一幀鑲在黑框裡的巨幅遺像——一個禿頂老頭兒，皺起蒜頭鼻子，在搔後腦勺。他啼笑皆非地看著，不知是看著聽眾還是看著講話的人，彷彿是在考慮怎麼再干它一傢伙。明擺著，所有那些自作聰明的講話和議論，如今都同他風馬牛不相及了。他已經作古，我再也見不到他，可我又那麼需要他。我太習慣於他在世時的情形。當初，我知道什麼地方有那麼一個人，什麼事情我都可以同他談，什麼事情我都可以同他爭論。那時，我一念及此便感到心滿意足。

人一死，許多事情真相大白，許多事情便見分曉。我們對死者的態度，也能夠蓋棺論定了。我從做報告的人的發言中感覺到這一層意思。他們的發言很明確。在他們眼裡，柳比歇夫的一生已經結束，現在他們打算對他的一生通盤推敲一番，做出定評。不言而喻，事到如今，他的許多思想將得到公認，許多著作將出版或再版。不知道為什麼，死者比生者有更多的權利，有更多的機會……

我也可以這樣辦：先跟讀者打個招呼，說明本書索然無味，連篇累牘都是枯燥的，純粹是事務性的散文，連散文都談不上。作者很少花功夫去潤色雕琢，叫讀者看著舒服。作者本人對這些材料也感到很棘手。對這部作品的體裁，作者自己也覺得彆扭。作者之所以要如此這般，原因將在作品結尾中交代。

要點

·柳比歇夫最大的秘密是——如何生活得更好。

第二章 崇拜者眼中的柳比歇夫

柳比歇夫有他的崇拜者，有擁護者，有景仰者，也有讀者。他沒有學生，只有私淑弟子。也就是說，他並沒有教他們，是他們向他學習。學習什麼呢？很難說。主要是學習應當怎樣生活、怎樣思考吧。似乎咱們總算找到了一個人，他知道他活著是為了什麼，有什麼目的……彷彿他有什麼崇高的目的，甚至可能領悟了他存在的意義。

他的崇拜者對他所表現出的傾慕和熱忱，早就叫我瞠目結舌。他們在紀念會上，並不是破題兒第一遭使用那些形容得似乎誇大其詞的字眼。過去，每當他來到列寧格勒⁶，總有人歡迎，有人陪同，在他的周圍總有一大幫人簇擁著。人們爭先恐後，把他拖到五花八門的研究所去講學。在莫斯科也是這樣。幹這種事的人，並不是那些喜歡起哄的人，並不是新聞記者（他們專門發掘未成名的天才：確實有這樣的人），恰恰相反，那都是些嚴肅的學者、年輕的博士——極其精密的科學方面的博士，是寧願打倒權威而不願樹立權威的懷疑派。

在他們的眼裡，柳比歇夫能算老幾？似乎無非是一個小地方的教授，烏裡揚諾夫斯克什麼地方的，一不是獎金獲得者，二不是學位最高評定委員會委員……他的學術著作呢，確實得到的評價頗高，但有些數學家比他更有份量，有些遺傳學家比他更有貢獻。

是因為他學識淵博嗎？他確實博學，但在我們這個時代，學識淵博足以使人驚奇，卻不能令人心悅誠服。

是因為他的原則性和膽量嗎？當然是嘍——他不乏大膽的創見。

可是，拿我來說，對這些大膽的創見，只有少數幾處能夠擊節讚賞；大多數人對他的專門研究不甚瞭解……柳比歇夫發現了鑒別三種名叫海托克涅姆的昆蟲類屬的最好方法，但這同他們有什麼相干？我不明白海托克涅姆是什麼，至今沒有搞懂。對鑒別功能也毫無概念。然而，難得的同柳比歇夫的幾次會面仍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我扔下自己的工作，跟隨他，接連幾小時傾聽他速度很快、發音難聽、像他的筆跡一樣含混不清的講話。

這種愛慕之情和強烈的興趣，叫我想起了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季摩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想起列夫·達維陀維奇·蘭道和維克多·鮑裡索維奇·史克洛夫斯基⁷。自然，那會兒我知道他們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的出類拔萃是大家公認的。柳比歇夫可沒有這樣大的名氣。我見過他平日的樣子，頭上沒有任何光環：衣著寒酸的一個老頭兒，體態臃腫，其貌不揚，對文壇形形色色的奇聞逸事懷著小地方人的那種興趣。他的魅力又在什麼地方呢？乍看起來，吸引人的，是他在觀點上標新立異。他所說的一切，似乎都是離經叛道的。最最不可動搖的原理，他都能提出懷疑。他不怕冒犯任何權威——達爾文、季米裡雅澤夫、泰雅爾·德·夏爾頓、施遼丁格⁸……論據每每從別人沒有想到過的地方突然冒出來。顯而易見，他絲毫沒有摭拾別人的牙慧。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深思熟慮的結果，並經過他自己的驗證。連講話都是用他自己的字眼，並且用這些字眼的原始意義。

「我是個什麼人？我是個狄列坦特⁹，雜家狄列坦特。這個詞出自意大利文的『狄列托』，意思是愉快。這是指這樣一種人，他不管幹什麼工作，只要幹起來便會感到愉快。」

標新立異僅僅是表面現象，從中可以推測到一整套世界觀體系，某種不平常的東西，猶如一座睥睨天空的巨型建築的輪廓。這座尚未落成的建築，形狀奇特，引人入勝……

但，這仍然不足以說明問題。這個人還有別的什麼魅力，不僅僅吸引了我。向他求教的，有教師、囚犯、科學院院士、藝術理論家、新聞記者、農學家以及我不知其身份的人。他們的來信我沒有看過，我看過柳比歇夫的回信。詳盡、認真、暢所欲言，有的寫得妙趣橫生。每封信都文如其人。可以感覺得到他的不落俗套、獨行其是。通過他的信，我更理解了我自己的感情。他在信中似乎比當面打交道時更能推心置腹，至少我現在是這樣想的。

他幾乎沒有學生，這不是偶然的。雖然許多創立了整個流派和學說的大科學家也大抵如此。愛因斯坦也沒有學生，門捷列夫和洛巴切夫斯基¹⁰也沒有。學生和學派，並不是常見的事。柳比歇夫有他的崇拜者，有擁護者，有景仰者，也有讀者。他沒有學生，只有私淑弟子。也就是說，他並沒有教他們，是他們向他學習。學習什麼呢？很難說。主要是學習應當怎樣生活、怎樣思考吧。似乎咱們總算找到了一個人，他知道他活著是為了什麼，有什麼目的……彷彿他有什麼崇高的目的，甚至可能領悟了他存在的意義。不僅僅是過一種合乎道德的生活，不僅僅是問心無愧地工作，似乎他明瞭他所作所為的內涵。顯然，這只適用於他一個人。艾伯特·施維采爾¹¹並沒有呼籲任何人到非洲去當醫生。他選擇了自己的道路，選擇了用自己的方法去身體力行自己的原則。然而，施維采爾的榜樣仍然觸動了人們的良知。

柳比歇夫有他的歷史，不是很清楚，大部分被雲霧籠罩著。雲霧到如今才開始消散，但一直可以感到它的存在。不管怎麼說，撇開他的言行，他的智力和靈魂超越了一切已知的物理定律，具有一種特殊的放射性……靈魂越高尚，給人的印象越強烈。

要點

·柳比歇夫清楚自己活著的目的，在28歲時就設立了人生目標。

第三章 令人驚歎的一生

我感興趣的是另一個問題：他，我們同時代的人，一生幹了那麼多事，產生了那麼多思想，這是用什麼方法達成的？最後幾十年（他是82歲時去世的），他的工作精力和思維效率有增無減。關鍵不是在數量上，而在他是怎麼樣，用什麼方法做到的。柳比歇夫對我最有吸引力的精粹、核心正是這個方法。

柳比歇夫的遺產

所有的人，連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親近的人在內，誰都沒有想到他留下的遺產有多大。

他生前發表了70來部學術著作。其中有分散分析、生物分類學、昆蟲學方面的經典著作，這些著作在國外被廣為翻譯出版。

各種各樣的論文和專著，他一共寫了500多印張。500印張，相當於12500頁打字稿。即使以專業作家而論，這也是個龐大的數字。

科學史上，艾勒、高斯、赫爾姆霍茨⁶²、門捷列夫都曾留下巨大的遺產。對於這種遺產，我老是迷惑不解。這一點很難解釋，但也挺自然——古時候，人們寫得比較多。至於今日的學者，出版多卷本的全集是一種罕見的甚至奇怪的現象。連作家似乎也寫得比過去少了。

柳比歇夫的遺產包括幾個部分：有著作，探討地蚤的分類、科學史、農業、遺傳學、植物保護、哲學、昆蟲學、動物學、進化論、無神論；此外，他還寫過回憶錄，追憶許多科學家，談到他一生的各個階段以及彼爾姆大學……

他講課，當大學教研室主任兼研究所一個室的負責人，還常常到各地考察。20世紀30年代他跑遍了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去過許多集體農莊，實地研究果樹害蟲、玉米害蟲、黃鼠……在所謂的業餘時間，作為「休息」，他研究地蚤的分類。單單這一項，工作量就頗為可觀：到1955年，柳比歇夫已搜集了35箱地蚤標本，共13000只。其中5000只公地蚤做了器官切片，總計300種。這些地蚤都要鑒定、測量、做切片、製作標本。他收集的材料比動物研究所多5倍。跳甲屬的分類他研究了一生。這需要特殊的深入鑽研的才能，需要對這種工作有深

刻的理解，理解其價值及其說不盡的新穎之處。有人問到著名的組織學家聶佛梅瓦基，他怎麼能一生都用來研究蠕蟲的構造，他很驚奇：「蠕蟲那麼長，人生可是那麼短！」

他的工作方法是一個創舉

柳比歇夫的治學，博大精深，既是一個狹隘領域的專家，又是個雜家。

他的知識面究竟有多廣，是很難測度的。談起英國的君主制度，他能夠說出任何一個英國國王臨朝秉政的細節；說到宗教，不管是《古蘭經》、猶太傳經，還是羅馬教廷的源流、馬丁·路德的學說、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他都如數家珍。他懂復變數理論、農業經濟、羅·費歇¹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古希臘、古羅馬，天知道他還精通些什麼。這，不是他要當萬寶全書，不是死背硬記，他之所以獲取這些五花八門的知識，是有原因的，下文自有交代。我說，他的坐功當然也是極好的。坐功好，不也是某些天才的特點嘛。說起來，這種本事在昆蟲學之類的專業中頗為普遍，同時也是必需的。柳比歇夫自己就說過，他屬於這樣一類學者，給他們照相，不該照臉，該照臀部。

根據列夫·貝爾格、尼古拉·瓦維洛夫、弗拉基米爾·貝克列米捨夫¹³這一流專家們的反映，柳比歇夫的著作很有價值。今天，他的一些離經叛道的見解已升到有爭議的等級，一些有爭議的見解已升到無可爭議的等級。對於他的學術聲望乃至榮譽，大可不必擔心。

我不打算通俗地闡述他的思想或衡量他的貢獻。我感興趣的是另一個問題：他，我們同時代的人，一生幹了那麼多事，產生了那麼多思想，這是用什麼方法達成的？最後幾十年（他是82歲時去世的），他的工作精力和思維效率有增無減。關鍵不是在數量上，而在他是怎麼樣，用什麼方法做到的。柳比歇夫對我最有吸引力的精粹、核心正是這個方法。他的工作方法是一個創舉，不問他其餘的工作和研究如何，這種工作方法是獨立存在的。從表面上看，這是純技術性的工作

方法，一點也不起眼。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幾十年來它取得了精神上的力量。它成為柳比歇夫生活的骨架，不僅保證了最高的效率，而且保證了最旺盛的生命力。

修飾語是沒有計量單位的，甚至對一些永恆的一般性的形容詞——善的、惡的、真誠的、殘酷的，我們也會手足無措，無可奈何，不知道該同什麼比較，不知道該怎樣理解。誰是「實在善良」？誰「挺善良」？真正的「正派」是什麼意思？這些品質的標準又是什麼？柳比歇夫不僅僅自己過著合乎道德的生活，他對這種道德似乎有一些精確的標準，是他自己規定的，並且同他的生活方式有著某種聯繫。

要點

- 柳比歇夫既是個專家，也是個雜家。
- 時間統計法不僅保證了高效率，還保證了柳比歇夫旺盛的生命力。

第四章 發現「時間統計法」

他認為他那些本本是「時間統計」。好比賬簿，他是在用他的方法統計支出的時間。

我發現，每個月到月底他都要做小結，畫了一些圖，列了一些表。到年終，又根據每月小結做一份年度總結，列出一覽表。

令人歎為觀止的編號文檔

還在柳比歇夫生前，誰見過他的文檔都免不了驚愕。他的文件都編了號，裝訂成冊，好幾十、好幾百本。學術通信，事務信函，生物學、數學、社會學的教案，日記，論文，手稿，他的回憶錄，他妻子奧爾珈·彼得羅夫娜·奧爾裡茨卡婭（她花了好多力氣整理這些文檔）的回憶錄，筆記本，札記，學術報告，照片，書評……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信件、手稿都用打字機重新打過，副本訂了起來——不是出於虛榮心，不是為了傳諸後世，絲毫沒有這個意思。大部分文檔是柳比歇夫自己要經常使用的，其中包括他本人書信的副本，原因在於他的書信獨具一格——怎麼個獨具一格，下面再說。

文檔彷彿記載收錄了柳比歇夫事業與家庭生活的各個方面。把所有的紙片、所有的著述和信札以及1916年開始記起的日記統統保存下來——這是我前所未見的。一個傳記作家不能有更大的奢望了。柳比歇夫的生活和它的蹉跎曲折，可以一年年甚至一天天地複製，簡直可以一小時一小時地回顧。據我所知，柳比歇夫從1916年開始記日記，一天也沒有間斷過。在革命的歲月裡，在戰爭的年代中，住院也罷，在出門考察途中的火車上也罷，始終堅持不懈。看來，沒有任何原因、任何事件、任何情況能不讓他在日記中寫上幾行。

曾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稱為俄國天才思想家的尼古拉·費道羅夫，幻想使死者復生。哪怕有一個人死亡，他都不甘心。他得到各個學術中心的幫助，企圖收集瀾散的分子和原子，以便「把它們合成先人的軀體」。他的離奇的博愛眾生的思想，包含著對死神的激烈的抗議，說明他不能容忍死神，不願屈服於盲目的分解力——大自

然。如果我們按照費道羅夫的意思去再現柳比歇夫，或者說，使柳比歇夫「復活」，做起來大概比其他任何一個人的「復活」都要容易、準確。因為有大量的資料和材料；換句話說，數據很多。他的一切空間和時間坐標都可以複製——某一天他在什麼地方，都幹了些什麼，看了些什麼書，都見到誰了，到哪兒去了。

他的文檔中，我最感興趣的，自然是他的日記。

時間開銷日記

作家往往受到日記的誘惑。探索別人的心靈，涉足它的隱秘世界，觀察它的歷史，以它的眼睛去看時間——這一切，作家都是心嚮往之的。任何一本日記，只要一年年認真地記，都是文學的珍貴材料。「任何一個人的生活都使人感到有興趣，」赫爾岑寫道，「不是他的生活，便是他的環境、他的國家引人入勝，生活引人入勝。」日記要求不高，只要求老實、有思想和意志。文學才能有時候竟會妨礙目擊者的陳述做到公允客觀。未經雕琢的、最最樸實無華的記載日常生活的日記——不知道為什麼，如今是那麼少……歲月流逝，驀地發現，一些歷史性、全民性的事件，雖然大家都是親身經歷了的，雖然影響到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同時代人的記述卻貧乏得可憐。日記是最緊要的文獻，而記述列寧格勒被圍的日記竟是屈指可數。一部分明擺著被毀了，也有一部分散失了。不過當時記日記的確實也不多，苦也就苦在這上頭——日記總嫌數量不夠。

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的日記並沒有全部保存下來。他1937年以前的文檔，包括日記，戰時在基輔丟失了。第一冊日記合訂本倒是保全了——一本大賬簿，用打字機打的，字是紅藍兩色，打得挺漂亮，日期起自1916年1月1日。1937年以後直至他臨終前最後幾天的日記，共有幾大厚冊：已不是賬簿了，而是用練習簿訂起來的，後來又裝訂過——都是自己動手幹的，不太美觀，但很結實。

我翻著他的日記，一會兒看看1960年的，一會兒看看1970年的，瞅一下1940年，看一眼1941年——哪一年都是一模一樣，千篇一律。天哪，實在談不上是什麼日記。哪一天都是一篇短短的明細賬，記著當天幹過的事，註明用了幾個鐘頭幾分鐘，還注了些莫名其妙的數

字。我看看戰前的日記，也如出一轍。沒有記敘，沒有細節，沒有思考——一般構成日記中心內容的那些東西一概不見。

烏裡揚諾夫斯克。1964年4月7日。分類昆蟲學（畫兩張無名袋蛾的圖）——3小時15分。

鑒定袋蛾——20分（1.0）。

附加工作：給斯拉瓦寫信——2小時45分（0.5）。

社會工作：植物保護小組開會——2小時25分。

休息：給伊戈爾寫信——10分；《烏裡揚諾夫斯克真理報》——10分；列夫·托爾斯泰的《塞瓦斯托波爾故事》——1小時25分。

基本工作合計——6小時20分。

烏裡揚諾夫斯克。1964年4月8日。分類昆蟲學：鑒定袋蛾，結束——2小時20分。開始寫關於袋蛾的報告——1小時5分（1.0）。

附加工作：給達維陀娃和布裡亞赫爾寫信，6頁——3小時20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鬚子。《烏裡揚諾夫斯克真理報》——15分，《消息報》——10分，《文學報》——20分；阿·托爾斯泰的《吸血鬼》，66頁——1小時30分。聽裡姆斯基·柯薩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基本工作合計——6小時45分。

幾十、幾百頁都是這種枯燥無味、事務性的記載，每天五至七行。如果不是搞昆蟲學，那就是連著幾個月記著寫那本大書《文化史上的德謨克利特和柏拉圖兩個流派》，或者是《形態學的發展》，或者是《應用生物學中的統計方法》，再不然是他1951至1952年編寫的教程。他總是註明一天用了多少時間寫這部或那部稿子。他的日記，內容就是如此。至少猛一看給人這樣的印象。

我本來應當把這些日記撂到一邊，沒有理由再去研究。乾巴巴的統計，既挖掘不出感情，也挖掘不出饒有興味的時間的細節；語言蒼白單調；沒有暴露任何隱秘；幾乎絲毫沒有痛苦，沒有欣喜，沒有幽默。偶或透露的一點細節，也是像電報一樣乏味：

舒斯托夫三兄弟今晚來此。

病後虛弱，整日足不出戶。

下雨兩場，未游泳。

這些日記再看下去是沒有意思了。

最後，我出於好奇，看了看關於衛國戰爭開始的記載。

1941年6月22日。基輔。對德戰爭第一天。約13時得悉……

接下去又全是他慣常的那種結算表，統計每天幹過的事。

1941年6月23日，空襲警報幾乎持續竟日。生物化學研究所開大會。夜間值班。

1941年6月29日。基輔。9至18時在動物研究所值班，研究線解法並寫報告，夜間值班.....合計5小時20分。

他送他的大兒子上前線，後來又送小兒子；兩次送別，他的記載也是同樣的不動感情。1941年7月，他同妻子、孫兒搭乘輪船從基輔疏散。在輪船上，他還是那麼簡短地、一絲不苟地記他的日記：

1941年7月21日。德國飛機空襲科托夫斯基號輪船——轟炸，機槍掃射。船長及不知姓名的一位大尉殞命，傷四人。明輪損壞，因此未在鮑格魯奇停靠，逕駛克列曼楚格。

1941年節節敗退的悲傷日子以及後來我們在冬季初次獲勝的喜悅，在他的日記中幾乎沒有反映。關係到全國每個人的事件似乎沒有觸動日記的作者。1945年的5月、戰後生活的復甦、供應卡的廢除、農業的困難.....他的明細賬上一概沒有列入。學術性的和非學術性的辯論此起彼伏。那幾年，生物學戰線上的戰鬥也十分殘酷。柳比歇夫沒有迴避，他參加了戰鬥，他發表意見，他憤慨，他寫信、寫文章，爭論不休，有時候竟成了眾矢之的。他被撤過職，挨過整，受到過威脅恫嚇，但也有過勝利，有過喜慶的日子，有過天倫之樂——這一切，我在他的日記裡沒有發現一點痕跡。不說別人，柳比歇夫可是同農業有密切聯繫的，瞭解戰前農村的情況，也瞭解戰後的，在報告和專著中都談到過，但在日記中卻無片言隻語。他為人極富同情心，是個積極的公民，然而他的日記歷年來都是如此乾澀冷漠，活像會計賬目。拿他的日記來看，什麼事情也不能打亂這個人規定的工作節拍。我要是不瞭解柳比歇夫，面對這些日記，我會不知所措，我會以為他精神空虛，無所用心，兩耳不聞窗外事，靈魂麻木不仁。可是，我瞭解這些日記的作者；這樣，我更覺得奇怪，我想搞清楚柳比歇夫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他幾十年來那麼詳細地記這個——就算這不是日記，而是詳細地計算他的時間和工作的賬目，這麼一本賬對記賬的人又有

什麼用處？短短的記載，不能勾起回憶。不錯，舒斯托夫三兄弟來過，但這又能說明什麼呢？記載的方式並不是為了提供回想的線索，其中也沒有任何密碼暗語。同時，這不是供閱讀的日記，更不是供別人閱讀的。這可是叫人奇怪。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日記，即使是最最秘不示人的，也總是下意識地，在心靈察覺不到的地方，隱隱約約地期待著它的讀者。

但是，這如果不算日記，又是什麼呢？又是有什麼目的？

時間的賬簿

當時我的冥思苦想，如今看來很可笑，我覺得我是個木頭疙瘩。我相信，歷來如此——任何一個發現，即使是天才的發現，發現之前的各種推理假想如果都記下來，那麼，廢料和各種各樣愚蠢荒謬的推斷，數量之多也會使我們大吃一驚。

日記怎麼個記法，沒有任何一定的框框；何況這又不是日記。柳比歇夫本人並沒有要求人家承認這是日記。他認為他那些本本是「時間統計」。好比賬簿，他是在用他的方法統計支出的時間。

我發現，每個月到月底他都要做小結，畫了一些圖，列了一些表。到年終，又根據每月小結做一份年度總結，列出一覽表。

圖是用鉛筆畫在方格紙上的，忽而這樣，忽而那樣，旁邊還注著一些數字，又是加，又是乘。

這都是什麼意思？無人可問。這一套統計的內情，柳比歇夫跟誰也沒有談過。倒不是保密，絕不是。他大概是認為具體細節是次要的問題。我們知道他會把年度總結分送給朋友們，但那些年度總結只有總數，只有答案。

乍一看來，可能會把這種計算方法當作一天的工時標定。晚上臨睡前，他坐下來計算，他都把時間花在什麼上了，花了多少，最後算出基本工作消耗的時間。似乎再簡單也沒有了。可是馬上又產生了問題：什麼是基本工作？基本工作以外的時間為什麼也要計算，而且又是那麼詳細？這種工時標定到底有什麼用？日程表裡那些0.5和1.0的數字代表什麼？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值不值得去研究他這種時間統計法，推敲琢磨它的細緻微妙，尋求上面那些問題的答案？何苦呢？我這樣問我自己。然而我仍然繼續揣摩，絞盡腦汁去參透他這種方法的奧秘。我隱隱約約地預感到它似乎同我本人的生活有些關係；由於這種預感，我沒有把那些日記撻到一邊。

要點

- 1916年，柳比歇夫開始記錄時間開銷日記，一天沒有間斷。
- 時間開銷日記的格式是：日期+事件+花費時間，每天記錄5～7行。
- 柳比歇夫根據時間開銷日記，每個月做月度總結，年底做年度總結。

第五章 精確感知時間

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時間感。

我同他見過兩次面，在他日記中都有記載，時間記得十分準確——「1小時35分」「1小時50分」，然而當時他自然沒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著他；他借助於一種內在的注意力，感覺得到時針在表盤上移動——對他來說，時間的急流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他彷彿置身於這一急流之中，覺得出來光陰在冷冰冰地流逝。

如何與時間相處

「噢，路齊利，一切都不是我們的，而是別人的，只有時間是我們自己的財產，」賽納卡¹⁴寫道，「造物主交給我們，歸我們所有的，只有這個不斷流逝的、不穩定的東西。就連這個東西，誰只要願意，都可以把它從我們手裡剝奪走……人一點也不珍惜別人的時間，雖然它是唯一再怎麼想也無法收回的東西。你可能會問，我對你訓誨開導，我自己又是怎麼做的呢？老實說，我的所作所為同那些揮霍浪費然而有條理的人一樣，對自己的每一筆支出都要記賬。我不能說我一點也沒有浪費，但我總是心中有數，我浪費了多少，是怎麼浪費的，為什麼浪費的。」

你們看，早在紀元初，公元50年，科學工作者——賽納卡很可以算作科學工作者——就已經在計算自己的時間，努力節約時間。哲學家，古代的哲學家，是最先理解時間的價值的。肯定在賽納卡以前，他們就試著想個什麼法子去給時間戴上籠頭，使它馴服，瞭解它的本質，因為當時的人們已經對時間的奔馳感慨萬分了。

但是我們出於自命不凡，深信古人的時間綽綽有餘。古人只有日晷、水漏、沙漏，連計算時間都不像個樣子，還談得上什麼珍惜時間？按照實幹家的見解，進步不就在於替這位實幹家節約時間嘛。為了節約時間，實幹家下了馬車坐上火車，下了火車坐上飛機。發明了電報和電話來代替書信，電視代替了劇院，拉鏈代替了扣子，圓珠筆代替了鵝翎。電梯、計算機、百貨公司、電傳打字機、電動剃刀——這一切發明，都是為了替人節省時間。然而，不知道為什麼，人越來越感到時間不夠用。實幹家加快了速度，推廣了電子計算機，把百貨公司翻修成自選商場，採用照相製版法來印報紙，連說話都盡量說得簡潔些，也不動手寫了，而是利用錄音機口授。但時間卻越來越緊

張。不僅是實幹家，人人都感到時間的匱乏。沒有時間看朋友；沒有時間寫信；沒有時間照料孩子；沒有時間去想；沒有時間到秋天的樹林裡去站一會兒，什麼也不想，光去聽聽飛舞的落葉颯颯作響；沒有時間吟詩；沒有時間去給父母掃墓。小學生也好，大學生也好，老頭兒也好，大家都沒有時間。時間不知哪裡去了，越來越少。手錶再也不是奢侈品，每個人手腕上都戴著，走得很準，校正過，還防水；人人心裡都有一座鬧鐘嘀嗒嘀嗒走著。但是時間並沒有因此而增加。時間的分配幾乎同兩千年以前的賽納卡時代一模一樣：「我們一生的時間，大部分用於錯誤及種種惡行；很大一部分虛拋浪擲，無所事事。我們整個一生，幾乎都沒有用來干應當幹的事。」

如果能把用於工作的時間一筆勾銷，那倒是很有必要的。這兩千年來，情況當然有些好轉，有許多著作問世，探討自由時間、物理時間、宇宙時間，研究時間的節約以及如何正確地利用時間。時間原來是不能倒轉的，也不能儲存起來，把多餘的時間放到倉庫裡，要多少取多少。如果能這麼做，倒是挺方便，因為人並不是什麼時候都需要時間的。有時候他壓根兒無處可用，只好消磨時間。時間的令人煩惱之處正在於它不能不用。結果，人們興之所至，亂花濫用，用來干五花八門的荒唐事。有些人，時間對他們是個累贅，他們不知道把它怎麼辦，怎樣打發。

「我對時間統計法已經習慣了，沒有它就沒法工作」

大家知道，幸福的人是不看表的；反過來說也對，不看表的人是幸福的。但是，柳比歇夫不是由於工作上的關係，不是出於不得已，而是自願地擔當起「看表」的苦差使。

柳比歇夫的女兒講過，她在童年時代，有時和弟弟一起到書房去找父親問問題；每當他開始耐心地回答的時候，他總要在紙上做什麼記號，哪一回都是這樣。多年後她才知道父親是在記時間。他無休無止地進行自我工時標定。任何活動——休息、看報、散步，他都記下時間，多少小時多少分鐘。他這是從1916年1月1日開始的。當時他26歲，在部隊裡服役，是在化學委員會，在著名的化學家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伊格納節耶夫手下工作。時逢元旦，人們往往在這一天發下誓願：什麼再也不幹了，什麼該幹起來。柳比歇夫也是在這一天起的誓。

我上面說過，頭一本統計冊保存下來了。頭一本用的方法還挺原始；日記也同後來不一樣，思考和感想挺豐富。他的方法是逐步形成的，在1937年的日記中已臻於完善。

不管怎麼樣，從1916年到1972年他去世的那一天，56年如一日，柳比歇夫一絲不苟地記下了他的時間支出。他的歷史長篇一天也沒有中斷過，連兒子的夭亡也擋不住他在這份沒完沒了的結算表上記上一筆。時間之神克羅諾斯不也是這樣嘛，不也老是揮舞自己的鞭子，一次也不放過。

柳比歇夫每天都要結算他度過的時間，算出這個那個都用了多少小時多少分鐘。

柳比歇夫如此忠於自己的方法，這本身便是一個獨特的現象；這樣的日記，單單它的存在，說不定便是獨一無二的。

多年來經常看表的結果，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時間感。在我們機體深處嘀嗒嘀嗒走著的生物鐘，在他身上已成為一種感覺兼知覺器官。我做出這樣推斷的根據是：我同他見過兩次面，在他日記中都有記載，時間記得十分準確——「1小時35分」「1小時50分」，然而當時他自然沒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著他；他借助於一種內在的注意力，感覺得到時針在表盤上移動——對他來說，時間的急流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他彷彿置身於這一急流之中，覺得出來光陰在冷冰冰地流逝。

我瀏覽了他《論生物學中運用數學的前景》一文的手稿，在最後一頁我看到了這篇論文的「成本」：

準備（提綱、翻閱其他手稿和參考文獻）

14小時30分

寫29小時15分

共費43小時45分

共8天，1921年10月12日至19日。

看起來，早在1921年他對時間統計已經研究停當，可以準確地算出每項工作的時間消耗。

他做時間統計，也善於做時間統計。

有些作者在稿子上註明完稿日期。寫上具體日子的較為少見；寫明從幾日到幾日的，那就更少見了。至於用了多少小時，我是頭一遭見到。

柳比歇夫的每篇論文，都有「成本」核算。這個核算是怎麼做的？原來根本沒有專門做過什麼核算。他的時間統計法彷彿是一台計算機，自動提供了數據：寫一篇文章，看一本書，寫一封信，不管幹什麼，每道工序的時間都算得一清二楚。

時間比過去少了，時間的價格比過去高了。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但是仔細分析一下這個生命，可以說，最寶貴的是時間。因為生命是由時間構成的，是一小時一小時、一分鐘一分鐘累積起來的。現代的人對他寶貴的、奇缺的、幹什麼都不夠用的時間，總是要這樣那樣地計劃一番。我同大夥兒一樣，也開張單子，列出要辦的事情，為的是更合理地安排時間。我也預先計劃一星期——有時是一個月的時間，註明完成任務的期限。有條理的、意志堅強的人，一天完了，還要分析分析當天的情形，弄清楚該怎樣合理地支配自己的時間。當然只是工作時間嘍。但就是這樣，他們也是了不起的人（對我來說）。我可是意志不夠堅強，幹不了這種事，而且這又有什麼愉快的呢！更何況分析的結果可能會使你煩惱不堪。沒有什麼特殊的必要，值不值得在這上頭喪失自尊心？責備自己沒有條理、不會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這是一碼事，然而對什麼都瞭如指掌，連損失了多少小時多少分鐘都清清楚楚——這又是一碼事。我們真誠地相信我們是在盡力而為，認真地埋頭工作，驀地發現我們真正做工作的時間說不定只有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其餘的時間都流走了，消逝了，浪費在無謂的奔忙和聊天上，浪費在等待鴻鵠之將至。我們不是挺珍惜每一分鐘的嘛，放棄了休息，摒絕了娛樂.....

於是，有各種時間節約專家應運而生，有專門的參考書問世。多數是為企業領導人服務的。有人計算過，數他們的時間最寶貴。

美國經理們的科學導師彼得·德拉克建議每個領導人把自己的時間做個精確的記錄，然而他說，這個記錄做起來極其困難，大部分人都吃不消：

「我強迫自己去請求我的秘書每過9個月做一次時間統計，統計一下3個季度來我的時間利用情況.....我向自己保證，並且向她做了書面保證（她堅持要這樣辦）：她把統計結果拿來給我看的時候，我絕不把她解雇。然而，雖然我這樣已堅持了五六年，但我每次總要嚷嚷：『不可能！我知道我浪費了很多時間，不過不可能有那麼多.....』我倒想看看，誰做了這樣的統計會得出不同的結果。」

彼得·德拉克深信沒有人會接受他的挑戰。他是專家，他這個有勇氣的人以他的親身經歷對此深信不疑。能夠下定決心做這種分析的，確實寥寥無幾。做這樣的分析，比做懺悔需要更大的精神力量。在上帝面前坦白，總要比在凡人面前坦白容易些。把自己的弱點、惡習、空虛等統統暴露在眾人面前和自己面前，是需要勇氣的。德拉克說得對，只有讓-雅克·盧梭或托爾斯泰這樣的人，才能嚴格無情地解剖自己。

當然，我們這裡要求比較低，只要求看見自己的職業上的「我」，但敢於這樣做的也是鳳毛麟角。

柳比歇夫不是行政管理人員，不是組織者。他的職務也好，周圍的人也好，都沒有要求他實行時間登記制度。他不可能托女秘書記錄他的時間。他非但自己動手每天統計，還親自做結算，詳細到了無情的地步，什麼也不隱瞞，什麼也不縮小。不僅如此，他還擬訂計劃，預先安排好下一個月的時間，安排好每一個小時。一句話，他的時間

統計方法本身就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人們不禁要問：「為了什麼要這樣幹？自願去做這項苦工，拿它來折磨自己，有什麼意思呢？」他的朋友們都感到莫名其妙。他的回答極其籠統含糊：「我對這個時間統計法已經習慣了，沒有它就沒法工作。」但為什麼要養成這個習慣呢？為了什麼要創造這個方法？實幹家為什麼需要這個方法，它為什麼對實幹家有好處——這樣泛泛而論，我們倒是明白的。籠統的說明，我們總是能夠明白的。可是為什麼柳比歇夫他要這樣做？是什麼迫使他這樣做的？

要點

- 除了工作，休息、看報、散步等所有活動花費的時間，柳比歇夫都記錄在日記中。

- 通過記錄，柳比歇夫形成了獨特的感知時間的方法，不需要鐘錶，他也能準確估計時間過去了多久。

- 通過時間統計法，柳比歇夫能準確估算出完成一項任務所需的時間，從而合理安排工作計劃。

第六章 緣起：一生的奮鬥目標

這樣到底好不好？——給自己的生活定了框框，定得那麼死。

然而事實上（這個事實很值得注意），柳比歇夫的命運並非如此。他的一生是生氣勃勃、和諧協調的。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標，在他的生活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一生始終忠於他青年時代的選擇，忠於自己的愛好和理想。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幸福的。

一生的奮鬥目標：創立生物自然分類法

1918年，柳比歇夫從部隊復員回來，開始從事純學術工作。那會兒，他已經提出他一生的奮鬥目標——創立生物自然分類法。

「要創立這樣一種分類法，必須先找出某種類似的原子量；我想對沒有直接功能作用的機體結構中的曲線進行數學研究，通過這個辦法來找……」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在1918年這樣寫道，「這項工作在數學上看來困難極大……我起碼要過5年，等數學基礎打得好一些，到那時候才能著手完成這項主要任務……我立意要寫一部數學生物學；一切企圖把數學運用於生物學的嘗試，都將包容於這部書中。」

在那幾年，人們對他的想法，反應頗為冷淡。應該說，柳比歇夫於1918年到那裡去工作的辛菲羅波爾市的塔夫利達大學，當時委實是人才濟濟：數學家H.克雷洛夫和B.斯米爾諾夫，天文學家O.司徒盧威，化學家A.白柯夫，地質學家C.奧布魯契夫，礦物學家B.維爾南茨基，物理學家Я.弗倫凱爾和И.塔姆，森林學家Г.莫羅卓夫，自然科學家弗拉基米爾·帕拉金和亞歷山大·帕拉金兩兄弟，П.蘇希金，Г.維索茨基；最後還有柳比歇夫終生崇敬的老師亞歷山大·加夫裡洛維奇·古爾維奇。

這位青年教師並沒有因為泰斗們的懷疑而彷徨。歲月遞嬗，具體的方法有所修正，某些東西不得不重新審議，但是總的任務不變——一旦幹了起來，他一輩子也不背離既定的目標。

傳說施利曼¹⁵起誓要找到特洛伊遺墟的時候才8歲。施利曼的例子之所以廣為人知，原因之一是這種向目標直線進軍、終生鏖而不捨的

情況在科學史上極為罕見。柳比歇夫二十多歲剛開始從事學術工作的時候，也明確地知道他要達到什麼目標。真是幸福而不平凡的命運啊！他自己提出了他的工作綱領，並從而預決了他的活動的整個性質，事實上是至死不渝。

這樣到底好不好？——給自己的生活定了框框，定得那麼死。捆住了自己的手腳，戴上了籠頭，錯過了其他的機會，人變得乾巴巴的.....

然而事實上（這個事實很值得注意），柳比歇夫的命運並非如此。他的一生是生氣勃勃、和諧協調的。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標，在他的生活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一生始終忠於他青年時代的選擇，忠於自己的愛好和理想。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幸福的；而且在旁人的眼裡，他的生活由於目標明確，也是令人羨慕的。

23歲的維爾南茨基¹⁶寫道，他立志「要在智能、知識和才華上盡量取得實力，這樣我的智慧便會無比地豐富多彩.....」他在另一處寫道：「我充分意識到，我可能是致力於錯誤的、靠不住的東西，誤入歧途，但我不能不走這條路。我憎恨對我的思想有任何束縛，我不能也不願我的思想順著這樣一條道路發展下去，它雖然在實際上是重要的，但它不能使我對那些折磨著我的問題有起碼的瞭解.....這樣一種探索、這樣一種企求，正是任何一種學術活動的基礎。這只會使我們不致成為在故紙堆中討生活的書蠹，只會使我們真正地生活，在學術工作中找到喜怒哀樂.....追求真理。我完全知道，我可能在追求真理中死去，可能因此而喪生，但我重視的是找到真理，即使不是找到，那也是力求找到，不管這個真理是多麼令人苦惱，是多麼虛無縹緲，多麼卑鄙齷齪。」

這些青年時代的誓言總是激動著人心：赫爾岑、奧加廖夫、克魯泡特金、梅契尼科夫、貝赫捷列夫¹⁷——幾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立志獻

身於追求真理的鬥爭。每個人都選擇了自己的道路，但某種共同的東西把他們這些如此不同的人聯繫在一起。這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對科學的忠誠，而且他們之中誰也不是光研究一門科學。他們都是又搞歷史，又搞美學，又搞哲學。俄羅斯作家的精神探索史是眾所周知的。俄羅斯科學家追求道德的歷史也並不遜色，其精彩與深刻不亞於作家。

但，立志忠於科學（哪怕是心愛的科學）是一碼事，給自己規定具體的目標又是一碼事。

萬一特洛伊根本沒有存在過呢？萬一它是荷馬虛構的呢？這樣一來，施利曼豈不是白白蹉跎了一生？

萬一柳比歇夫確定的目標是不能達到的，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呢？萬一過了二十來年，證明創立這樣一種生物自然分類法是不可能的呢？或者說，萬一現代數學機器不適合於這方面的用途呢？這樣一來，虛度了年華，當初的目標原來是虛幻的東西，目標明確變成了漫無目的。

這是冒險嗎？不，比冒險更可怕：這是押寶——未來、才華和希望——這些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統統拿來孤注一擲。誰知道有多少這樣的幻想家在無聲無息中死去，沒有達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

最好不是去震驚世界，而是生活在世界上

狂熱、偏執、禁慾——科學家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什麼代價沒有付出過？！

在科學中，著迷是危險的東西。對某些氣質的人來說，或許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代價太大了。著了迷的人對科學危害甚烈；著了迷，往往不能批判地對待事物，連牛頓這樣的天才也在所難免——我們只要提一下牛頓對虎克¹⁸不公道的行為，便足以說明問題。

在青年時代，柳比歇夫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滿腦袋虛無主義、唯理主義的巴扎洛夫。在那個年代，柳比歇夫的許多同窗學友都模仿巴扎洛夫。這又是一個例證，說明文學主人公不只是對一代而是對幾代俄羅斯知識分子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在青年時期，同巴扎洛夫一個腔調，眼裡只有自然科學；什麼歷史，什麼哲學，統統是扯淡。捎帶說一句，文學也不能倖免。柳比歇夫當時只承認文學是學好外語的一種工具：《安娜·卡列尼娜》，他看的是德文版，「因為譯文要比原文易懂」。

一切服從於生物學；凡是無助於此的，一概置之不理。他那時憧憬著建功立業，遵循著英雄主義的陳詞濫調：首先是工作，一切為了工作；為了事業，不惜犧牲一切。

事業代替了倫理，決定了倫理，它本身就是倫理，把存在和哲學的一切問題一筆抹殺；為了事業，人世間的一切喜悅和樂趣都不值一提。

捨此取彼，他取了自我犧牲。

這是我們熟知的那種科學狂。他為之獻身的生物學任務相當重要，其餘的事情與他都不相干。科學要求付出最大的努力，做出最嚴格的自我克制。不是這，便是那。司空見慣的兩個極端。不是聖賢和英雄，便是庸人、壞蛋，哪方面都不配做人的人。我們在這裡是沒有中庸之道的。如果不能成為榜樣，不能成為理想人物，那就什麼都無所謂了——是騙子也罷，是正直的科學家也罷，對藝術有興趣也罷，不學無術、下流無恥也罷……只有完人才能得到承認；一個人僅僅做到有良心、規矩正派，那是不夠的。

柳比歇夫開始的時候同旁人差不多，跟所有年輕人一樣，渴望著建樹功勳，成為拉赫美托夫¹⁹，成為超人。一步步，他才逐漸恢復天性，顯出人的弱點，他鼓起勇氣繼續前進，攀登越來越陡峭的高峰——追求人性，追求那最最樸實的人性。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驚世界，而是要像易卜生所說的，生活在世界上。

這樣，對人，對那門科學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長處首先在於他懂得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得多。

幫助他做到這一點的，正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要求……不過那是後話，至於在初期，根據一切計算（柳比歇夫是喜歡計算也善於計算的），他的工作要求他付出正常人無法比擬的精力，需要消耗比正常人的一生更多的時間。他當然相信他能做到，但總是要從另外什麼地方再去挖掘一些力量，再去挖掘一些時間。

要點

·柳比歇夫很早就意識到，達成人生目標需要耗費巨大的時間，所以他不斷從生活中挖掘時間。

·一生忠於一個目標，柳比歇夫自己是幸福的；在別人眼中，也是令人羨慕的。

第七章 人生的容量

他的時間好像是物質，不會無影無蹤地消逝不見，不會消亡；它變成了什麼，總能查得出來。由於做了統計，他獲得了時間。這是最實在的收穫。

隨時隨地利用「時間下腳料」

我像是果戈理筆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他在抄抄寫寫中找到樂趣……我在學術工作中也很願意發現新的事實，做純技術性的工作等，從中找到樂趣。再加上我從我念念不忘的父親那裡遺傳來的樂觀主義，結果我寫了許多東西備而不用。這些東西，我根本沒有指望發表。重要的論著，我做的摘要十分詳細，甚至到現在我在這上面仍花很多的時間。我積累了豐富的材料。同時，凡是最重要的著作，我都要寫個提綱，再進行分析研究。所以我手頭有大量的存貨，一旦有可能出版，存貨立刻能派上用場；文章寫得很快，因為事實上它不過是我平日儲備著的材料，隨用隨取。

在青年時代，我的讀書方法使我在某種程度上落後於別人，因為我看的書比我的同志少。他們看書比較浮皮潦草。但是，浮皮潦草地看書，有許多精彩的東西消化不了，看過的東西很快會忘記。至於我看書的辦法，能使我得到十分清晰牢固的印象。所以，隨著歲月的推移，我的庫存要比我的同志豐富得多。

年復一年，這個方法以及他的其他工作方法，優點越來越突出。他彷彿什麼都提前幾十年計算好、設想好。彷彿連他的長壽都是事先估計到、考慮到的。

他的一切計劃，甚至最後一個五年計劃，制訂的出發點，都是設想他起碼應當活到90歲。

不過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他只是想方設法利用每一分鐘，利用任何所謂的「時間下腳料」：乘電車、坐火車、開會、排隊……

還是在克里米亞，他已經注意到邊走路邊打毛衣的希臘女人。

每一次散步，他都用來捕捉昆蟲。在那些廢話連篇的會議上，他演算習題。

他規定，短距離，兩三公里路，最好步行，省得為了等車浪費時間、損害神經。步行還有一個好處，因為反正需要散步。

他對「時間下腳料」的利用，考慮得無微不至。出門旅行，他看小部頭的書，學習外語。舉個例子，英語，他就是主要利用「時間下腳料」學會的。

我在蘇聯植物保護研究所工作的時候，常常出差。一般我要帶一定數量的書上火車。如果是長期出差，我就把書打成郵件，寄到某地。帶多少書，根據以往的經驗來決定。

我在一天之內是怎麼安排讀書時間的？清早，頭腦清醒，我看嚴肅的書籍（哲學、數學方面的）。鑽研一個半到兩個小時以後，看比較輕鬆的讀物——歷史或生物學方面的著作。腦子累了，就看文藝作品。

在路上看書有什麼好處？第一，路途的不便你感覺不到，很容易將就；第二，神經系統的狀況比在其他條件下良好。

坐電車，我看的不是是一種書，有兩三種書。如果是從起點站坐起（例如在列寧格勒），那就可以有位子坐，因而不僅可以看書，還可以寫字。如果電車很擠，有時候只能抓著

扶手桿勉強站住，那就需要小冊子，而且要比較輕鬆的。現在列寧格勒有許多人在電車上看書。

可是，「下腳料」越利用越少，而對時間的需求越來越大。

工作越深入，面也越寬。先是需要認真研究一下數學，後來又輪到哲學。他逐步發現生物學同其他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所鑽研的分類法，促使他批判地對待達爾文主義，特別是那種認為自然淘汰是進化主導因素的理論。他不怕人家責備他陷入活力主義、唯心主義，但應當研究哲學。

已經晚了，但他終於明白，他不懂歷史不懂文學是不行的；不知道為什麼，他還需要懂一點音樂.....

應當不斷挖掘一切時間潛力。明擺著，人不能老是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應當正確利用工作時間，從時間中去找時間。

實際上，正如柳比歇夫親身體驗到的，需要高深學識的工作，他一天至多能幹八個小時。

時間統計法的本質：針對過程的「事件·時間日誌」

他記下工作起訖的時間，誤差不超過5分鐘。

「工作中的任何間歇，我都要刨除。我計算的是純時間，」柳比歇夫寫道，「純時間要比毛時間少得多。所謂毛時間，就是你花在這項工作上的時間。」

常常有人說，他們一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這樣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純時間來說，我一天幹不了那麼多。我做學術工作的時間，最高紀錄是11小時30分。一般，我能有七八個小時的純工作時間，我就心滿意足了。我最高紀錄的一個月是1937年7月，我一個月工作了316小時，每日平均純工作時間是7小時。如果把純時間折算成毛時間，應該增加25%到30%。我逐漸改進我的統計，最後形成了我現在使用的方法.....

當然，每個人每天都要睡覺，都要吃飯。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時間用在標準活動上。工作經驗表明，約有12到13小時毛時間可以用於非標準活動，諸如上班辦公、學術工作、社會工作、娛樂等。

計劃的複雜性在於如何安排一天的時間。他決定，用去的時間應該同他從事的工作相稱。也就是說，比方寫一篇有獨特見解的論文吧，佔用的時間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計劃就是挑選時間、規定節律，使一切都各得其所。頭腦清醒的時候應當鑽研數學，累了便看書。

應當學會不受周圍環境的干擾，用在工作上的3個小時應當是真正做工作的3個小時，不想不相干的事，不聽同事的談話，不聽鈴聲和笑聲，也不聽收音機.....

這個方法之所以能夠存在，是依靠經常的計算和檢查。沒有計算的計劃是盲目的計劃，就像某些研究所那樣，光會做計劃，卻不去操心這計劃能不能完成。

應當學會計算一切時間。

他把一晝夜中的有效時間即純時間算成10個小時，分成3個單位，或6個「半單位」，正負誤差不超過10分鐘。

除了最富於創造性的第一類工作外，所有規定的工作量他都竭力按時完成。

第一類工作包括中心工作（寫書、搞研究）和例行工作（看參考書、做筆記、寫信）。

第二類工作包括做學術報告、講課、開學術討論會、看文藝作品，不屬直接科研工作的活動都包括在內。

我們隨便拿一天的日記來做例子——1965年夏季的一天：

索斯諾戈爾斯克。0.5。基本科研（圖書索引——15分，陀布爾讓斯基——1小時15分）。分類昆蟲學，參觀——2小時30分，安置捕捉器兩個——20分，分析——1小時55分。休息，第一次在烏赫塔河游泳。《消息報》——20分，《醫學報》——15分，霍夫曼的《金罐子》——1小時30分，給安德朗寫信——15分。共計8小時35分。

整個一天的活動，直至看報，都經過分析，分門別類登記上了。

怎麼是「共計8小時35分」？從記錄看，這僅僅是第一類工作時間的總數。其餘經過計算的時間是第二類工作或其他。每天只合計第一類工作的時間，然後再把一個月的加起來，就拿這個1965年的8月來說，第一類工作的總時間是136小時45分。其中又包括哪些項目呢？請看吧，一切情況在每月小結中都有說明。

基本科研

——59小時45分

分類昆蟲學

——20小時55分

附加工作

——50小時25分

組織工作

——5小時40分

合計

——136小時45分

「基本科研」這59小時45分包括什麼內容，用在什麼上了？

1.分類工作——《分類法的邏輯》報告草稿

——6小時25分

2.雜事

——1小時0分

3.校對《達達派研究》

——30分

4.數學

——16小時40分

5.日常參考書：《裡亞普諾夫》

——55分

6.日常參考書：《生物學》

——12小時0分

7.學術通信

——11小時55分

8.學術札記

——3小時25分

9.圖書索引

——6小時55分

合計

——59小時45分

我們還可以隨便拿哪一項繼續分析下去，就拿第六項吧——日常參考書：《生物學》——12小時。這12小時花在什麼上面，一目瞭然，誤差不超過1分鐘。

1.陀布爾讓斯基《人類的進化》，372頁，看完（共16小時55分）

——6小時45分

2.亞諾什·卡羅埃《動物有沒有思想》，91頁

——2小時0分

3.P.貝爾格的手稿

——2小時0分

4.聶考洛·奧斯維爾陀，17頁

——40分

5.拉特納的手稿

——1小時30分

合計

——12小時55分

大部分學術著作都做了摘要，有的還做了分析研究。所有摘要和評論都規規矩矩地裝訂成冊。這些用打字機打的合訂本，猶如讀書總

結，是他融會貫通了的知識的存放處。只要翻一下提要，就可以記起某本書中需要的東西。

柳比歇夫有種罕見的才能——隨便哪本書的作者，凡有獨特的見解，他都極善於汲取。有的書，一張紙就夠；某些大部頭書，需要幾張紙來歸納。它們的精華同它們的厚度怎麼也不相稱：大量的插圖、表格、附頁、書皮……

除了第一類工作，第二類工作的統計也是同樣的詳細。為什麼要這樣精打細算，就比較難解釋了。文藝作品的閱讀花了23小時50分。有什麼必要開列出來，一一計算呢！其中：「霍夫曼，238頁——6小時」；「米裡爾斯基論霍夫曼——1小時30分」等。

接著是8本英文書，共計530頁。

寫了7封計劃內的信。

報紙雜誌看了多少多少小時，給親人寫信花了多少多少小時。

這樣詳細，可以說是多此一舉，但我已經學會小心謹慎，避免匆匆忙忙做出結論。我相信，柳比歇夫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不過他的道理，人家並不是永遠都能明白的。要是沒有好處，只會浪費時間，他總不會年復一年地進行時間分析。

然而，事情還是弄清楚了。要採用這種方法，必須知道一切有效時間，洞察時間中一切曲裡拐彎的地方和空白點。這個方法不承認有什麼不能利用的時間。所有的時間一視同仁，一樣寶貴。對於人，不應當有什麼壞的、無用的、多餘的時間。也沒有休息的時間。所謂休息，是兩種工作的交替，就像是正確的田間輪作制。

無話可說，這自有它的道理。因為每個小時都是生命的一部分。這個小時和那個小時都是平等的，每個小時都要結算。

結算同時也是對計劃的總結。一總結馬上提出下個月的計劃。舉例來說，1965年9月的計劃包括哪些內容？規定：10天在新西伯利亞的學院裡講課，18天在烏裡揚諾夫斯克，2天花在路途上。接著是哪一項工作要用多少多少小時，鉅細無遺。比如，寫信24封——38小時。開出必讀書單。在照相時要幹些什麼。要給誰寫一份評語。

與學院裡的職務有關的工作，也要做個計劃，參考以往的經驗，把時間大致安排好……

制訂年度計劃或月計劃時，不得不依靠過去的經驗。例如我計劃要看一本什麼書。根據老經驗我知道，我一小時能看20～30頁。我就根據這個老經驗來制訂計劃。至於數學，我計劃每小時看45頁，有時更少。

所有看過的東西，我都要仔細研究。怎麼研究？如果一本書談的是我不大瞭解的新東西，我就盡量做摘要。凡是比較重要的書，我都盡量寫一份評論性的簡介。根據以往的經驗，需要做這些工作的書，可以定出一定的量。

如果認真辦事，實際工作時間對預定工作時間的誤差一般為10%。需要做摘要評論的書，常常沒有完成預定的數目，落下很多。興趣往往轉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欠了很多債，一下子還清又不可能，結果就完不成計劃。有時候，完不成計劃是由於工作精力暫時衰退。完不成計劃也有外界的原因。但不管怎麼樣，我知道，我的工作有必要做計劃。我以為，我所取得的成就，有許多是靠了我的方法。

基本工作的時間也要計劃一番：備課、生態學、昆蟲學及其他科研工作。第二類工作的時間一般要比第一類多10%左右。

他完成計劃的精確程度，每每使我驚詫不已。有時自然也有預計不到的情況。1938年的年度總結中，柳比歇夫寫道，第一類工作沒有完成，差28%：「主要的原因是奧麗雅和瓦麗雅病了，結果同人們打交道多了。」

他的時間好像是物質，不會無影無蹤地消逝不見，不會消亡；它變成了什麼，總能查得出來。由於做了統計，他獲得了時間。這是最實在的收穫。

年度總結是篇幅浩瀚的報表，整整有一本。什麼都有記錄。以1938年為例：多少時間用於生態學、昆蟲學、組織工作、動物研究所、基塔耶沃的水果研究所；多少時間用於同人們打交道、路途往返、家務。

從這份年度總結中可以瞭解到看了多少書，都是什麼書；各國文字的文藝作品看了多少頁。一年竟看了9000頁，共用247小時。

這一年寫了552頁學術著作，其中有152頁付印出版。

每一年過去，柳比歇夫都要進行分析研究，統計學的一切辦法都用上了。素材有的是——那便是每個月的小結。

總結完上一年，就該制訂下一年的計劃了。下一年的計劃是根據柳比歇夫提出的任務大致安排的。

中心任務（1968年）是8月份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昆蟲學會議，我準備在會上做個報告，談談經驗分類法的任務和道路。

他寫道，哪些論文該在會議開幕前寫完，在鑒定跳甲屬上要做哪些工作，在烏裡揚諾夫斯克、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各待多少天，那幾年中他的主要著作《文化史上的德謨克利特和柏拉圖兩個流派》寫多少頁，分類學和進化論方面的《論分類學的未來》寫多少頁。然後大致安排一下時間，用他的計算單位來表示：

第一類工作

570 (564.5)

路途往返

140 (142)

交際

130 (129)

私事

10 (8.5)

諸如此類，一共是1095。

括號內是完成數字。括號內外的數字相差無幾，說明他能多麼精確地提前一年計劃他的生活。

他在總結中吹毛求疵地記上一筆：

第一類工作完成564.5，原計劃570，赤字為5.5，即1%。

也就是說，一切都相符，誤差僅為1%！

總結的價值和意義

每月小結雖然鉅細備載，年度總結中仍把所有干了的、讀了的、看了的統統收集到一起，加以計算，分門別類。一年來的工作和休息——簡直是什麼事情都要結算累計。

「娛樂——65次」，接著是一張清單，列舉了看過的戲和電影、聽過的音樂會、參觀過的展覽會。

65次——是多還是少？

似乎是多了。話說回來，我也沒有把握，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個比法。同我比嗎？問題正在這兒——我就沒有計算過，說不出我一年看幾場電影，聽幾回戲，參觀幾次展覽會。連大約的數字，我也一下子說不上。更說不出情況有什麼變化：隨著我年齡的增長，這個數字發生什麼變化，我看多少書，看的書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科學書籍和文藝作品的比重有什麼變化？我寫多少封信？每年有多少時間用在路上，用於交際和運動？

我心中沒有一個准數，對自己沒有一個准數。我有什麼變化，我的工作精力、我的愛好和興趣有什麼變化……說起來，我原來倒是以為瞭解自己的，可是一接觸到柳比歇夫的那些總結，我才明白我其實是對自己一無所知，一點也不瞭解。

……1966年，第一類工作共計1906小時，原計劃為1900小時。與1965年相比，增加27小時。平均每日5.22小時，即5小時13分。

了不起！每天有5小時13分鐘搞純學術工作，天天如此。整整一年沒有休假，沒有節假日！5個小時的純工作時間，也就是說，5個小時內沒有什麼歇一會兒抽支煙的工夫，沒有聊天談話，沒有溜躑散步。仔細想想，這可是一個可觀的數字。

一連幾年的數字結算如下：

1937年

1840小時

1938年

1402小時

1939年

1362小時

1940年

1560小時

1941年

1342小時

1942年

1346小時

1943年

1612小時等

這是基本科研工作的時間，其他一切輔助工作都沒有計入。這是創造和思考的時間.....

任何一項最繁重的工作，恐怕都不會規定這樣的制度。人要給自己規定這樣的制度，只能出於自己的主動。

柳比歇夫的工作比有的工人還重。他大可以像大仲馬那樣，舉起雙手，叫大家看看他手上的老繭，以此證明其言不虛。一年寫了1500頁！洗印了420張照片！這是在1967年。他可是已經77歲了。

俄文書共讀50本

48小時

英文書共讀2本

5小時

法文書共讀3本

24小時

德文書共讀2本

20小時

7篇論文付印.....

由於長期住院，閱讀的時間自然多了，但主要工作的計劃還是超額完成了，雖然有許多事沒有辦好，例如《科學與宗教》一文佔用的時間要比原先預計的多4倍。

年度總結的詳細，比得上整個企業單位的總結。逝去的時間，輪廓勾勒得多麼精緻多麼清楚——那麼些表，那麼些圖，那麼些係數。柳比歇夫被公認是極高明的分類學家和數學統計專家之一，確實名不虛傳。

在其他項內，列入沒有看完的書留下的尾巴——欠下的債。

達爾文《造物的神殿》

5小時

德·布洛埃爾《物理學中的革命》

10小時

特林格《生物學與情報》

10小時

陀布爾讓斯基

20小時

欠債的賬單每年重複一次，債務沒有減少。

有些材料是出人意料的：游泳43次，同朋友、學生交往——151小時，最欣賞哪幾部影片……

他的總結看起來挺枯燥，研究起來卻很有味兒。

人在一年內能幹多少事，能見識多少東西啊！太多了！每一份總結都顯示了人有多大的潛力，每一份總結都使我們為人有那麼充沛的

精力而感到驕傲。人的精力，如果明智地利用它，能創造多少成果啊！此外，我頭一次發現，一年原來有那麼大的容量。

除了年度計劃，柳比歇夫還把他一生的時間制訂成一個個五年計劃。每過五年，他就把度過的時間和幹過的事分析一通，可以說是做個總的鑒定。

.....1964至1968年.....在跳甲屬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如果能在下一個五年計劃完成論述大田跳甲屬的專著，就滿意了。收集完畢，但我並不指望在下一個五年計劃中能確定各族系之間的差異.....由此可見，雖然在形式上我哪一項都是連一半也沒有完成，然而各項工作都有顯著的進展.....

他的工作，面一般鋪得很廣。上面提及的那個五年計劃，要搞數學、分類學、進化論、昆蟲學和科學史。所以，總結也好，計劃也好，都分成許多項、許多小項。

時間統計好當然是好，可是對不起，這到底有什麼用呢？有做統計的時間，是否不如去幹些實際的事呢？節約出來的時間是否浪費在這些總結上了？

儘管我們敬佩驚歎，還是有人提出許許多多譏諷嘲笑的問題。

當然嘍，首先在心靈深處一定是在挖苦：誰需要這些總結？說實在的，誰會去看它？不客氣地說一句，他要向誰匯報呢？並且還用書面匯報。

不管怎麼說，心靈並沒有把做這些總結簡單地看成一項自願的、從實用出發的工作，所以總在探究某種秘密的原因和動機。什麼都想到了，就是沒有想到是關心自我——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對自己內心

世界的關心和興趣。是研究自我？真奇怪。他反正是怪人。我們要做到心安理得，最好把他看成怪人：人世間怪人還少嗎？

要點

- 柳比歇夫隨時隨地利用「時間的下腳料」：散步時捕捉昆蟲，開會時演算習題.....英語就是他利用「下腳料」時間學會的。

- 柳比歇夫把一天中有效工作時間定為10個小時，分成3個單位，對應在三類工作任務上。第一類包括寫作、研究和例行工作；第二類包括非科研性的活動；第三類則是需要創造力的任務。每項活動佔據的時間必須與其重要性相稱。

- 年度總結會把一年中做的所有事情統計出來，例如：游泳43次，娛樂65次.....清楚地顯示出時間的用途，瞭解自己在一年中能做成多少事情。

第八章 時間之鏡

柳比歇夫的總結公正客觀地反映了過去一年的歷史。柳比歇夫的方法，以它細密的網眼，抓住了變幻無常的、老想溜掉的日常生活，抓住了我們沒有察覺到的、損失掉的、不知去向的時間。

這些總結要用多少時間？這項支出原來也統計過了。每份小結、總結的末尾都註明了它們的代價——多少小時多少分鐘。詳細的每月小結要耗費1.5到3個小時，統共才這些。再加上制訂下個月的計劃用1小時。合計是2.5到4個小時，而每個月的預算有300小時。1%，至多2%。因為每月小結是依據每日的記錄，而每日的記錄只用幾分鐘，不會更多。彷彿是那麼輕巧容易，誰想這樣辦都可以辦到……幾乎是習慣成自然了——像給表上弦一樣。

年度總結耗費的時間要多一些，十七八個小時，也就是說，要花幾天的工夫。

做年度總結，要求進行自我分析、自我研究：效率有什麼變化，什麼沒有完成，為什麼……

柳比歇夫以他的總結為鏡。這面鏡子的水銀有點兒特別：它照出來的不是人現在的面目，而是他過去的面目，才過去不久的。在一般的鏡子面前，人在他自己的目光逼視之下，總要裝出一副樣子，裝成什麼樣子倒無所謂，主要的是要裝。鏡子裡照出來的，是他希望的那副模樣。日記也會歪曲，不能真正反映人的心靈。

柳比歇夫的總結公正客觀地反映了過去一年的歷史。柳比歇夫的方法，以它細密的網眼，抓住了變幻無常的、老想溜掉的日常生活，抓住了我們沒有察覺到的、損失掉的、不知去向的時間。

我們的記憶是靠什麼？靠事件。我們的生活是拿事件來做標誌的。它們彷彿是路標，路標之間卻是一片空白……比方說，自從我寫柳比歇夫的小說以來，最近這幾個月的光陰都跑到哪兒去了？伏案寫作的時間本身並不多，這些日子都幹什麼了？我可是幹事兒來著，一直忙得很，究竟忙些什麼，卻記不起來。是瞎忙還是忙的正事——這90天該怎麼總結呢？光這幾個月倒也罷了……以往，年輕的時候，每逢過年，我總是猛然想起，一年又過去了，我決心要做的，並且也向別人保證了的，又沒有做成——一部小說沒有寫完，諾沃戈羅奇納沒有去成，有些信沒有回復，同誰沒有見成面，又是什麼沒有做……拖啊拖，結果是拖無可拖了。

如今我盡量不去回顧。隨遇而安吧，干了就算了。債務太多了。

當然，我也不願意承認我是破產了。最好不去想它。最聰明的辦法是對自己的生活別去思考。

用柳比歇夫的榜樣來責備自己嗎？這還得研究研究。這些個統計和總結會把人變得乾巴巴的；唯理主義和時刻表會把機體變成機械，幻想喪失殆盡。我們本來就已經被各種各樣的計劃壓得喘不過氣了——什麼學習計劃、廣播節目表、科室計劃、休假計劃、冰球比賽程序表、出版計劃。不管什麼事，一切都事先計劃得好好的。意外的事情鳳毛麟角。奇遇是絕無僅有，連偶然性也絕跡了。至於事故，報紙上一星期只登一次，在最後一版。

把自己的生活逐時逐分地事先計劃好，安排得像工廠裡的流水線作業——這值不值得？眼前放著一台計算機，不停地計算著你的失誤

以及你對自己的放縱——這未必愉快！

《驢皮記》²⁰是最可怕的一個傳說。不，不，人最好別跟時間發生直接的、公務以外的關係；不管你多麼留神，這個該死的時間是怎麼也躲不過去的，連最著名的哲學家面對著它那黑魘魘的吞噬一切的深淵也會張皇失措……

柳比歇夫的方法，推翻它要比理解它容易。何況柳比歇夫並沒有把它強加給任何人，並沒有推薦給大家使用——它無非是他個人的工具，方便而不起眼，好比眼鏡、用慣了的煙斗、手杖……

說不定這個方法是一種無休無止的克制？再不然——誰知道呢——是一場延續多年的論戰？同什麼論戰呢？同一般的生活論戰，同頹唐萎靡的願望、周圍一般人那種大手大腳論戰，同對幾分鐘滿不在乎的願望論戰。

要點

·柳比歇夫以總結為鏡，檢查自己的工作效率。

第九章 時間統計法的勝利

柳比歇夫是依靠他那最合理的方法一手造就了自己；他創造了他的方法，他通過他的方法證明，如果把一切才能集中用到一個目標上，可以取得多麼多的成就。

看了他的總結和日記，部分是看了他的信，一個鋼鐵般的人出現在我面前：什麼都阻擋不了他去完成既定的任務。計劃生活的騎士、機器人，獻身於他的方法的苦行僧。

1942年，他兒子符賽沃洛德陣亡的噩耗傳來，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儘管滿腔悲痛，卻仍舊一絲不苟地繼續工作。

1942年的計劃，他是這樣規定的：

.....

(1) 我全年在普爾熱瓦爾斯克。

(2) 不兼職。

(3) 在應用昆蟲學方面我本人不準備做很多工作，只限於領導以及研究伊塞克·庫爾州的動物誌.....因此第一類工作總量，計劃可達到1937年的水平（該年的效率是創紀錄的）。但，第一，由於戰事，無法出書；第二，我在基輔的學術文檔肯定已全部被毀；第三，以我的年歲說，不能再拖了，必須立即開始完成我一生的主要計劃——《理論分類學與自然哲學》。根據以上三個原因，1942年的基本工作方面

不擬寫成什麼學術著作，只有三個不長的學術政治性報告要完成。

計劃了，也完成了。1942年是效率極高的年度之一。個人的悲劇彷彿沒有波及他的工作精力，在日記、總結和計劃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到時候了，到不能再拖、必須立即開始的時候了。他似乎計算過，他還剩下多少時間去完成他一生的大業。

私生活和心境不能妨礙工作。心境及其他的喜怒哀樂自有它們的時間，統統放在「家務」欄裡。

我這話說得唐突了。雖然第幾研究所的遙控實驗室主任——一個30歲的技術科學副博士，他對我說，這並不是唐突，而是強調人所需要的品質。他說，眼淚無助於消弭痛苦，人要控制自己，越快越好；為死者哀慟——這是宗教感情的殘餘；死者不能復生，哀慟有什麼意思？

「殯葬儀式已經過時了，」他說，「您一定會同意，追悼會上那些動感情的講話只會叫親屬傷心，不會有任何安慰。這辦法不合理。現代的人應當是唯理主義者，而我們卻對理智感到難為情，總想濫用感情，叫自己溫情一些。」

他建議我通過柳比歇夫創造一個現代科學家的理想典型。計劃性達到最大限度，不動不必要的感情，善於從周圍環境中獲取盡可能多的東西，當然，同時要高尚正派……

「……順便說說，我可以奉告足下，這是理智的結果。意志和理智是兩個決定性的因素。如今，必須有鋼鐵般的意志，和理智配合在一起。只有這樣，才能在學術上取得什麼成就。唯理主義者老是挨

罵。說實在的，為什麼要罵？如果一切都出於理智，這有什麼不好？理智同道德並不矛盾。恰恰相反。真正的理智歷來反對卑鄙和任何下賤的行為。聰明人懂得，歸根到底，道德要比不道德有利。」

他的既天真又聰明的議論，流露出他的苦悶，流露出他的一種願望，想找到一個可以依靠的榜樣。他需要一個巴扎洛夫，需要一個合乎理性的理想人物，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這個科學家之所以取得成就，是依靠合理安排、合理計劃的生活；他的英勇的、道德高尚的行為是出於理智而不是出於感情。

如今，這個理想人物終於出現了：有這麼一個人，才不出眾，結果達到了完美的境界，成為一位大科學家、一個出色的人。這都是他自己一手造就，是他自己促成了自己的進步……在這方面，柳比歇夫是個再合適不過的人選——可以說，他是依靠他那最合理的方法一手造就了自己；他創造了他的方法，他通過他的方法證明，如果把一切才能集中用到一個目標上，可以取得多麼多的成就。只要連續多年有系統地、深思熟慮地採用他的方法，可以超過天才。他的方法似乎使才能提高了。他的方法是遠射程的槍炮，是把所有光線集中到一點的凸透鏡，是加強器。它是理智的凱歌。

柳比歇夫按照他那盡善盡美的幾何學來安排他的生活，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了。他的漫長的一生，沒有重大的偏差，確認了他的方法的勝利。他在他自己身上做了實驗，得到成功。他的一生，是按照理智的法則安排的楷模。他學會了保持穩定的工作精力；他生前最後20年，做的工作一點不比他青年時代少。他的方法有益於他的身心……不必去介意那些說什麼機械性的責難。對理智也好，對心靈也好，機械性並不可怕。精神要去害怕科學和唯理主義，那多害臊！如果真是這樣，那不該讓機械性同精神發生衝突，而該讓奴性的精神同崇高的

精神交戰。從知識和思維活動中得到豐富的精神，會擺脫機械性的控制奴役.....

由此可見，我本可以向所有那些具有鋼鐵意志的技術專家，向我的在研究所和設計院工作的朋友們，向一切年輕的副博士和前程似錦的博士們，向一切憧憬著成就以及傾心於科學超人的人，介紹這位了不起的、並非虛構的英雄。他有名有姓有出處，同時又是一個理想人物，取得了最大的有效係數。他所有的數據都一清二楚，創紀錄的指標項項俱在。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同時又是人為的產物，是自我創造的結果，令人五體投地。

我的那位朋友其實並不在乎這一切翔實可靠到什麼程度，他不大關心我的主人公是否與真實的柳比歇夫一致。與原型有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主要的是要通過這個例子來強調主題思想，所謂完全為主題思想服務，就像果戈理那樣.....

他這一切，倒是想得相當巧妙，也有說服力，甚至叫我動了心。但活生生的柳比歇夫不讓我這樣做。我認識的那個柳比歇夫，見過面，談過話，根據日記的記載，談過「1小時35分」和「1小時50分」，另外還談過幾次——是這個柳比歇夫不讓我這樣做.....

要點

·柳比歇夫的一生證明了，連續系統地使用時間統計法，可以幫助個人把一切才能集中於一個目標上，取得超越天才的成就。

第十章 光亮的背面

他能夠叫時間服從他，但不能左右環境。他無非是個凡人，激情、愛、挫折都能叫他分心，連幸福也會影響他的專心致志。

其他的事實

實際上，一切經過稍有出入。或者說，我列舉的事實都是絕對確鑿的，但除了這些事實還有其他的事實。它們破壞了畫面，有損於結構的嚴整，有沒有必要去考慮它們呢？文學和藝術不得不挑選事實，有的剔除，有的保留。畫家畫人的肖像，或畫正面或畫側面。人的一半總是隱藏在畫面的後邊。

書頁也是一種平面。我力爭做到的，並不是立體，而只是立體感。互相矛盾的事實有損於形象的完美。它們會把鑄件成品炸成小碎片；顏料脫離了畫，在畫布上亂晃蕩。

我要是不認識柳比歇夫，一切都會好辦些……

兒子的死，他傷心了好多年。他那個時期所有的信札，連篇累牘地回憶他的兒子，喪子之痛溢於言表，那是一種男子漢的有克制的痛苦，但是久久不能平息。他抓住呆板的生活作息制度，好比滑水運動員緊緊抓住汽艇的纜索，一鬆手，一失去速度，他就會沉到水底。有些時候，他是如此煩惱苦悶，以致只能機械地記日記，機械地做昆蟲標本，機械地填寫標籤。科學失去了意義。他挨受著寂寞孤獨的煎熬，沒有任何人同意他的見解；他知道他將證明是對的，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很多時間，需要孤零零一個人跋涉，橫越一片沙漠，可是力量不夠了。

他能夠叫時間服從他，但不能左右環境。他無非是個凡人，激情、愛、挫折都能叫他分心，連幸福也會影響他的專心致志。

第二次結婚給他帶來了盼望已久的家庭的寧靜安謐。婚後不久，他寫信給他的朋友兼老師：

.....純粹是家庭中的融融之樂，使我撇下了我往常的生活小天地。您是我的朋友，我向您坦白，連我的學術興趣也陡然低落了。親愛的朋友，別責怪我，過去我有不少罪孽都得到了您的寬宥，這次仍請您原諒吧。這並不是對科學的背叛，而是一個軟弱的人度過了嚴峻的生活，如今來到了草木繁茂的綠洲，流連忘返.....

柳比歇夫的自我評價

坦白，即使是對朋友坦白，也需要精神上的力量。人總不能每天做懺悔。柳比歇夫每天能做到的，僅僅是在他的日記中做記錄，然後算出他軟弱到什麼程度，算出他為幸福付出的代價。在自己的面前做到這樣坦率，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意志來自何處？他從哪兒汲取力量在一條孤獨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身上那種在風雨飄搖之中屹立不動的精神是怎麼形成的？這歷來都很奇怪——唐吉訶德們、聖徒們、苦行僧們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人沒有明顯的或者不明顯的動機突然變成了革命者，非要走上鬥爭的艱苦的道路？有客觀情況的作用，有環境的影響，可是也有並且常常有本身的基礎，有某種注定了的東西，即古時候稱之為「命運」的那個東西。

我摘引一段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給伊凡·伊凡諾維奇·施馬爾高森的信（1954年）：

簡短地回顧過去，以便更好地理解現在

（論基因儲備）

……我出於老年人的嘮叨，想向您說明我從我祖先父母遺傳來的基因儲備。

您大概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當時受過相當「專門」的教育：他們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農奴。但即使這樣，他們也沒有喪失蓬勃的朝氣，買賣做得很順手（看樣子，他們是交田租的農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說，我的染色體中有樂觀基因，更確切地說，是樂天基因²¹。我的曾祖父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死於霍亂。我的祖父阿歷克賽·謝爾蓋耶維奇在八九

歲時，幾天內接連死了母親、父親和兩個姑母，都是得霍亂死的。但樂天基因的作用太強了，親人落葬時他竟哭不出來；為了裝樣子，擠出幾滴眼淚，只好用洋蔥。後來，他不管說起什麼往事，甚至是那些傷心事，他都是笑呵呵的。倒不是他這個人心狠，也不是對人們的痛苦麻木不仁，正相反，他這個人最好了，無非是樂天基因在起作用。

我的爸爸也是個樂天派，從來不垂頭喪氣，不管環境多惡劣，他所有的熟人對他的樂天都真心地感到奇怪。同我的先人相比，我這個後代當然是退化得相當多了。但就連我，在別人眼裡，也是個樂觀的人。

我身上另一種基因，多半是從母系遺傳來的，可以叫作爭論基因或饒舌基因：愛多嘴多舌，愛抬槓。我母親娘家姓鮑爾土什金²²。明擺著，我的祖先得到這個姓不是偶然的。我的外祖父德米特裡·瓦西裡耶維奇極愛抬槓；他每次坐火車，總要特地找那些愛爭論的人坐在一起——不同他抬槓的人不稱他的心。

我從先人那裡無疑還繼承了流浪基因²³，甚至是冒險基因，這是不足為怪的，因為我的父母都是諾夫哥羅德省諾夫哥羅德縣的人。大家知道，諾夫哥羅德人都是地道的流浪漢……

……為了證實這個流浪基因，我可以援引以下材料：

(1) 我的外祖父德米特裡·瓦西裡耶維奇年輕時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學，但又被騙回了老家；(2) 我的舅舅瓦西裡·德米特裡耶維奇在1877年俄土戰爭前夕志願從軍，參加了契爾尼亞夫斯克支隊；(3) 我的祖父阿歷克賽·謝爾蓋耶維奇酷愛

出門漫遊。因為當時還沒有旅遊業，所以他總是漫遊聖地，曾先後兩次到耶路撒冷。

不管是我還是我的妻子（她的母親，娘家也姓柳比歇夫），都一點也不留戀我們的故鄉列寧格勒。我們和大多數染色體中沒有流浪基因的列寧格勒人不同，並不想在那裡定居。

應當說，我的祖先身上還有反教條基因。我上面提到的外祖父德米特裡·瓦西裡耶維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個伏爾泰主義者；他閱讀過達爾文和鮑克耳²⁴的著作，是個頗富於自由思想的人……我永誌不忘的父親，也不是個教條主義者。他是個虔誠的正教徒，但絕沒有宗教的狂熱和偏見。按照薩爾蒂闊夫·謝德林的說法，他的信教不是因為怕鬼，而是因為愛上帝。他的上帝和高爾基外祖母的上帝一樣，是善和愛的神。每逢過節，他照例上教堂做禮拜，由衷地感受到正教儀式的美。但一碰到機會，例如在國外，他又去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每次途經華沙，他又必定要到猶太教堂去聽唱聖詩。我的父親沒有上過多少學，在村子裡讀的書，過去所謂的「讀私塾」，職業是商人。似乎可以料想到我們家一定是個古板的舊式家庭。沒那回事！我很小就同我父親爭論政治問題，爭得熱火朝天（父親的政治觀點很溫和，因為他不希望發生革命），然而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閉上嘴，我大你小！」他在爭論中總是把我當作平輩。

我可以說，我大概從父系方面還繼承了撈基因。我的高祖父阿爾捷米·彼得羅維奇（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祖先）當初姓札格魯賓²⁵，這個姓純粹是個富農的姓。我上面說過，他雖然是個農奴，卻做著買賣。可是，在我們一族，撈一把

的興趣，表現方式各不相同。我父親，表現在物質上（他是實業家，進取精神肯定不亞於美國人）；在精神上無疑也有所表現：他從小努力自學，對學問十分熱衷，至死不變。他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去世的，終年86歲。我在物質上撈一把的興趣低落了。我的父親當初因此很傷心。有少數幾個人很賞識我的辦事能力，他便是其中的一個。他有時候歎著氣說：「唉，要是薩沙²⁶能幫我忙就好了，我們能把半個諾夫哥羅德省都買過來。」我選擇了科學事業，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這些個唉聲歎氣中流露出來。他非但沒有阻撓我的事業，還千方百計幫助我。革命後，他自然用不著為我做出的選擇遺憾了。精神上撈一把的興趣，我是全部繼承過來了，我努力獲取各種各樣的、越來越廣泛的知識，始終樂而不倦。

最後，我的基因儲備中肯定還有好心腸基因。

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說明這一點²⁷。最早姓這個姓的，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謝爾蓋·阿爾捷米耶維奇。他跟人打招呼，老愛說「好心腸的老兄」，由此產生了我們的姓。我的父親心地特別善良，總是把別人看得很好，比他們本來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鐵證如山，無可懷疑了，他才會相信人家議論那些人的壞話。

這便是我的譜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質得於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誌不忘的父親，但看來也有許多得於我的外祖父德米特裡·瓦西裡耶維奇。從小他就特別喜歡我，雖然總的說來他是不特別寵孩子的。

柳比歇夫的自我評價，說明了他在精神方面的標準。說不定，這是他這個人身上最重要的東西。因為每當科學與精神品質發生衝突，

我首先關心的是精神品質。不僅僅是我這樣。似乎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伊凡·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德米特裡·伊凡諾維奇·門捷列夫、尼爾斯·玻爾²⁸的精神面貌，比他們的學術成就的細節更為重要。就算這種比較是虛擬假設的吧——我為了強調我的想法，不怕做出任何虛擬假設。一個科學家，他在學術上聲譽越高，他的精神品質水平也越叫人感興趣。

生活的內容並不是苦難，而是成果

伊戈爾·庫爾恰托夫和羅伯特·奧本海默²⁹的學術工作大概是可以相提並論的。但人們總是傾心於庫爾恰托夫的崇高功勳，而對奧本海默災難深重的悲劇卻是沉思默想，思緒萬千。人的精華中，最值得稱道、最牢固的，是精神價值。一年年過去，學生們沒有一點遺憾，若無其事地換了導師、師傅、老師，換了頭頭，換了心愛的畫家和作家。但是，誰要是有福氣遇見一個純潔的、精神世界很美的人，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給他，這樣一個人——誰要是遇見了這樣一個人，就沒有什麼可換了。因為人不可能長進得超過善良或真誠。

柳比歇夫的信札中，不時出現自我評價。他評論自己，都是為了比較。這些自我評價，展示了柳比歇夫及其師友的精神面貌。

醫學科學院通訊院士巴維爾·格利戈裡耶維奇·斯維特洛夫，是柳比歇夫的一個朋友，曾研究著名生物學家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貝克列米捨夫的生平。為這件事，柳比歇夫曾寫信給斯維特洛夫：

.....你漏掉了一個特點，那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特點：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出奇地委婉、沉著鎮靜.....因為我在這方面恰恰做得最差，所以我老是向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學習他的這個優點。我這人很刻薄，我的批評常常刺傷了別人，甚至是我親近的人。誠然，這並沒有損害真正的友誼，並且被批評的人常常變成了我的朋友，但往往是流了很多的眼淚。

.....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好像很糟糕），休息時喜歡看古羅馬作家的作品，雖然我記得他

也看希羅多德³⁰的東西，不過好像看的不是原文。這是他作為休閒幹的事，同他的學術工作沒有關係.....我記得我同他談過但丁。他是個最熱忱的但丁派（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他認為世人對但丁賞識不夠。我承認但丁的詩篇確實很美，但並沒有感覺到他的世界觀的崇高。相反，但丁有許多地方叫我十分氣憤。拿他的地獄篇來說，其中素負盛名的開場白（全憑記憶；是否準確，沒有把握）：

Per me si va nella citta dolente,

Per me si va nell' eterno doloer,

Per me si va tra la perduta gente.

Giustizia mosse il mio alto fattore,

Fecemi la divina potestate,

La somma sapienza e il prima amore.

Dinanzi a me non fur cose create,

Se non eteme; ed io eterno duro.

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³¹

或在另一處：

Chi e piu scelleranto' chi colui

Chi a giustizia divin compassion porta.....

.....這兩行的意思是：誰要是憐憫被上帝判了罪的人，那就是最大的惡棍，還有誰比這種人更壞呢？這兩行的上文是這樣的：但丁在地獄裡遇見了他的一個政敵，他請求但丁想個什麼法子減輕他的苦楚。但丁答應了，但事到臨頭他又改變了主意，食言了，並且幸災樂禍地嘲笑他敵人的痛苦.....這還不如那種冷酷無情的多米尼克主義³²，比起對朋友和親人鐵面無情，這還要惡劣得多.....他的全本《神曲》絕不是神的，完完全全是塵世凡俗的.....這兩行以及其他許多地方，從宗教的眼光來看，首先是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是不可理解的。而在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的心目中，但丁不僅僅是個傑出的詩人（這我不否認），並且還是個有先見之明的智者，他的「慧眼」看到了凡夫俗子的肉眼看不到的東西。這樣的分歧，在我與許多我這樣的人之間顯然也是存在著的。那些人不僅把莎士比亞看成是傑出的戲劇家，不僅把普希金看成是傑出的詩人，並且還把他們看成是人類思想的領袖，這是我決不能苟同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弟子在古希臘悲劇中已經達到的道德高度，在但丁的作品裡可是完全消失了。就這樣，在但丁的問題上，我同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的看法沒有取得一致。

.....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把他的興趣做了那樣的分類，我以為是種樂觀的做法。除此之外，他對蚊子的研究使他得到很大的精神享受，因為這項研究對人民有直接的好處。至於說到有許多計劃沒有完成，那麼我認為，任何一個涉獵面很廣的人，計劃都是太多了，不可能都完成。

.....如果我的刻薄再加上偏執，便會招致許多冤家對頭。我的優點是在論戰中從來不抱著個人的目的。至於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他善於把同樣嚴厲的批評表達得非常

婉轉。我的性情自然比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快活，愛胡鬧，愛裝傻。我小時候從不打架，也不愛打架，總的看來，外表很文靜。但鬥智我是喜歡的，而且在鬥智中我像拳擊運動員一樣：我有權打人家，同時感覺不到人家打我。這辦法沒有一點壞處，我沒有結冤家；我在許多國家住過，同各種各樣的人都處得很好。

.....有一點我比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強，他也是承認了的，用他的話說，我身上有很大的空想的勇氣，具有巴扎洛夫那種真正的虛無主義，也就是說，不承認有什麼東西可以不受理智的批判.....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有一套他認為絕對正確的條條框框，所以他要比我偏執。不過，他的偏執從來不流露出來。我們已經忘了偏執的真正含義，結果，任何一種批評（批評也就是捍衛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見解的權利），我們都把它看成是企圖把自己的見解「強加」於人，也就是說，把批評看成了偏執。但是，我們唯一能夠使用的力量，是理智的力量，而理智的力量不是暴力.....克魯泡特金有句話說得很出色，我記得很清楚。他說：「人比機關好。」這句話，他是針對沙皇保衛機關的人說的。我可以補充一句：人比信仰好。

出於許多原因，部分是我自身的原因，部分是外界的，我從1925年開始搜集昆蟲（主要是地蚤）。就在這個時間前後，我開始在彼爾姆大學教農業害蟲方面的課。

美國人布利斯，我同他一起出過差，到過烏克蘭，到過高加索。我穿衣服，向來不在乎旁人的看法，穿得很寒酸。關於這個問題，布利斯對我說：「您的衣著舉止不拘小節，獨行其是，我很佩服，但遺憾的是，我沒有勇氣學您的

樣。」這樣的恭維話，出自一位地道的聰明人之口，抵消了庸人們成千上萬次的白眼……照我看，一個學者的衣著最好保持最低水準，過得去就行。因為：（1）有些人，把穿一套好衣服當作真正的樂趣，何必要同這些人比賽競爭呢？（2）穿樸素的衣服，行動方便自如；

（3）稍有些故作「癡狂」並不壞：小市民會對你有些譏諷嘲笑，這是一種有益的心理上的鍛煉，能讓你培養我行我素的精神……

你們可以看出，我在這裡摘引的句子段落，是經過選擇的，能說明柳比歇夫的性格，說明他和他那一班人的文化修養。

他們能夠爭論但丁的短長，讀他的原著，背誦他的原文。他們能夠憑記憶援引蒂托·李維³³、賽納卡、柏拉圖的話。是因為受過古典教育嗎？可是他們也熟悉雨果和歌德，俄羅斯文學更不在話下。

向自己提問題

他的信會讓人誤認為他是搞文學研究的，並且還是個專家。柳比歇夫的文檔中保存著他寫的幾篇論文，論列斯柯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論羅曼·羅蘭的《革命的戲劇》。

說不定文學是他的嗜好？沒那回事！它是一種自然的需要，是一種無所企求的愛。他並沒有企圖搞文學研究。這是另外一種什麼東西——這種稟賦如今是被遺忘了：他不能光是欣賞藝術；凡是讀過的、看到的、聽見的，他都必定要去設法領悟。他彷彿是要把這一切都消化了，以充實他的人生觀。不管是但丁還是列斯柯夫，他對他們的作品領悟得越充分，從中得到的享受也越多。

他在某一封信中引證了席勒的作品，成段成段地摘引《瑪利·斯圖亞特》和《奧爾良的姑娘》。引著引著，結果整場整場的戲都引上了——覺察得出柳比歇夫是忘乎所以了，抄啊抄啊，由於有機會複述他心愛的獨白而自得其樂。總的情況也是如此.....

這些人的文化修養、廣度和深度都比得上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人和法國的百科全書派。當時，科學家同時是思想家。科學家善於使本學科與整個文化之間保持和諧一致。科學與思想攜手並進。如今，這種友好合作關係被破壞了。現代的科學家認為必須做到的是——知道。他下意識地感覺到專業化的危險，想求助於他慣用的辦法——知道，以此來恢復均勢。他以為文化是可以「知道」的。他「注視」著新東西，讀書、看電影、聽音樂。表面上看，他彷彿是惟妙惟肖地複製了一切必要的動作和行為，然而並沒有心領神會。藝術的精神方面，他並沒有感受到，沒有領悟。他「知道」，他「熟悉」，他「瞭解」，他「通曉」，但是這一切幾乎不能稱為文化修養。

「我們的任務可是研究具體的東西。」我的那位技術專家說。

他陶醉於他的電子學的威力，陶醉於他的超微型電子管及其神奇的性能——他的電子管能給人類提供更大的單位功率。

「對於一般性的問題不一定要去思考，這不屬於我們的職責，而且誰用得著呢……不過，」他愁眉苦臉了，「把這一切問題都思索一番倒也好……可是哪兒有時間呢？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搞的。當然，如果有條件的話，如果能坐在書齋裡……」

柳比歇夫也好，貝克列米捨夫也好，都不是在書齋裡討生活的學者，他們誰也沒有特別優越的生活條件，誰也不是與世隔絕，不聞不問戰前和戰爭年代的憂慮、風雨和苦難。現實生活並沒有放過他們，他們同樣遭受過不幸，吃過苦頭。然而，你看他們的信，便可以明白，他們生活的內容並不是苦難，而是成果。

柳比歇夫在蘇聯植物保護研究所工作的時候，不得不兼課，兼任其他單位的顧問。需要幫助妻子，需要養活一大家子人：

……我原來想著除了應用昆蟲學以外，還要研究分類昆蟲學和一般生物學問題……但沒有做多少。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去跑商店，去排隊買煤油和其他東西。妻子也有工作，很困難。我數學搞得相當多，乘電車、坐火車，都在鑽研，甚至在開會的時候演算習題。有一段時間，人家對我側目而視，但到後來他們發現，我演算習題並沒有耽誤聽別人的發言；我是通過我在會議中間的插話證明了的。所以他們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出門途中，我也看很多哲學書，例如康德的三卷《批判》，我都是在路上看的。在哲學問題上，我記得我寫過一篇（唯一的一篇）相當長的論文，約有一百

張練習簿紙，分析康德的《純理性批判》。這部手稿在基輔丟失了……

人民的生活便是他的生活；人民生活中五光十色的側影同樣反映在他的生活中。叫人奇怪的，倒不是他在那樣的條件下能擠出時間來研究康德，而主要是他光看書還不夠。他的渴望求知的天性必定要這樣那樣地去消化品味，按照他的需要去吸收。他看了康德的作品，便寫了一篇論文，分析康德的主要著作，批判地選擇他合意的東西。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東西。

一般人的意見也罷，公認的權威也罷，對他都不起作用。在他看來，某種思想是否有權威，並不取決於擁護這種思想的人有多少。

他認為他是虛無主義者，屠格涅夫所說的那種虛無主義者。屠格涅夫說：

「虛無主義者是這樣一種人，他不膜拜任何一個權威，他不信仰任何一個原則，不管這個原則多麼受到人們的尊重。」就柳比歇夫而論，只需要再補充一點：他的虛無主義是創造者的虛無主義。在他，重要的並不是推翻什麼，而是代替；不是駁倒什麼，而是信服……

他的頭腦深處，有什麼東西在那裡翻騰。某些地方，其他任何人都見不到有真理存在，他卻在那裡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經確立了不可動搖的真理，他卻在那裡探求懷疑。

他身上有一種向自己提出問題的需求，這些問題，人們是早就放棄了的。自然界的實質、進化的實質、合理性等——這是一種不合時宜的、迂腐的需求。

他的可貴，在於他努力做出回答，不怕有錯誤。他喜歡把學校教學大綱中載入的標準答案撇到一邊。

他這個人雖然極其特別，但不是獨一無二的。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林尼克、伊戈爾·葉夫根尼耶維奇·塔姆、巴維爾·格利戈裡耶維奇·斯維特洛夫、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恩格爾哈德等人，柳比歇夫同他們的來往書信，反映出彼此高度的文化修養和崇高的情操，令人賞心悅目。看了這些信，禁不住又羨慕又難過——隨著這一代人的逝去，本世紀初和十月革命時代的俄羅斯文化即將成為明日黃花、過眼煙雲。

要點

·柳比歇夫在精神方面對自己的要求和在研究上一樣嚴格，他不斷對自己提問，追求真理。

·柳比歇夫沒有特別優越的生活條件，經歷過戰爭年代，但他把一切苦難化為成果。

第十一章 井井有條的生活

無數的日期、姓名、事件，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應用起來簡直得心應手，這是因為他把這些材料都按一種巧妙的體系分別銘刻在頭腦之中。至少可以這麼認為，當需要的時候，即使不能「記憶如泉湧」，他也能像從書架上抽出一本需要的手冊一樣，在腦中找到這些材料。

分門別類的愛好

列寧格勒大學³⁴保存著德米特裡·伊凡諾維奇·門捷列夫的故居。故居紀念館是有點特殊的。參觀這種紀念館，也應同參觀普通的紀念館有所區別，不能只是走上一圈，應該沉浸在其中。在故居紀念館，你感覺不到歲月的流逝。在這裡，一切都未加變動。我喜歡這種紀念館，因為它們保存了舊日的真實圖景。這裡一切照舊，不是複製品，而是遺物。大學的庭園、前廳的喧囂聲、窗下的灌木、拱頂和傢俱——一切景物依然如舊。

故居紀念館中存放的似乎都是些陳舊和沒有生命的東西，實際上，紀念館重新賦予這些古老的東西以生命，保存了它們的生命。對一個紀念館來說，死亡並不是終點，而是存在的開端。普希金、契訶夫、涅克拉索夫的故居都具有難以解釋的感召力，似乎主人們的精神繼續活在這些屋子裡。每一個人在自己內心都有一所紀念館；每一個人都有保存自己良心和感受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回憶錄，都有自己珍愛的地方。更確切地說，是這些地方的形象，因為這些地方本身說不定早就無影無蹤，或者完全變樣了。

我認為城市博物館不僅應當保存偉大人物的故居，而且應當保存一般人的寓所。我希望能把艱難的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公共寓所，包括寓所中的公用廚房，一起保存下來。廚房裡塞滿了一張張小桌子，小桌子上擺著煤油爐子，煤油爐子旁邊放著通煤油爐子火眼的細針和夾著細針的洋鐵條。我希望打掃公共場所的值日表仍舊掛在那裡，一捆捆碼好的劈柴仍舊堆在前廊、過道和房間裡，堆在爐子波紋狀的鐵支架後面……

我們曾經這樣生活來著。我們的父母也曾經這樣生活來著。

……門捷列夫書房裡的一切，都同主人生前一模一樣：書桌、書架、書櫥、沙發和長長的目錄卡片抽屜。正是這些目錄卡片抽屜最先引起我的興趣。目錄卡片是門捷列夫親手填寫的。他收藏的雜誌上的文章、書籍和小冊子的名稱都登記得整整齊齊，每一張卡片上都標了書號。目錄卡片還有索引。編目的分門別類和整個體系，都是門捷列夫設計，並由他親自動手製作的。他的藏書共計有16000種。從形形色色的雜誌中，門捷列夫把需要的文章另行分類，裝訂成冊。要這樣分類，必須有一個原則，有一個分門別類的體系。大家都知道，書籍，特別是雜誌上的單篇文章，如果不編入系統的圖書目錄，往往就會湮沒在浩瀚的藏書之中。

在那個年代，科技書籍已不容易尋覓了。門捷列夫填寫了成千上萬張目錄卡片，一沓沓裝訂好，用不同顏色的墨水標上記號——我認為，他做這項工程浩大的工作是出自他的需要，出自工作的需要。在需要的情況下，人什麼都能學得會。沒鞋穿，就能用樹皮編成鞋。不管門捷列夫願意不願意，他不得不擠出時間來做這項例行的公事。

後來，人們又給我看了另外一些抽屜。他做的這些卡片目錄還附有另一種小卡片和記錄本，上面記載著這一套卡片目錄的索引。在這些抽屜裡的卡片上，門捷列夫登記了他收藏的石印的、手繪的和複製的圖片。這些卡片似乎沒有直接的用途，然而他還是填寫了幾千個名稱；照例都是系統地加以分門別類的。

我看了門捷列夫粘貼每次旅行帶回來的照片的紀念冊。實際上，這是些帶有匯報性質的紀念冊。紀念他美國之行的那本冊子裡，粘貼了宴會的請帖、菜單、一些紙制紀念章和明信片。門捷列夫自己洗印照片，自己粘貼，並注上說明。他也收藏書信。他把全部的信件按某種體系裝訂起來；他又按另一種體系記事，做日誌和記載日用賬目。日復一日地記，每一筆花銷都記，哪怕是幾個戈比也記。我如果只看

見這些賬本的複製品的話，即使是門捷列夫檔案庫公佈的，我也會斷言，這不是胡鬧，便是吝嗇和怪癖——簡言之，這不過是一位偉大人物的一個弱點罷了。

但擺在我面前的是實物，這些實物有著魔術般的特性——從中可以追溯和瞭解某些東西……

紙張、筆跡、墨水繼續散發出書寫人手上的熱氣，透露出他的情緒。我感覺到，當筆尖滑過紙張時，他毫無不耐煩和索然無味的心情，他專心致志地，甚至還帶著點欣喜的心情在寫。

我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柳比歇夫的一段自白：

……我像是果戈理筆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像他一樣在抄抄寫寫中找到樂趣……在科研工作中，我非常願意做純事務性的工作。

顯而易見，門捷列夫也把這類事務性的工作看成是休息，是享受。從柳比歇夫身上就可以看到，分門別類的愛好可以體現在一切嗜癖之中，而門捷列夫的這些卡片目錄和賬本，也完全不是什麼弱點。凡是他所碰到的東西，他都想加以分門別類，把它們相同和相異的程度確定下來。事務性的，甚至技術性的工作，通常被人們誤認為是毫不相干的古怪行徑和毫無價值的浪費時間，實際上卻有助於創造性的工作。很多科學家認為事務性的工作並不是分散精力，而是有利於創造的一項條件。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獨自一人坐在門捷列夫的書房裡沉思著一件事：當然，電腦把人們從事務性工作中解放了出來，然而與此同時，電腦又剝奪了人們從事事務性工作的機會。看來，這項工作還是需要的，將來人們會爭

先恐後地去搶著做這項工作；我們只有在失去了它之後，才能發現這一點.....

整理和組織材料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

在我周圍都是些老式傢俱——笨重、堅固，製作得非常耐用，就是用上幾代也用不壞。物件是有記憶力的。至少那些不用機器製造，而由工匠用雙手做出來的、歷盡人間滄桑的古老傢俱是有記憶力的。在童年時代，本能尚未衰退，我清楚地感覺到物件的這種生命力。

記得童年時代對於傢俱，透過它們表面上的漆和色彩，感覺到在木紋深處隱藏著一棵活生生的，似乎有肌肉的樹。門捷列夫在這裡，在這些書和物件中消磨的大量時光，似乎使我有領悟。

對分類工作的熱忱，好比是他智慧的光學儀器，通過這個儀器，他能洞察世界。他天賦才能中的這一特性幫助他發現了週期律，找到了大自然中的元素週期表。他的發現的實質，符合他的全部天性、他的習慣和他的愛好。

對一位科學家來說，整理和組織材料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即使這一工作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例如做複製品的卡片目錄，但從事這一工作時，感到很愉快。這種快感，實際上就是意義本身。

這種為科學家和分類學家所獨具的想法，在柳比歇夫身上也可以找到。每個科學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有一種特性，那就是要把混亂的東西歸納成體系，發現其內在的聯繫，總結其規律性。但對柳比歇夫來說，分類則是他主要的學術研究。分類同太陽系、元素週期表、平衡系統、植物分類、血液循環系統都有關係：無處不存在著體系，他到處都能發現體系。

搞分類學是他的使命；分類學能引申出哲學、歷史；分類學是他的武器。

他想成為林耐³⁵那樣的人……

他想發現蘊藏在大自然中的那些未被發現的、日益深奧的體系……

他在自己1918年的札記中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的體系，甚至建立了令人發笑的體系——他的傻勁有時是有用的，有時是有害的，有時是進步的，不一而足。他寫到大學章程的缺點，就立刻要求建立一個體系，規定章程的體系。

他用各種各樣的體系把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他有保管資料的體系、通信的體系、保存照片的體系等。

無數的日期、姓名、事件，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應用起來簡直得心應手，這是因為他把這些材料都按一種巧妙的體系分別銘刻在頭腦之中。至少可以這麼認為，當需要的時候，即使不能「記憶如泉湧」，他也能像從書架上抽出一本需要的手冊一樣，在腦中找到這些材料。

他是首先在生物分類學中應用鑒別分析的人中的一個。他用數學來加強分類學——我想說，他視分類學為至寶。生物學體系，或者說生物學中的體系，能引起他純美學上的歡樂；同時，分類學不可企及的複雜性和大自然的完美性又使他感到畏怯和悲哀。

同一類昆蟲的構造中有著驚人的多樣性，這既不會妨礙他，又不會使他撒手不幹，只能引起他的驚詫，這種驚詫往往引導科學家們去發現。他幻想弄清生物真正的類目，可也懂得這一任務是一眼望不到邊的。

「看來，多數人認為，很多部類——例如飛禽類、哺乳類、高等植物——的分類，基本上是結束了。但這方面可以回想一下偉大的卡·

馮·伯爾³⁶的話：『科學的永恆性就在堅持不懈的尋求之中，科學就其容量而言，是永不枯竭的，就其目標而言，是永遠不可企及的。』……」

我過去同很多人一樣，對於昆蟲分類學抱著一種極其輕視的態度。它不能被稱為科學，至多是一種嗜癖而已。一個成年男子犯得上去捕捉蝴蝶和形形色色的蟲子嗎？這能算一件工作嗎？什麼樣的蟲子用大頭針別在什麼樣的蟲子旁邊……古怪透頂，除非是儒勒·凡爾納³⁷的主人公們才會因此而增添幾分光彩。

再說，今天分類學已成為一門使用數學和電腦的複雜學科。分類學日益廣泛地使用分類理論、數理邏輯和形形色色的數學分析。

昆蟲學、小甲蟲、分類學……用大頭針釘住的張著翅膀的蝴蝶標本、蝴蝶、捕蝶網——這些玩意兒都可以說是輕佻的象徵。可就有一些科學家，他們成年累月地研究蝴蝶翅膀上的花紋。乍看起來，哪兒也找不到像這樣脫離生活的、毫無用處的、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抽象科學了。然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的朋友，列寧格勒的科學家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施萬維奇對照這些花紋，思考圖案的比例、色彩的配合，從中獲得了大量對形態學和進化論問題有用的材料。花紋對他來說，已變成文字。完全可以閱讀這些花紋。大自然就是這樣來安排的：在最不起眼的瓢蟲身上，蘊藏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規律。就是這些花紋，也不僅僅是花紋，它們是普遍美的一部分，這種美至今還是一個謎。我們用什麼來解釋貝殼、魚類的美，花朵的芳香和優雅的形態？這種完美和驚人的色調又是為了誰？大自然究竟怎麼把從審美觀點來說簡直毫無瑕疵的花紋畫到了蝴蝶的翅膀上？

熱愛自己的事業

在我們的時代，決心獻身於一種旁人看來極不嚴肅的工作，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的。需要勇氣和熱愛。當然，每一個真正的科學家總是熱愛自己那一門科學的。特別是當科學研究的對象本身是很美的時候。不過，除了星星、蝴蝶、雲彩、礦物而外，還有美的東西，不過這種美，除了專家，誰也看不見。這大部分是抽象的東西，如數學、力學、光學。

有些人完全能從不尋常的角度來觀察自己研究的對象。例如，知名的細胞學家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亞歷山大羅夫曾興高采烈地向我描述細胞的舉止行動。他告訴我，細胞無疑是有靈魂的。柳比歇夫當然深信，最高尚的科學是昆蟲學。昆蟲學使人保留童年時代的優秀品質：天真、純樸和容易對事物表現出詫異。首先，他根據親身體驗感到了這一點。實際上，也正是這樣。一個上了年紀的、儀表端莊的人，突然無視身旁的行人，跨過水窪去追一個甲殼蟲，一個人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嬰兒般的純潔和不顧一切的品質。他說，人們把昆蟲學家們看成是傻瓜，這有時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昆蟲學家們就可以毫無危險地闖入最富「掠奪性」的地點，反正人們會把他們當作無害的怪物加以嘲笑的。

他們實際上也確實是怪物。他們之中有些人真是愛上了自己的昆蟲。卡爾·林德曼³⁸說，他愛三種生物：步行蟲、女人和蜥蜴。他捉住蜥蜴後，吻一吻它們的頭，又放走了。柳比歇夫打趣道：「看來，他對女人大致也是如此。」

在奧赫金公墓的施萬維奇的墓碑上，雕刻著他心愛的蝴蝶翅膀上的花紋。

查爾斯·達爾文也是作為一個昆蟲學家開始自己的事業的。他回憶道：

「.....在劍橋大學時，對哪一項工作，我都沒有像收集小甲蟲那樣熱心，哪一項工作也沒有像收集小甲蟲那樣使我滿心喜悅.....任何一個詩人在讀到自己初次出版的長詩時所感到的喜悅，都不及我看到斯蒂芬斯出版社出版的《大不列顛昆蟲畫冊》上『查爾斯·達爾文先生收集』這幾個具有魔力的字時所感到的那種狂喜.....」

柳比歇夫對昆蟲學的偏愛竟使他喪失了他固有的寬容大度、公正不阿，甚至幽默感。他不能寬恕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因為普希金就蝗蟲問題向伏倫卓夫³⁹寫了那份言語惡毒的報告。他進行了論證，說普希金改變自己對伏倫卓夫的態度，就是由於那次有關蝗蟲問題的「嘲弄性」的出差所引起的委屈情緒。在那以後，伏倫卓夫在普希金眼裡就成為「一半無知和一半無恥」的人了。

蝗蟲飛呀飛，

飛來就停下；

停在那裡吃莊稼，

吃飽肚子又飛光。

「我很清楚，」柳比歇夫寫道，「普希金的報告，用語是很惡毒的。我並未看出那次出差有什麼嘲弄的意味。據我所知，普希金是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官員。當時並無昆蟲學專家，因此派遣一位有聰明才智的人去，是完全合適的。何況他在那兒也並沒有遭遇任何危險，還可以在那裡體驗一下當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對敖德薩淑女們，包括伏倫卓夫夫人在內，獻夠了慇懃之後，正可以在那裡稍事休息。

無疑，向淑女們獻殷勤所費的時間和精力肯定比調查蟲害要多得多。」

柳比歇夫深信，由於自己從事的是一項無比美好的事業，因此才有他如此良好的健康狀況和旺盛的工作能力。對昆蟲進行研究也是他生活方法的一個內容，既增添了體力勞動，同時也增添了這項事務性工作的興味。

儘管為了昆蟲學、分類學、土甲蟲要同新達爾文主義者花費不少唇舌，但這項工作是遠遠避開令人焦灼不安的緊急科研任務的避難所，是可愛的學院式的避難所，是最不得罪人的工作……還有什麼工作能比這項工作更使人安寧和不受騷擾呢？

要點

·柳比歇夫通過日期、姓名、事件的標籤，把資料、照片等種種材料合理地保存在頭腦中。在需要的時候，能像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那樣，從腦中找到對應的材料。

第十二章 一切皆有代價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科學家表示非常欣羨柳比歇夫那種從容不迫、順利安適的生活。柳比歇夫以其一貫的作風，把自己所有的倒霉事兒開列了一張清單作為對他的回答。

說真話的人

20世紀30年代，柳比歇夫在蘇聯植物保護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當時設在列寧格勒卡緬諾耶島的葉拉庚宮。

柳比歇夫那時正在研究害蟲的經濟價值。當柳比歇夫從數學的角度考察這個問題時，得出了一個頗使大家震驚的結論——他認為害蟲的害處被人們大大誇大了。實際上，害蟲的危害性要比當時公認的低得多。他到波爾塔瓦地區去，在受草地螟蟲害的地方進行調查。大田看起來很不正常：看不見甜菜，到處長著濱藜。撥開濱藜叢，柳比歇夫發現了受濱藜影響的甜菜，嫩芽完全無恙。他開始明白，螟蛾與此事毫無關係。農莊領導人分辯說，螟蛾來過，肯定是它們把甜菜吃光了，後來在田里噴了殺蟲藥，才挽救了作物。柳比歇夫無法反駁，因為螟蛾已經無影無蹤了。到了第二天，他偶然看到一塊種著甜菜的宅邊自留地。眼前美好的情景使他大為驚詫：作物長勢茁壯，沒有一點受害的跡象。這下一切都弄明白了。事情非常簡單：主人精心管理了自己宅邊的自留地。最後，農莊主席和農藝師不得不承認，農莊莊員不肯到大田去出工，任憑甜菜自生自滅，螟蛾確實與此事毫無關係。

北烏克蘭的調查使柳比歇夫明白，在其他地區，螟蛾實際上也不會帶來危害。北高加索一有蟲害的苗頭，柳比歇夫就趕到那兒去，並仔細觀察區領導人所提到的那些田地。可是哪兒也沒有發現蟲害留下的嚴重後果。說得溫和一點的話，就是情況被誇大了，蟲害問題是值得懷疑的。

他發現蟲害的苗頭便跟蹤追擊。在羅斯托夫，有人向他報告說，在某國營農場，向日葵被吃光了。趕到那兒，他才弄明白，原來向日

葵壓根就沒有種。他曾到齊莫夫尼基去研究黃鼠的危害性；到阿塞拜疆去研究玉米銹病的危害性；到格奧爾基耶夫斯卡亞去調查蘋果樹的苗圃。

他還去過阿爾馬維爾、克拉斯諾達爾、塔洛伐亞、阿斯特拉罕、布瓊諾夫斯克、克里米亞州——他去過的地方，遍及整個南俄。

一般認為，害蟲，特別是穀物的害蟲，帶來的損失不少於10%。柳比歇夫不同意這個數字。他根據四處調查的結果，同時也研究了美國的材料，把這個數字降到2%，並把這一點寫進了報告書。然後，他證明大家援引的瑞典麥稈蠅，也並非總是降低小麥和大麥的收成的。柳比歇夫整整用了三年的時間，反覆檢驗自己觀察所得，最後就將報告書付印。從而他得出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那就是防治農業害蟲部門的工作被誇大了，如果照老樣子辦下去，這個部門本身，似乎也純屬多餘的了。

請問，需不需要這麼一個機構，同柳比歇夫有什麼關係？這不是他該操心的事。好吧，就算他得出了他那個關於害蟲的結論，他向上做了報告，寫出了書面材料，也就夠了，一個科學家該盡的職責已經盡到了……難道他不明白，這一個部門的存在和這些麥稈蠅、螟蛾、鋸蜂等所有這些昆蟲被視為一股危險的力量，是同大量形形色色的人有著利害關係的——一些集體農莊因此就可以為所欲為，還有不少人也可以……

可能他也明白。他在自己長時間奔波於大小農莊之際，已飽看了那些玩忽職守的當家人如何千方百計為自己尋找借口。他大概是明白的，所以他做了鬥爭的準備。他掌握了新的分差統計法，同時還把農業昆蟲學的作用進一步做了核實。現在他就用數字來頭頭是道地證明——能使人人深信不疑——蘇聯對昆蟲在經濟上的危害性的統計是如何缺乏水平。

「缺乏水平」——他選用這個詞是確切的，然而最好還是另選一個詞，因為這個詞是用在那些獲得了崇高稱號和獎賞的人們身上的。過去一直認為害蟲在受害地區的分佈幾乎是均等的，由此得出結論，應該整修大量穀物耕作面積。在那些年代，無論從勞動力來講，還是從化學藥品來講，這項任務是力不勝任的。柳比歇夫證明，穀物害蟲分佈極不均衡，滅蟲鬥爭可以在不大的面積上進行，從而可以節約千百萬盧布。

但防治害蟲部門的領導人對節約不感興趣。應當為自己受到侮辱予以回擊——他們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刺激，這是重於一切的。

平反

1937年蘇聯植物保護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召開了一次令人難忘的會議。會議討論了柳比歇夫的著作，時間長達5個小時。遺憾的是，與通常一樣，與其說是討論問題，倒不如說是討論柳比歇夫這個人。大家指責他有計劃地、近乎有意識地縮小害蟲的危害性，目的是要搞垮害蟲防治工作……此外，他本來就是一個生機論者。在那些年代，類似的名詞聽起來很嚇人。「害蟲」這個詞是一語雙關。是破壞分子的辯護士、幫兇……使他們暴跳如雷的是柳比歇夫並不想悔過。當然，他在結束發言時承認，近年來，他的某些觀點有所改變，但是要講清楚，他改變觀點絕不是奉命行事的。他需要的是證據。看來，只有證據才能對他起到作用。

學術委員會宣佈柳比歇夫的學術觀點是錯誤的，並且建議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取消他的博士學位。決議一致通過，但這並未使柳比歇夫著急。他認為，在學術方面，舉手通過不說明任何問題，科學又不是國會，而且多數往往並不正確。

不能說他絲毫沒有考慮現實的情況。在學術委員會做出了這樣的決議後，他完全可能像他自己曾說過的那樣，「去吃不吃錢的伙食」。

但他還是不能改變自己的做法。他驀地發覺自己不能按清醒的理智去行動，不能從科學的利益、從自己的目標出發去行動。犧牲自己總要有所為——但是他被捕，他被當作破壞分子、走狗……又能給誰帶來好處呢？顯而易見，這麼做沒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

可是他呆板而執拗地堅持自己的做法。

一反他那備受讚揚的純理性。

歷來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一個人忽然會感到有一種不受邏輯和理智支配的限度，感到有一種不可理解也不可解釋的執著，出自良知或什麼別的東西。「我堅持這麼做，而且非這麼做不可。」

當事情在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中懸而未決的當口，奇妙的命運把一切重新做了安排：研究所所長被捕，而在他各種各樣的罪狀中有一條就是解雇工作人員。這樣，柳比歇夫在政治上總算得到了平反，而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還經伊凡·伊凡諾維奇·施馬爾高森院士的請求）給柳比歇夫保留了博士學位。類似的事件在十年後，即在1948年著名的列寧農業科學院例會之後，又在他身上重演了一次。

不管有多怪，他闡述自己觀點的坦率態度竟然還屢次幫他擺脫困境。他酷似當時一些戲劇和電影中經常被掃地女工、上年紀的工人或進步的孫女訓斥、開導和教育的那種落後的老教授。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科學家表示非常欣羨柳比歇夫那種從容不迫、順利安適的生活。柳比歇夫以其一貫的作風，把自己所有的倒霉事兒開列了一張清單作為對他的回答：

5歲，從柱子上摔下來，摔斷了胳膊；

8歲，一塊板壓壞了腳；

14歲，在做昆蟲標本切片的時候，割破了自己的手，得了敗血症；

20歲，急性闌尾炎；

1918年，肺結核；

1920年，格魯布氏肺炎；

1922年，斑疹傷寒；

1925年，最嚴重的神經衰弱；

1930年，由於康德拉節耶夫事件，幾乎被捕；

1937年，列寧格勒（全蘇植物保護研究所）危機；

1939年，在游泳池跳水沒有跳好，得乳突炎；

1946年，飛機失事；

1948年，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例會後被整；

1964年，摔跤，後腦猛撞在冰上；

1970年，摔斷股骨腰.....

上列清單中還未包括其他許多事故。他具有高度的「出事能力」。他不善於迴避不愉快的事件和危險的爭執，也不善於躲開滑溜難行的地方。一旦摔跤，那就摔得頭破血流.....

要點

·柳比歇夫不僅記錄工作的成果，連生活中的倒霉事兒都一一記下。

第十三章 瞭解一個人，就要看到他的矛盾

時間統計法成了他即興演奏的樂器，用這樂器，他愛演奏什麼就演奏什麼。

他如此精打細算地統計時間，可他把時間都浪費到什麼上去了？

年度總結：向時間做自我剖析

他不時將自己的年度總結寄給朋友們。這些總結被稱為「年度咨文」。當然，這不是完整的總結，只不過是一些摘錄而已。年度總結本身是歸檔的。既稱年度咨文，其概念就很清楚：為回答朋友們的詢問，他寫上一封綜合性的信，裡面既談到做了什麼，正在做什麼，也談到身體如何。枯燥的年度總結在給朋友們的年度咨文中變了樣。描繪過去一年中所有的倒霉事件、痛苦以及歡樂，都顯得既愉快又嚴肅：

.....一月份得了一次好厲害的腦震盪，滑了一下，仰天摔倒，後腦勺猛地碰到了冰上。我第一次懂得了什麼叫「失去記憶」。我並沒有失去知覺，但當我站起身來時，已完全忘記我原本是想去看望一位熟人.....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我甚至想，還有好處。試舉先例：據說總主教費拉列特·德羅茲陀夫在年輕時特別笨，當過牧童，但有一次被重重地擊了一下前額，從此之後，他才華橫溢，成了總主教。不過，他是有名的反動派，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為他是被人擊了一下前額，這就是說把他朝後推了一下。要是被人在後腦勺上來那麼一下（舊俄教育法），那就會被朝前推一下，這就是俄羅斯民族才華的由來。雖然由此悟出了敲後腦勺的理論和實踐，但我還是決心放棄對自己採用這類措施.....

但長達數頁，附有種種表格的歸檔的總結到底又是為誰而寫的呢？他是向誰匯報工作呢？如果只是為了分析過去一年的工作，那麼未必非得寫出所有讀過的書名不可，所有收信人的姓名，所有聽過的歌劇.....譬如說，記下多少卷、多少頁、多少小時等數字來說明，也就足夠了。從他的總結中，可以明顯地感到他向某人或向某個對象做

匯報的意願。他是在匯報。那麼是向他自己匯報嗎？這聽起來自然很動聽，但缺乏現實意義，這更多的是藝術上和文學上的臆測，而不是切合實際生活的想法。什麼叫向自己匯報？這需要一種雙重心理，或近似喜劇性的心理：我向自己寫了，匯報了，然後等待決定……

我想，情況可能並非完全如此，他之所以寫匯報，是出自分析上的必要：隨著歲月的流逝，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越來越感到時間的珍貴，這種感覺是每個成熟的人都有的，在他則尤為突出。他的時間統計法使他珍惜每一寸光陰，使他崇敬時間。

熟知他的人都發現了他這個特徵。

巴維爾·格利戈裡耶維奇·斯維特洛夫寫道：「他一生的時間並不是他的私有財產，而是撥給他從事科研工作的，科研工作就是他的使命和他一生中的主要歡樂，為了完成這一使命，他節約時間，計算歸他支配的每個小時和每一分鐘。」

他是為了巴維爾·格利戈裡耶維奇·斯維特洛夫所謂的那個「撥給」他的時間做匯報，為了借給他的時間做匯報……可又是誰借給他的呢？這裡涉及的已是他的人生哲學，他對目標、對理智以及對最複雜的生活問題的態度，這些問題，我既不打算探討，也不打算觸及。

只有一點我是明確的：他的時間統計法不是一個節儉的計劃工作者的預算，把他的時間統計法比作想向時間做自我剖析更為恰當。

艾伯特·施維采爾寫到的那種對生活的崇敬，在柳比歇夫身上有著自己的特色，這是對時間的崇敬。他的時間統計法充滿了對時間的崇高責任感，這裡包含了對人、對全體人民和對歷史的理解……

這樣，由於他遵循了自己的時間統計法，由於他從不把半個小時看成是少量的時間，他做了很多事。

他的頭腦可以稱之為一部組裝得非常出色的機器，專門生產思想、理論和批評。這部機器能生產問題。這部機器在任何條件之下都能運轉，一絲不苟。這部機器被明確地計劃用於最重要的生物學問題，從1916年起，連續不斷地運轉，也就是一連運轉了56年，不出一點毛病。不，已經搞清楚，他本人並不是一個機器人，絕對不是：他感覺得到痛苦和悲傷，而且還會幹出一些冒失的事來，給自己帶來不快。所以在其他一切方面，他受一般人之常情的支配。

他自己說：「根據我的觀點，把人看作機器是一種迷信，幾乎相當於作為拼湊星占表的依據那樣的一種迷信。」

他舉星占表為例並非出自偶然。當時都認為星宿預先就注定了人的命運。但柳比歇夫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對柳比歇夫來說，預先安排好的不是命運，不是行動，不是心情，而是他的工作。至少，他的時間統計法必然導致這樣的結論。為了達到目的，一切都分配和計算停當。為此，他計劃、計算，並按收入和支出兩條渠道分別做好分配。這樣，他當然要匯報，他要匯報已向目標前進了多少。

不時走入岔道

然而他的道路越走下去就越令人費解——他不時蹚入岔道。無緣無故，他忽然毫無計劃起來，長時間馳心旁騖，忘掉了自己主要的任務。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你也不能說他是一個散漫的人：不管什麼工作，一經開始，就幹到底。可是要知道，這份工作本身就與他無關，完全不在原計劃之內的。

1953年，好像是毫無來由，他忽然著手寫《論李森科在生物學中的壟斷》一文。一開始，這僅僅是一些具體的建議，而結果卻寫成一部長達700多頁的著作。1969年，同樣是突如其來地寫了《科學史的教訓》，還寫了懷念父親的回憶錄；又在《文學問題》上發表《達達派研究》一文；忽然又無緣無故地大寫其《評勞合·喬治回憶錄》；突然寫了一篇關於墮胎的論文；馬上又是一篇《論叔本華的格言》；緊接著是《論敘拉古戰役在世界史上的意義》。敘拉古到底同他有什麼相干呢？有必要去寫它嗎？

雖說如此……蘇聯著名的研究古希臘羅馬的歷史學家們都去同他商榷，把學術報告摘要和書籍寄給他，請他提意見。他真像一個古希臘羅馬史的行家。但對那些專家們來說，重要的不僅在於他是一個行家，還在於他是一個思想家——在這方面，他也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議論和自己的異端邪說。

就在那篇關於敘拉古的論文中他寫道：

我本來覺得，如果在這一場戰役中雅典人得以取勝，那麼他們在獲得了領導權後，就可以聯合所有的希臘人，成立一個疆域遼闊的國家，一刻不停地發展希臘文化……這個觀

點我過去一直是無批判地接受的。雅典人似乎是歷史上的一種奇跡——在一小塊土地上（這塊土地還劃分為很多很多小的城邦）居然能產生高度驚人的文化，這種文化：藝術、文學、哲學、科學，幾乎是第一次嘗試實行民主制度……至今還引起我們的讚歎。出色的雅典人常年的對手是陰險和丘八作風的斯巴達國，這個國家完全沒有文化遺產……它極端狂妄自大，目光短淺。

如同所有的人一樣，他原來也認為真理在雅典人一邊，由天才的阿爾基維亞德率領的雅典人理當勝利。但請你們注意下面這一句話：「……現在一系列的想法使我斷然改變了自己對雅典人在世界史中的作用的觀點。」接下來，他就順序一一闡述自己的想法，並詳盡地論證這些想法。

可以認為他的專業是雅典史，或至少是古代史，某些新獲得的資料使他重新考慮和審核，最後改變了自己對雅典作用的觀點。難道能想到這是一個生物學家寫的嗎？反正問題不在學識淵博上。另外還有一點令人驚異：雅典在世界史上的作用問題竟使這位生物學家如此心神不寧！

如今他已不在人世，一切問題都得不到解答，必須在書信和手稿中尋找答案。研究了她的總結，我才搞明白，原來在那段時間裡他正準備寫一本論文明興衰的著作，因此去探索雅典的作用。所以這一切完全不是無所事事的學者在逢場作戲。而他之所以著書談文明的興衰，是因為他認為必須嚴厲批判英國最大的生物遺傳學家羅納德·費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費歇妄圖把社會學歸結為生物學，從而證明生物遺傳學是人類進步的主導因素，是文明興衰的原因。

柳比歇夫有許多工作看來似乎是偶然的，其實，很可能從中發現這些工作的必要性，發現這些工作同他的主要工作之間的聯繫。但確

有東西來路不明，純粹是與他毫不相干的。為什麼他要寫關於瑪爾法·鮑列茨卡婭⁴⁰的論文呢？又為什麼他要去寫關於伊凡雷帝的著作呢？當然也可以把這些工作說成是合理的和有根有據的。特別是用缺乏意志力來解釋，那理由就更充足了。柳比歇夫顯然不善於克制自己。他經常迷上同他完全無關的東西，糾纏到同他毫無直接關係的辯論中去。倫理學的各项公設同他又有什麼關係呢？在這方面有的是哲學專家；他又何苦去寫50多頁的《評勞合·喬治回憶錄》——這麼做實在是太過分了，是不能允許的！只有無所事事的學究才會這麼做……

有這麼一句古老的諺語：一個醫生，如果他僅僅是一個好醫生，那他就不可能是一個好醫生。對科學家當然也可以這麼說。一個科學家，如果他僅僅是一個科學家，那他也就不可能是一個大科學家。當想像力和靈感消失時，創造性的源泉也就枯竭了。創造性的源泉也要求兼及旁騖，否則科學家就只剩下追求事實了。

馳心旁騖後來在他工作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他自己也抱怨自己無法抗拒周圍環境的誘惑，但我想他恐怕也無法控制自己的迷戀。他不善於遵守自己思維方面的定量飲食制，在這一層意義上，他是一個垂涎珍饈美餚的老饕。每當他強有力的邏輯思維碰上什麼具有無限誘惑力的東西時，他就無法控制自己。

可是這又如何同他的時間統計法相協調一致呢？無論如何無法協調，時間統計法成了他即興演奏的樂器，用這樂器，他愛演奏什麼就演奏什麼。

他如此精打細算地統計時間，可他把時間都浪費到什麼上去了？他的好友對他這方面的責備越來越多。當柳比歇夫著手寫關於生物學概況的巨著時，尤為尖銳地提出了「應當」還是「不應當」的問題：

「.....在您的信中，我覺得最重要和最有說服力的一點就是您感到自己沉默不語是一種病，感到沉默不語實質上就是病因。這是男子漢的一種出色的美德.....我看到，與我們女子相比，男子顯然具有更深刻的社會良知。他們如果不能針對科學或藝術說出良知要求他們說的話，他們往往會生病，甚至還會送命。」緊接著又說：「.....但要知道您對科學還負有責任（更深一層的社會責任），它要求您在顯微鏡旁坐下來，寫科學論文.....存在著兩種職責：一種是科學，另一種是對某一歷史時期某門科學某一分支的狀況所負的責任。我不信，第二種職責就比第一種更為重要。是第一種職責在起決定性作用。正是第一種職責——發明、重大事件、發現——排除了第二種職責。」

好友們的意見歸結到一點：科學家的工作應當去解決自己直接擔負的任務。他們認為，學術批判在解決重大問題上，只起次要的作用，「這在更大程度上屬於策略、政治，而不是學術爭論。這些問題應當讓黨和政府去管。」

擔心是理所當然的，理由是明智和有遠見的。正如前面所說的那樣，他曾不得不同研究所領導發生衝突，並被迫退職。後來他的正確性總算得到承認，又被召了回去。再過若干年，在那正義必然勝利，惡行照例受到懲罰的美好的將來，一切都好辦，但眼前，人人都可以向他提出：瞧，結果怎麼樣，值得這麼做嗎？

無休止的內心爭執

儘管離開了研究所，他仍然堅持把自己的稿子寫完。如果他去合乎邏輯地考慮一番，他是無法為自己辯解的：犯不上為了這項工作引起這麼些不愉快的事，犯不上為了它分散搞主要任務的精力……除非出自公民的良心。這倒可能。不過良心是一個非常含混的概念，似乎絕對不能同理智相容，不是嗎？而且他的良心也由於撇下了自己的畢生事業而備受折磨。他老像是在請事假，向自己心愛的工作請假。這是為了什麼？為真理而鬥爭？可這並不是他的使命，他是一個科學家，他是探求真相的，並不是探求真理的。真相更為重要……而真理更為需要……到底他必須如此還是不必如此，到底他應當這樣還是不應當這樣。他的良心碎裂了。他感覺到這一痛苦的矛盾，感到了在介入爭論和發表意見的職責與自己一生主要職責之間發生的劇烈爭執。他明白，他撇下心愛的事業不幹，在某種意義上他是在犧牲自己。實際上，他犧牲了自己的時光。他無法兩全。

在他漫長的一生中，這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他的一生是無休止爭執的一生。內心的爭執使他對生活中的一切邪惡更加敏感，更加無法容忍。這無休止的爭執培育了他的道德。當一個人意識到歷史是由他，也是為他創造的時候，他就能胸懷全世界。能意識到國家的命運就是自己個人的命運，這就是公民責任感。季米裡雅澤夫能把一個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忠誠與對全體人民的社會責任感結合在一起。柳比歇夫對他如此崇敬絕非偶然。胸懷全世界，這是從屬於整個人類的一種感覺。

在他仰慕的人中還有愛因斯坦、開普勒⁴¹、萊奧納多·達·芬奇。也就是說幾乎包括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科學家。對於萊奧納多，柳比歇夫讚賞他不承認教條、不承認有什麼權威。柳比歇夫還讚賞他從數學角

度去看待形形色色的現象。萊奧納多是相信宗教的，但柳比歇夫發現宗教並未使萊奧納多消極，反而推動他去進行創造。萊奧納多的倫理思想如同馬基雅維裡在這方面的思想一樣，絲毫沒有使柳比歇夫感到不安：

「這種思想令人感到不道德僅僅是由於新的倫理令人感到不道德。事實上，這仍舊是蘇格拉底的那種崇高的倫理，用理智來解釋道德。」

柳比歇夫通常對理智評價很高。然而他自己的行動卻缺乏理智，不善於算計。他的自覺紀律還是生效的，不過在結賬時，往往會發現他的花銷是他絕對支付不起的。

天哪，對於嗜癖和精力分散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麼呢？！誰能說清楚「人應當是怎麼樣的」。我們從何知道人應當是怎麼樣的呢？要是做不到集中精力，又該怎麼辦呢？請回想一下牛頓精力分散的情況。牛頓認為《評先知達尼拉的書……》是自己一生最偉大的創作。他花費了很多時間在神學的著作上，要說他白白浪費時間，那是再容易不過了。某些歷史學家善意地為他遺憾。實際上，他的宗教觀點同他的科學觀點協調一致，甚至相互作用。謝爾蓋·伊凡諾維奇·瓦維洛夫在他寫的出色的《牛頓傳》中指出了這一離奇的特點，而在他之後，柳比歇夫也指出，牛頓在解決萬有引力定理這個問題時，需要有東西來填補宇宙空間。他就用上帝來填補了這空間。只有靠上帝，他才能解釋萬有引力。對神學的研究似乎反而給他帶來了好處——這正如開普勒對占星術的迷信反而促使他創立了潮汐說的正確理論一樣。

但願你能知道，

詩句可從糟粕中尋找，

不需要害臊。

占星術吸引住了開普勒，那又算得了什麼呢？難道礙著他了嗎？什麼是主要的，什麼又是多餘的？該由誰來對此做出判斷？譬如，瓦格納⁴²把自己的詩篇看得比自己的樂曲還重。如果他是正確的，寫詩確實幫助他去作曲，因而他把詩篇看成是比一切都珍貴的東西……那又能怎麼樣呢？如果馳心旁騖對柳比歇夫有幫助……那又有什麼不好呢？

1965年，他忙於研究玻璃窗上由寒氣凍成的花紋。他照了幾十張、幾百張花紋的相片，最終寫成了《論玻璃窗上由寒氣凍成的花紋》一文。

這一條小品文式的標題絲毫沒有使他感到不好意思，雖然這是譏笑他再好不過的口實——瞧，有一位退休的教授想從玻璃窗上由寒氣凍成的花紋中汲取學術思想啦！

從這眾所周知的現象中還能搞出什麼新名堂來呢？誰沒有欣賞過嚴寒在玻璃窗上畫出來的毛茸茸的灌木叢？哪個人都能發現這些圖畫同植物、蕨類、樹葉和木本類植物有著出奇的相似之處。

問題在於這種花紋和人們對這種花紋的詫異已歷時幾百年，觀察的次數不下於億萬次，因而不見得還能在這方面發現什麼新的東西。但是在一個美妙的冬日，有一個人以任何時候、任何人都未這麼觀察過的角度來觀察玻璃窗上的這些花紋，他並不是發現了相似，而是發現了相似的規律性。他至多只向前多邁了一步，從大家看過後滿意地停下來的地方向前多邁了一步。相似的規律性，也就是自然體系中結構和協調的普遍規律，現在完全可以用數學方式將它們表達出來了。柳比歇夫著作的研究者之一，尤里·阿納托裡耶維奇·施列捷爾寫道，在這篇文章中，柳比歇夫提出了科學中兩個新的部類：相似理論和「不

佔空間的對稱式」的理論。玻璃窗上的花紋突然出人意料地補充了柳比歇夫所描繪的世界。為了描繪這個世界，他到處收集材料，從最普通和司空見慣的現象中收集材料，他終於獲得了新的和更為深刻的理解——於是平凡變成了神奇。對於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來說，最不起眼的東西可以成為發現的源泉。

索菲婭·科瓦列芙斯卡婭是從事陀螺——一種孩子的玩具——研究的，她從新的角度解決了固體旋轉的課題。開普勒應酒商的要求開始計算酒桶的容量。他的著作《酒桶的新測體積學》包含了無限小分析的開端。坎托爾對三位一體進行反覆思索，從而創造了自己傑出的論述——多數論。紙牌遊戲是否產生了當代競爭角逐的理論呢？

自我批評的能力

責備柳比歇夫分散精力的好友們，自己也津津有味地讀他的「不相干」的著作。而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正好是他分心去寫的那些東西。那些東西往往出人意料、引人入勝。它們經常揭示某些東西。例如，他對論阿蒙德森⁴³的那本書的評述或對施利色堡的囚徒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莫洛佐夫⁴⁴文集的評述，他關於維爾高爾⁴⁵《人或獸》這部長篇小說的思索，都莫不如此。他的專業性的著作我看不懂，我看得懂的正是這些一般性的著作……或者是包含在他專業性著作中的那些一般性的東西。在他那些專業性著作中，通常有涉及歷史和哲學之處。例如，你只要讀一讀他去世後才出版的《多數和單數》那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了。那篇文章以獨特的方式一個接著一個地提出了關於其他星球上的生命的問題、發展理論的問題、天體生物學的問題、控制進化過程的規律的問題，闡述了恩格斯和列寧如何理解進化論……誰能說得準，在柳比歇夫所寫的著作中，能永世流傳下來的是什麼，是普及的哲學著作，還是學術研究著作？他本人沒有考慮這一個問題，他按帕斯捷爾納克⁴⁶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

……然而失敗還是勝利

你自己不應去注意。

不，應當注意……

允許詩人做的事，不一定允許科學家去做，絕不允許他失去自我批評的能力。他必須分辨結果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工作需要的還是不需要的。到底是失敗還是勝利，柳比歇夫創造並不斷修訂自己的時間統計法，他節約時間，都不是為了以後把時間浪費在自己入迷的

事情上。在某種程度上，他破壞了自己的時間統計法。時間統計法沒有能控制住他，沒有進行抵制。他的時間統計法像過去為他的長處服務一樣，開始馴服地為他的弱點服務。

……但如果柳比歇夫從某時某刻起，只能以這樣的方式去工作，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他渴望對令他激動的事物做出回答，這已成為他出自天性的要求。為什麼他就應當強行克制自己？他想盡可能充分地把自己理性中的各個方面，把所有使他激動的東西，體現在自己種類繁多的著作之中。有時他認為道德問題比學術問題更為重要，因而他不能撂在一旁不管。

倒確實是這樣，但又該將什麼稱為「散漫」和「精力不集中」呢？

一個作家，當他創造的主人公開始違反邏輯去行動的時候，那他是會感到滿意的。本來應當這麼幹的，但出於感情的支配，突然幹出了連作家本人也沒有預料到的事。主人公的行動完全不是出自周圍環境的支配，但同時在人情上又是說得通的。在這種場合，虛構的人物接近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並以其身上的矛盾令人信服。

可是，同一個作家，一旦發現他所熟悉的人做出了一些他不太理解的行動，他一定會去探求一種合乎邏輯的解釋。如果作家要描寫這個人，或者描寫某個歷史人物，那他更要千方百計地去探索那個人的行為的起因和動機，並努力把這些起因和動機闡述得十分準確和合乎情理，也就是想把所有的矛盾都消滅乾淨。

我對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也正是這樣。我非把他的行為闡述清楚不可，我要弄明白，到底秘密何在。我深信，全部問題在於我頭腦遲鈍，知識不夠淵博。

可能，我沒有估計到他外向的氣質；可能，他試圖通過歷史、哲學來表達那幾年中我們都感興趣的事物。這就是他對伊凡雷帝和對倫理學發生興趣的由來。

也許，柳比歇夫提出的生物學上的問題觸及許多根深蒂固的偏見。不論他從事什麼——辯證法、歷史、力學、哥白尼的學說、伽利略的學說、柏拉圖的哲學——他的觀點總是不同於前人。他總是發現別人錯了。不管他到哪裡，哪裡就有謬誤——於是他不得不去對付這些謬誤。能看到他人看不到的事物的才能是一種折磨人的才能。這種才能是了不起的，但與其說這是一種樂趣，還不如說這是一種懲罰。

他不是去迴避，而是去同謬誤去做鬥爭。謬誤卻像九頭怪蛇的頭那樣不斷長出來。而他則又必須不斷地去斬掉這些頭。他是赫拉克勒斯⁴⁷，誰也不會向他提出任務，誰也不去估量他的功績。

那他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應當這麼做嗎？這可是沒有一點邏輯性。柳比歇夫的生活是按時間統計法安排的，時間統計法要求他幹什麼都要合乎邏輯，給他提供最合理和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幫助他挑選最有利的方案，哪兒還能找到比這更好的謀士！但在一種情況下，時間統計法不起作用，那就是當柳比歇夫違背自己的利益去行動的時候。時間統計法在矛盾面前無能為力。對於邏輯性不強的事物，時間統計法可以用邏輯性強的事物來與之抗衡。現在根本沒有邏輯性，於是一切都違背理性了。時間統計法提示柳比歇夫這麼做，柳比歇夫卻偏偏那麼做，似乎存心挑選對自己最不利的、預先沒有估計到的方案去做.....

為什麼？我恍然大悟，根本沒有必要去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這個問題是不合情理的，是愚蠢的。無須再去探索。我總算徹底明白了，這是無法解釋清楚的。這是掘不動、挖不透的花崗岩層。

瞭解一個人——這就是要看到他的矛盾。

我明白倒是明白了，就是解釋不清楚。明白和理解可不是一回事。然而這些矛盾並未削弱他的力量。他對生活、對自己、對科學所做的種種思考並未減少他的積極性。行動的渴望在增長。思維在督促著他。他不怕別人向他詢問他那不知疲倦的寫作和他那精力充沛的活動，其意義何在。有一點他知道得非常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別人說起過：誰同現實妥協，誰就是對未來沒有信心。

話又說回來，這一點也並非總能幫他的忙。他很想什麼都不管、什麼不相干的事都不去思索，僅僅從事自己主要的、唯一的老營生。他很想向現實妥協，不去關心現實。可是他無論如何也做不到，他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心靈出現了裂紋，這是很折磨人的。更使他痛苦的是，他不知道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呢，還是在違背自己的職責。他是在犧牲自己呢，還是在逃避戰鬥.....

要點

·柳比歇夫把時間當成金錢，從收入和支出兩條渠道進行統計，最後計算出自己向目標前進了多少。

·通過時間統計法，柳比歇夫更加珍惜時間，對時間充滿崇敬。

第十四章 比時間更寶貴的

在他緊張的精神生活中，他崇敬的英雄們、他喜愛的人、他的表率都不斷在變換。仔細去考察這種變化，該是很有意思的事。對於柳比歇夫，任何時候都不能說他已「成為」怎樣一個人。他永遠正在「逐步成為」怎樣一個人。他一直在探索，一直在變化，他總是重新考慮，不斷提高對自己和理想的要求。

計劃沒有全部完成

柳比歇夫完成自己原定的計劃了嗎？大自然賦予了他（或者說他從大自然那兒領取了）完成計劃的一切條件：才能、長壽。他還制定了一個時間統計法，儘管有所偏離，但他還是一直遵循著這個時間統計法來使用時間和精力……

可惜，他並未完成原定的計劃。在生命將終的時候，他明白自己的目標並沒有實現，而且永遠也實現不了了。根據自己的時間統計法，他可以精確地計算出，還差多少就可以實現他訂的目標。當他決定集中精力寫《文化史上的德謨克利特和柏拉圖兩個流派》一書時，他已滿72歲了。他預計這本書將佔用7至8年的時間，並將成為他最後的一部著作。就像任何一部最後的著作一樣，這部著作將是一部主要的著作，裡面將剖析普通生物學的概念。

在寫作過程中，書的中心部分開始增添大量一般哲學性的思索和社會科學的科目——這倒不是偶然的，因為這本書的內容理應涉及人們認識的統一性。

用了幾年時間，他才寫到哥白尼。顯然，他未必能囊括生物學各科了。按具體體系擬訂的研究項目也落空了。從1925年起，他就千方百計壓縮自己對昆蟲的研究。他捨棄了象蟲類，只留下了地蚤。但就是地蚤，他也不得不縮減種類。到了1970年，在可靠地鑒別性別方面，他總共才完成了6個小類的任務。設想得那樣多，而完成得卻那樣少！45年從事跳甲屬的研究工作，成果卻是如此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鮑裡斯·烏瓦洛夫開始同他一起工作。在同樣的這些年裡，烏瓦洛夫在2000種非洲蝗蟲中，驗證、論述了將近500種過去沒有

研究過的類目。烏瓦洛夫一生研究的就是蝗蟲，結果就成了世界上在這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組織了非洲的治蝗工作，為此獲得了英國、比利時和法國授予的勳章。當然，烏瓦洛夫給自己提出的是另一種任務，但不管怎麼說，總是……

柳比歇夫一度曾幻想把研究地蚤的工作同一般理論性問題結合起來。但他沒來得及做。所以他在這方面也遇到了挫折。當然，有關害蟲的研究工作還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昆蟲學方面，他捎帶也做出了某些概括（就目前看來，成績也不算小）。例如，他概括出等級制度並非到處都適用的。這個概念就不僅涉及生物學一門科學。他的著作使數學家、哲學家、控制論專家都發生興趣，可以找到不少告慰之處。但預定的計劃沒有能完成。他調整自己的時間統計法，使它成為一種生活方法，就是為了完成預定的任務——然而卻未能完成。不走運啊。他是一個不幸的人。

他屬於能超越自己可能性界限的那種人。他的身體並不怎麼好，但由於遵循一定的生活制度，他長壽，一生基本健康。他在各種最為複雜的情況下，始終能從事自己的專業工作；他幾乎一直從事他想幹的和他愛干的工作。他不是可以算作一個幸福的人嗎？

這兒說的「幸福」到底表現在什麼地方呢？他制訂的、核算過的、安排好的計劃落了空，哪一項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大部分著作沒能在他生前出版。他提出的目標確確實實是當務之急。目標並沒有使他失望，相反，他通過自己的著作已經接近了那些目標，已接近到能夠看得見它是多麼美好，多麼有意義，並且是可以達到的。現在當他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時，已經死期將臨，這是最令人傷心的。他所缺不多——再有一次生命就夠了。當意識到自己失算了，一切都將付之東流，這是多麼讓人傷心。除了不幸，還能稱作什麼呢？——他是一個不幸的人！

他具備一切足以獲得盛譽的條件：意志力、想像力、記憶力、稟賦以及其他品質。它們搭配恰當、勻稱。搭配勻稱，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整個核心在於搭配勻稱。稍過之或不及，都會使一切成為泡影。我認識一位物理學家，他至少能完成三項最重大的發明。可是每次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驗證，到頭來別人超過了他。對自己過分的苛求——他過分害怕出差錯——反而害了他。他反應不夠敏捷，或者說他思想不夠解放，或者說他還缺少些什麼別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單有思考能力還不夠，還需要有性格。

所有這一切，柳比歇夫都夠了，賦予他的，不多不少正合適，要是他給自己選擇的目標稍小一點點的話，那麼他可以獲得不知大多少的成就，等待著他的將是法布爾⁴⁸或烏瓦洛夫般的盛名……

他不走運，大自然捉弄了他。誰能想到一切會安排得如此複雜？他倒總是遵照伊凡·安德列耶維奇·克雷洛夫⁴⁹的教導去安排工作的：「如果想要工作有一個令人欣慰的結局，那麼就去幹你心嚮往之的工作。」然而並沒有出現令人欣慰的結局。

倒霉鬼。他自己也這麼稱呼自己。

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

可是為什麼在年輕的科學家中——也不僅僅是青年，還包括有貢獻的、聲名烜赫的學者——喜歡他的人一年多似一年？為什麼在各種會議上，聽眾懷著深切的敬意聆聽他的報告？為什麼他自認為是幸福的人？更確切地說，他自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

用《聖經》中的神話來打比方，可以將他比作施洗的約翰：他屬於為生物學準備新觀點的那種人。他播種，明知看不到發芽。

他懷著一個信念，深信他的工作以後會用得著的。那些在他身後繼續活下去的人會需要他的。這是一種自我安慰，比之於科學家，這種自我安慰在藝術家中更為常見。其實，與他同時代的人也需要他，不過各有各的需要罷了。

不久以前，蘇聯著名的科學家謝爾蓋·維克多洛維奇·麥英和阿歷克賽·弗拉基米洛維奇·雅勃洛科夫在評述柳比歇夫的一篇遺著時寫道：

「在生物學家中，大家知道亞·亞·柳比歇夫堅決反對當今最流行的進化論觀點（也就是把關於進化中天擇的主導作用的學說同群體遺傳學的成就結合起來的觀點）。由於其他一般生物學上的問題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同進化論學說有聯繫，那就無怪亞·亞·柳比歇夫在對待這些問題上也總是與大多數人贊同的觀點相左了。在這種經常性的『反對派立場』中有著特別珍貴的東西。甚至很多柳比歇夫的學術對手也感激柳比歇夫睿智的批評……看來，像柳比歇夫這樣的批評家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最終他們被證明是錯誤的。」

要說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什麼，那就是無可爭辯的真理、不可動搖的信仰、絕對的結論。

.....您提出了一個論點：科學同許多社會普遍真理相聯繫著，而哲學中則一條這樣普遍公認的真理也沒有.....我親愛的朋友，您是從哪一個星球上下凡來的？現在正好可以提出同您完全相反的意見：在最精密的科學領域中，沒有普遍被公認的東西，相反，有的卻是巨大的意見分歧。在數學中，有一系列非歐幾里得幾何學，在數學原理方面，思想紊亂.....在概率論和數學統計學學說中，思想又是多麼紊亂啊！在天文學方面，現在不是一個拉普拉斯理論⁵⁰，而是一大堆理論，在地球起源方面，已不是一個冷縮理論，而又是眾說不一的種種理論.....您在這兒該說了：「除此而外，總該有一些不可動搖的事實啊，例如地球是圓的，而不像一張薄餅。」現在確實已經有了不可動搖的否定意見，例如地球並不像一張薄餅，但至於地球形狀的肯定意見，那麼眼下意見之分歧是令人吃驚的.....形成了地球輪廓的數學理論，殘留部分的輪廓是隨著地球的歷史而形成的。特別還指出了有一個時候，月亮離地球要比現在近得多，當時地球和月亮幾乎連成一體.....科學愈不精密，它們就愈沒有變動，而在精密科學中，變化是巨大無比的，而且持續不斷地進行著.....

他具有一種在學術方面發表與眾不同的見解的特殊才能，他能對看來似乎是最可靠的原理表示懷疑。有時，他否定、駁斥我原來認為顯而易見的一些事物，這就促使我去思考。這裡重要之點在於他激起人們的思維，他促使長期不動腦筋的人去思索。說來奇怪，有許多科學家犯了不動腦筋的毛病。他們促進思維的器官衰退了。更何況無所用心毫不影響他們的學術指標.....

他回答一位抱怨沒有時間考慮問題的年輕有為的科學家（捎帶提一下，他在很多方面還多虧了這位年輕人）說：

.....沒有時間思索的科學家（如果這不是短時期，而是一年、二年、三年），那是一個毫無指望的科學家；他如果不能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度，擠出足夠的時間去思考，那他最好放棄科學.....您現在已經是一位博士了，有著崇高的地位，您已無須匆匆忙忙，應當設法對自己有一個瞭解，您到底給自己提出了什麼樣的目標？如果您提出了目標——想在科學領域中獲得盡可能大的成果，那麼必須把思考的時間留出來.....偉大的卡·馮·伯爾以「觀察與思考」作為自己著作的題目，可是在當代著作中，觀察極多，而思考卻往往極少.....您的哲學見解（與大多數生物學家的哲學見解雷同），同某某（當時寫了一系列毫無水平的生物學論文的一位作家——作者注）的生物學見解一個水平：結果是兩種——不僅是完全的無知，而且是教條主義的肯定，實際上屬於迷信的東西。科學家可以不可以忽略哲學？可以。但他就無權援引哲學論據了.....請您安排出時間來考慮一下您現在認為無可爭議的東西，在您尚未補上這一空白之前，別去寫什麼暢銷的書籍，要麼乾脆放棄進化論學說，因為在您不可能思索的情況下，顯然您對此是無法勝任的。

能不能用一個人對自己提出的目標來衡量他這個人呢？一般用什麼來評價一個人度過的一生？用他帶來的益處來衡量？人才比庸才帶來的益處要多些？那庸才當然要比人才還要多些！但是一個人沒有才華，沒有傑出的才能，又有什麼罪過呢？而有才華的人又有什麼功績可言呢？是啊，天才的科學家對科學的貢獻多於中乘之材。然而一個天才的科學家身上表現出來的主要是大自然，而不是這個人本身。

柳比歇夫的時間守則

柳比歇夫不是天才；天才永遠是那個促成結果的人。一種事業，總有許多先驅者為之獻出智慧，最後輪到一個人來完成它，這個人就是天才。我之所以對柳比歇夫產生興趣，正由於他不是天才，因為天才是無法分析的，好在天才也不用去研究。天才只適合於讓大家來讚美。至於柳比歇夫，吸引人的是他的秘密，他靠這個秘密得以施展身手。儘管他並沒有製造任何秘密，他批駁了他有過人的工作能力的說法。

除了時間統計法之外，他還有幾條守則：

- 1.我不承擔必須完成的任務；
- 2.我不接受緊急的任務；
- 3.一累馬上停止工作去休息；
- 4.睡得很多，10小時左右；
- 5.把累人的工作同愉快的工作結合在一起。

這幾條守則不可能要求人人去遵守，這幾條守則是他個人的守則，是按自己生活和自己身體的特點擬訂的——他好像在研究自己工作能力的心理特點，在研究最適合自己工作能力的日常生活制度。

他幾乎從未抱怨過自己沒有時間。我早就注意到，善於工作的人，時間總是夠用的。不，最好還是用另一種說法：他們的時間要比別人多些。我不由自主地記起康斯坦丁·格奧爾基耶維奇·帕烏斯托夫斯基⁵¹在杜布爾塔如何長時間地散步，津津有味地講開了他自己有趣

的小故事。他似乎無所事事，因為他從來不去匆匆，從不說自己忙，然而他卻比我們任何人都幹得多。什麼時候干的？不知道。

像柳比歇夫這樣的人，似乎同時間建立了一種神秘的、誰也猜不透的關係。這樣的人無所畏懼地面對這位貪婪之神。

人們經常充滿敵意地對待時間。空間、物質——這些東西都能以某種方式加以馴服。時間卻始終那麼放蕩不羈。自從人類窺見宇宙深處，聽到計算幾十億年的宇宙時鐘的嘀嗒聲，看到銀河系會如何崩潰，時間就顯得更加可怕了。

柳比歇夫對待具體時間的勇敢精神使我大為驚訝。他善於捉摸具體的時間。他學會了如何同跳動著脈搏的、正想溜走的「現在」打交道。他不怕屈指可數的、日益減少著的餘年。他小心翼翼地延長時間，緊緊攥住它，盡量做到不無故浪費時間，連點滴時間都不放過。他對時間就像對不可或缺的生活口糧那樣重視。「消磨時間」——這是不可能在他頭腦中產生的念頭。任何時間對他來說都是寶貝。時間是進行創造的時間，認識事物的時間，享受生活樂趣的時間。他對時間滿心崇敬。原來，一生完全不像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麼短暫。這裡問題不在壽命長短，也不在工作安排得滿滿登登。柳比歇夫的經驗在於充分使用一天中的每一個小時，一小時中的每一分鐘，時時考慮實效。一生的時間是極長的時間，在一生中可以把工作干個夠，可以讀大量的書籍，可以學會好幾種語言，可以出門旅行，可以飽聽音樂，可以教育子女，可以在鄉下居住，也可以在城裡居住，可以栽培植物，可以培養青年一代……

如果我們自己慢慢吞吞，那麼生活就不等人。

我們好像只能使用經過精選的時間；我們記得的只是一生中最精彩的時刻；半個小時對我們來說不算時間；我們只承認整段整段的時

間，只承認不受客觀環境和偶然事件干擾的大段時間。只有在這樣的時間裡，我們才打算大顯身手。短一點的時間，我們馬上會借口外界有干擾、客觀條件不允許而難以用上。啊，不依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條件，具有充分權力和理由的客觀條件真是威力無比！把責任往它們身上一推，那是多麼輕而易舉啊.....

我們沒有注意到，這些借口是怎樣在削弱和腐蝕我們的靈魂.....我想以我的一個朋友來作為反面的例子。他曾經是一個很不錯的科學家，後來又擔任過一個很大的研究所的所長。馬上我又想起我熟悉的一個作家類似的遭遇，隨即又聯想起另一個作家。職務確實剝奪了他們很多的時間，而且妨礙他們開展工作。但久而久之他們就習慣了這些客觀情況的制約。他們都幻想能擺脫，並經常說，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就要大干自己心愛的工作了，因為陷於各種繁雜應酬活動是很難寫出書來，更不可能從事科學研究。他們終於擺脫出來了。每個人都盼到了這麼一天。但很快發現，他們誰也不能工作了。他們長時間不肯對自己承認這一點，他們尋找客觀理由，也就是尋找新的職務，拖延時日，避免擺脫職務，儘管他們曾反覆說起要擺脫它，還可能曾反覆爭取過。第一個人開始狂飲，然後自殺了；第二個人不知什麼緣故銷聲匿跡了；第三個人.....其他幾個還活著。

柳比歇夫經常稱自己是「倒霉鬼」，同時又覺得自己是一個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感從何而來？可能是由於他充分地施展了身手，盡情發揮了他的聰明才智。倒霉鬼和幸福感——我不知道怎樣才能使兩者結合在一起。也許他明白，重要的並不是成果.....

他不去為出版自己的著作而鑽營，不到編輯部去奔走，他也不去講情求告.....他捨不得把時間耗費在這些事上。

他避免必要的串門和喜慶活動。

可是在一件事上他卻一直很「大方」，那就是寫信。我不談給親友們的書信，不管這些信寫得如何詳細，內容如何豐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指的是事務方面的書信和學術信札。學術信札中，有的長達10頁，有的甚至20頁、40頁，密密麻麻，用打字機打的。在這些信裡，他對寄來的學術報告和手稿提意見，評論書籍，對各種論文進行分析。向他請教的，什麼問題都有！不管是關於泰雅爾·德·夏爾頓、通靈術、機體適應問題、開天闢地以前的大自然、昆蟲的名稱、戲劇、人口學，還是抹香鯨……都來徵求他的意見。

隨便拿一年來說明他通信的數量吧：

1969年。收到419封信（其中98封來自國外）。

共寫283封信。發出69件印刷品。

他的通信對像有研究所、學會、院士、新聞工作者、工程師、農學家……他的某些書信簡直寫成了專題論文和學術論文。有些書信，例如同巴維爾·格利戈裡耶維奇·斯維特洛夫、伊戈爾·葉夫根尼耶維奇·塔姆、阿歷克賽·弗拉基米洛維奇·亞勃洛科夫、尤里·阿納托裡耶維奇·施列捷爾、萊姆·巴朗采夫和奧列格·卡列寧的通信幾乎就是學術述評、學術對話、學術辯論，可以結集出版。

僅就柳比歇夫用硬紙封面裝訂成冊的幾卷厚厚的學術信札而言，它們本身就是當代自然知識、哲學、歷史、法律、科學知識、倫理學和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的百科全書。

我一直不能理解，古人是怎麼搞的，竟然能寫那麼多的書信。而柳比歇夫身處現代，還在從事這一行將過時的行當，則尤其令我驚訝。

他在一封信中說明了自己寫信的原則。每個月他都訂一個計劃，計劃好給誰覆信。他似乎把所有收到的信都編上號碼，打上復或不復的記號。

緊急的書信，我立即答覆，其他的書信，則暫緩做復。在寫重要著作時，除緊急者外，一切書信都擱置一段時間再做回答。

但這裡有人說，必須回復一切信件，還得馬上回信，據說這是禮貌。當然嘍，在當今用古代頌歌風格寫的名人傳記中，一些完全不足信的美德備受表揚。諸如顯聖的尼古拉⁵²的傳記就寫到一種美德，說此人一出世，就篤信宗教，因而每逢齋戒的日子，他就拒絕吃母親的奶……在私人通信中，任何義務都應當經過雙方同意。我認為，不管是在官方關係中還是在私人關係中，眾所周知的起源於柏拉圖的偉大的締約思想，是完全無可爭議的。任誰都沒有權利要求對方答覆自己的信件，覆信往往是由於通信雙方協議好的，或者出於關懷（完全不是必需的）。我力求答覆每一封信，因為我的書信來往，數量適度，從中我得到一種滿足，還因為通信不但並不妨礙我的基本目標，相反，還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達到這些基本目標。

讀他的信，能得到一種特殊的享受。他的書信顯示出他博學多才，他的才華使他能夠完整地看到這個世界。遙遠的、外國的、某些局部的和零星的東西，在他眼中經常成為整體的一個部分，能拼成一幅統一完整的圖畫。他能給每一件東西找到它的位置，並且能教會別人如何去恢復失去了的完整概念。

然而，糟糕的事正在一步步逼近——他怎麼捨得白白浪費這麼寶貴的財富呀！不將它用於公共事業，而用在某一個人身上，這個人往

往還是他不太認識的。他的某些書信完全是現成的文章，馬上可以付印；另一些書信則包含了大量素材；他把自己思索、考慮和觀察所得，分贈他人，而且把這件事做得認真、詳盡，似乎這是他的職責所在，是給他指定的工作。這樣，花費在這方面的時間就非常之多。好吧，就算你馳心旁騖，寫上幾篇關於歷史的文章，那畢竟還是文章啊。這可是私人通信，對方看過就算完了，別人誰也不會去看。

這既是分散精力，又是一種矛盾。一點一滴地摳下來的時間，一下子都浪費在寫信上，結果又引來了大批覆信……在通信人裡邊，還有些喪盡天良的人：抓來就用，白佔便宜。

如果我們按常規去判斷，那麼情況就是如此。但柳比歇夫有自己的一定之規。信上有地址，有人在等回信，並不是籠統地像需要文章和書籍那樣需要他的回信，而是有某個具體的人在等他的回信，這對柳比歇夫來說，是比時間還要珍貴的。一個真正的醫生能為一個人，為一個病人而竭盡全力，柳比歇夫也是這樣，當有人需要他的時候，他可以獻出一切。不管他多麼珍惜時間，他也能把它貢獻出來。在他身上沒有那種吞噬一切的、除了科學沒有其他的著迷現象。科學、學術活動不能，也不應當是最高的目標，應當還有比科學、比時間更為珍貴的東西……

一個一生都不斷成長的人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著名的蘇聯畫家巴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費洛諾夫。他可算是我所知道的人中對事業著迷的一個最為突出的例子。費洛諾夫狂熱地忠於自己的藝術。他的生活是禁慾主義的生活，經常吃不飽——不是他不能掙錢，而是他不願用自己的畫來養活自己。他排斥一切，甚至連最微不足道的妥協他也不願意去做。根據他姐姐葉芙多基婭·尼古拉耶芙娜·格列波娃的回憶，他的畫室就是他的寓所，陳設簡陋，過的是斯巴達式的生活。他對其他畫家，能持批判的態度，就算是好的，他也經常不承認。由於對自己藝術的著迷，他非否定其他一切藝術流派不可。只有他的繪畫，他才承認是真正的繪畫，只有他的風格，他才承認是革命的風格。他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不惜離開自己的親人，不顧任何艱難困苦，將自己全部的稟賦傾注於一件事上——那就是他的繪畫。工作、書寫、繪畫、站在油畫前、尋找新的方式方法——這些，也僅僅是這些，構成了他的生活方式，這也就是他的生活。自然，對藝術抱這樣一種忠誠的態度是值得尊敬的，但不太容易引起人們的好感。可是費洛諾夫的繪畫確實是驚人的。這麼說來，到底是什麼幫助了他？是他的著迷和狂熱幫助了他。他那獻給革命和彼得堡工人的雄偉的畫幅滲透著熱情，畫布上處處栩栩如生。這一切的獲得，難道與他的著迷無關？抑或歸功於他的著迷？這麼說來，著迷對才華是有幫助的，它一點壞處也沒有嗎？不過，當我們今天欣賞費洛諾夫的畫時，對於費洛諾夫以什麼代價獲得了這種美，試問同我們有什麼相干呢？

既然這種著迷能對一個畫家有幫助，那它又有什麼壞處呢？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情況可能同樣如此.....

重要的是成果、是發明、是獲得的真理.....

一切似乎確實是這樣，然而不知為什麼，我還是像過去一樣，對這種著迷沒有好感，總覺得它令人不快。有時瀏覽費洛諾夫的繪畫，我從思想上感激他——同時又感到憤懣。回想他的一生，我從心眼裡壓根兒否定這種生活。我弄不明白，他到底正確還是不正確。一般說來，他到底有沒有權利去這麼做？

寫信是柳比歇夫實際能夠給予人們的一種小小的幫助。由於有可能幫助人，他變得十分慷慨，他忘掉了時間，不惜一切，全力以赴。他的評語實際上是一篇非常詳細的評論。他無私、無償地做這些事。他分析錯誤，找出可疑之處，進行論爭；他還做編輯的工作——改正錯誤、指出問題、提出建議。不太認識的人、完全不認識的人來向他求教，他也不拒絕。

他工作的規模簡直相當於一個類似諮詢總局、救濟總局、學術服務局那樣的機關。除了學術上的意見，他還提出道德方面的意見。他老是不客氣地以導師自居，教訓人、提出要求、分析行為。對我個人來說，他信中最寶貴的，正是道德方面的教訓。就拿他給一位通信者的一封信作為例子吧：

.....說到奇熱夫斯基——我不相信您的觀點是正確的，我更傾向於您是錯誤的。您寫道：「現在搞清楚了兩件事：

(1) 奇熱夫斯基的理論就是流行病現象同太陽能的關係。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騙局，但大自然研究者協會卻上了這個當.....」奇熱夫斯基的著作我讀得不多（我記得整本都是用法文寫的），而且還是很久以前看的了。把一個人稱為頭號騙子或無賴——這就意味著深信這個人全部的資料都是毫無水平的，都是偽造的，並且旨在達到個人卑鄙的目的.....否則即令他的結論完全是錯的，也不能稱他為騙子或無賴。我舉尼·亞·莫洛佐夫這麼一個作者為例吧。我讀了他輝煌的著

作《在雷雨和暴風雨中的新發現》和《耶穌傳》（共7卷）。莫洛佐夫寫道，由「具有真才實學」的科學家們支持的理論，如果有他這樣的論據，那麼一定會看成是出色的、言之有據的理論……他這個說法完全是正確的。可是他的結論卻完全是荒謬的。他說：凡是王國——埃及王國、羅馬王國和以色列王國——都一樣。他把耶穌同偉大的巴錫裡奧斯⁵³混為一談，把朱利葉斯·愷撒同康斯坦丁·費洛爾混為一談，他認為古代的耶路撒冷就是龐貝⁵⁴，猶太人純粹是意大利人的後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一切能不能接受？我不打算接受，但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莫洛佐夫是騙子或無賴。可以說，莫洛佐夫收集了像勃朗峰那麼高的一大堆事實，但可以拿出像喜馬拉雅山那麼高的一大堆事實來反駁他。就我對達爾文主義所抱的深刻信念和所持的態度而言，也完全可能說出諸如此類的話來。達爾文和達爾文主義者確實收集了像勃朗峰那麼高的一大堆同他們觀點一致的事實，但博覽群書之後，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有著像喜馬拉雅山那麼高的一大堆事實同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不相協調一致，而且這座山還在不斷增高……

緊接著他又寫道：

……人們可能說，達爾文主義畢竟得出了理智的結論，而莫洛佐夫得出的是愚蠢的結論……然而並非莫洛佐夫所有的著作都導致荒謬的結論。化學家們高度評價了莫洛佐夫的《物質結構的週期表》一書。他在這部著作中，預感到了零點群、同位素和其他一些東西。他無疑是個非常有天賦的人，但他一生的特殊情況，只允許他發展天賦中一個方面——非凡的想像力，而按我看，他的批判思維並未得到充分的發展。怎麼辦？接受還是拒絕莫洛佐夫的觀點？我認為兩

者都不足取，應當採取第三種辦法：利用它作為建立批判性的認識論的資料.....可以批判奇熱夫斯基，研究他的結論，並指出這些結論毫無價值.....這就說明了奇熱夫斯基的觀點是錯誤的（如同莫洛佐夫的觀點是錯誤的一樣），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有權利稱他為騙子。我還認為您否定奇熱夫斯基是出自一般的、我們通常稱之為「方法論」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我完全是您的反對者。精密科學的歷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信仰「占星術影響」，也就是持天體對地面現象產生作用的觀點的人（包括哥白尼、開普勒和牛頓）同完全否定這種觀點的人（其中最傑出的是伽利略）之間的鬥爭史。古典星相家們認為可以用簡單的辦法來決定個別人的命運，這他們是錯了；他們的反對者們則咬牙切齒地忍痛接受了萬有引力的占星術原則，但極力「不讓」它繼續發展。最近幾年，「占星術原則」似乎在進攻，提出磁暴、太陽光輪同傳染病很可能有關聯。但傳染病是由細菌引起的啊！這是千真萬確的。不過讓我們來回想一下佩滕科弗同科赫⁵⁵的爭論：為了推翻科赫的假設，佩滕科弗喝了一試管的霍亂桿菌，結果竟然平安無事。是否佩滕科弗因此就把科赫的假設給推翻了？.....

他耐心地、以各種事實和例子來不斷提高學術道德的水準。人們有時聽從他，有時同他爭論，有時生他的氣，但人們需要的恰恰是他在道德方面的嚴格要求。此外，我還有這麼一種感覺，人們需要有人去批評指責他們。

柳比歇夫利用每次機會去尋求真心誠意和擺事實講道理的論爭，他要求雙方都能容忍不同的意見。他屬於那麼一種罕見的人，當人們同這種人爭論時，感到很愉快。當他開始同強有力的對手爭論時，他力求透徹地理解對方正確的一面。

真正的科學家和真理的探索者，從來沒有絕對的信念（這裡說的是有爭論的那些知識領域），他總是不斷地用新的論據來試圖取得對方的同意，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他覺得在對方面前有什麼值得自傲的優越性，也不是出自虛榮心，而首先是為了檢驗自己的信念。因而一直到他確信自己確已理解了對方全部的論據，確信對方並非基於極為客觀的材料，而是由於這種或那種偏見而持這些觀點，因而，進一步的爭論已屬無益，直到這個時候，他才停止爭論……筆者只有在能用與對方同等的說服力來陳述對方意見，並能補充自己的意見來說明對方偏見的根源時，才能停止激烈的爭論。

這些論爭的守則，就其嚴格程度而言，就其一絲不苟的精神而言，幾乎可以同決鬥的規則相媲美。

如果今後有朝一日要從柳比歇夫的各種著作和信札中摘出有關倫理道德的語錄，那就可以彙集成一部道德、生活和行為的守則大全——不能說這是一套完整的道德倫理學說，但至少是一個內容豐富的道德綱領，獨特而準確。「正派人」的概念不大能使柳比歇夫感到滿足，僅就這一點來說，柳比歇夫的道德綱領就夠獨特的了。在他眼裡，「正派人」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準相當於「集體水準」的人。他的要求不同——他要求真正的道德，也就是說，要求一個人能獨立地提高自我修養以提高道德水準，要求一個人不是把遵守道德準則看成墨守成規，而是把它看成一種克制和提高自我修養的過程。他明白，這樣的人永遠是很少的，但其人數總是能保證人類在道德方面的進步。

對他來說，克裡緬基·阿爾卡基耶維奇·季米裡亞澤夫是科學家的典範。為什麼他選中了季米裡亞澤夫呢？這完全不是由於柳比歇夫羨

慕他學術方面的某些成就和他研究考察的能力，首先是由於季米裡亞澤夫的道德品質。他倒沒有專門去研究回憶錄之類的資料，他個人也並不認識季米裡亞澤夫，他只能在閱讀季米裡亞澤夫著作的過程中判斷這個人。在季米裡亞澤夫的學術著作中到底有哪些精神品質吸引了柳比歇夫？（1）忠於純科學事業；（2）意識到一個科學家對人民和社會的職責。

很多人認為這兩種品質不能兼備。

……一些科學家取了第一部分，於是躲進了象牙塔中，並認為他們有權忽視時代的要求，同時，這些科學家總是把真正純理論的科學同微不足道的探求、同毫無用處的科學混淆在一起。另一些科學家表示（往往只在口頭上）自己打算為人民和社會服務，準備僅僅從事實踐，實際上，他們既不促使純科學向前發展，也不推動實踐活動。季米裡亞澤夫在其名副其實的代表作《路易·巴斯德》一書中，給這些科學界的投機分子們一個出色的回擊。

這部卓越的傳記還向我們揭示了季米裡亞澤夫個性中另一個傑出的方面：他不把科學家的學術成就同世界觀混為一談。誰都知道，巴斯德是篤信宗教的天主教徒，而季米裡亞澤夫則是一個有戰鬥精神的無神論者，但在一場論戰中，某些唯物論者單憑感情，站到了巴斯德的對立面一方去，季米裡亞澤夫卻堅決地站到了巴斯德一邊。

在他崇敬的每一個科學家——卡爾·馮·伯爾、法布爾、哥白尼——身上，他總是把道德因素放在第一位。任何時候都不是籠統、抽象的道德，而總是某些具體的道德品質，某些實在的和積極的心靈特徵，激起柳比歇夫無限的欽佩。

他一貫利用可能的機會給自己的朋友們——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貝克列米捨夫和亞歷山大·加夫利洛維奇·古爾維奇——以應有的讚揚，這是頗令人感動的。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莫漢達斯·甘地也使他肅然起敬。

在他緊張的精神生活中，他崇敬的英雄們、他喜愛的人、他的表率都在不斷變換。仔細去考察這種變化，該是很有意思的事。對於柳比歇夫，任何時候都不能說他已「成為」怎樣一個人，他永遠正在「逐步成為」怎樣一個人。他一直在探索，一直在變化，他總是重新考慮，不斷提高對自己和理想的要求。

時間統計法幫助了他，或者是迫使他……

要點

·除了時間統計法，柳比歇夫還按照自己的身體特點擬定了幾條守則。如：不接受緊急的任務，累了就去休息，每天睡10個小時覺等。即使他的身體不大好，工作強度又很大，他依然長壽並健康。

·柳比歇夫嚴格地篩選自己的日程活動：避免串門和慶祝活動，但堅持寫信。並且每個月都制訂寫信計劃，把所有收到的信進行編號。

·他回信的原則是：緊急的書信立即答覆，其他的暫緩回復；在寫重要著作時，除緊急事件外，一切信件都暫時擱置。

第十五章 成為時間的朋友

他不期待別人的讚揚，他學會了自己對自己做出公正的評價。時間統計法提供了客觀的指標，能說明他的情況。他在1963年驕傲地記下了2006小時30分鐘的工作記錄，這是他的最高紀錄。平均每天5小時29分鐘。而戰前，每天大約4小時40分鐘！他清楚地瞭解這些數字的真正價值，他給自己規定了定額，他拿著秒錶監視著自己，他自己獎勵自己，自己懲罰自己。

簡樸生活：超過最低必需品限度的東西，他都不 要

不一定把他當成一個如何如何的利他主義者。他雖然花費了很多時間在書信上，但書信也替他節約了時間。精裝成冊的書信副本同他的讀書札記並排擺在書架上——柳比歇夫經常從中取得自己著作的題目。有時，幾乎把整封書信都搬進了著作中。時間統計法幫助他利用幾十年來積攢的全部浩瀚的材料。

在時間統計法的作用之下，儘管周圍有一些事件發生，他的生活仍能保持對科學家非常必要和非常有益的平穩性。時間統計法有節奏地，以節拍器那種無休止的方式，嘀嗒嘀嗒地計算著一年年，一月月，不讓人忘記時間在飛逝。

時間統計法為他創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它——他的時間統計法，使他如此繁忙，以致他很容易忽視很多日常飲食起居方面的不利條件。它使他輕鬆地、寬宏大度地去忍受人們所做的一些蠢事以及公務中的例行公事和雜亂無章，而不去同人惱氣。因此他心神安寧、神經健全。

他需要的東西極有限：有一個放書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有一個寧靜安謐的工作環境就夠了。當然，寧靜安謐這一個要求不算低。在我們的時代，寧靜安謐是奇貨。不過柳比歇夫需要的寧靜安謐是最簡樸的一種——只要保持安靜和擺脫緊張任務就是了。他從不去追求寬敞的住宅、別墅、汽車、名畫和富麗堂皇的傢俱——也就是某些人夢寐以求的排場和愜意的生活，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他們心目中的寧靜安謐的概念。

他經常有機會獲得這些舒適的條件，倒也不必特別費什麼勁。譬如說，也不必做什麼讓步。不時，有一些較高的學術方面的職務空缺。很可能，微微使點勁，他就可以晉陞……但他不要這些東西。超過最低必需品限度的東西，他都不要。倒不是他故作清高，他就是不需要很多大家公認必需的東西。他在學術界的一些同行們擁有豪華的住宅、成套的陳設、精緻的裝飾品，甚至他們那裡的每一個門把手都嘔盡了人們的心血。他要看到這一切，肯定會驚訝地重複某位哲學家的一句話：「竟有這麼多我不需要的東西呀！」

這就是自由。他無拘無束，但他周圍的人，他的親人們卻由於他擁有這種自由而感到苦惱。他周圍的人是普通人，他們不能滿足於他認為已經足夠了的那點子物質條件。他經常沒有空暇，他像童話中那個老在那兒磨啊、磨啊，不斷磨出鹽來的小石磨……沒完沒了地工作，這使他們很痛苦。

保持獨立的考驗

人們把他當作怪物。他也不拒絕這一稱呼。蘇格拉底也曾被人當作怪物，順便說說，這完全符合蘇格拉底性格的本質。柳比歇夫懂得，一旦獨樹一幟，就不可能很快得到人們的理解。無怪乎奧斯卡·王爾德⁵⁶說過：「當人們馬上同意我的意見時，我就覺得我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柳比歇夫不久前因其新奇而加以捍衛的真相，第二天已成為平凡無奇的了。科學的真相必須不斷更新。對他來說，科學是以懷疑始，以深信不疑終。哲學同樣也是如此。

他的生活並不能算是禁慾主義的，一切看起來都很平常。他進行體育鍛煉，他游泳、散步，他很想買一架新的打字機。他的需求是最一般的：稱之為「家」的那個地方，看起來樸素無華。只有親友們知道，在這種簡樸後面，多少機會——在莫斯科、在列寧格勒……工作的機會——被錯過了。

他意識到，這種種是為得到自由，為能夠保持獨立而必須付出的代價。糟糕的是，除了他本人，他最親近的人和心愛的人，也不得不和他一起付出代價。

此外，還有一些方面要他付出代價。他的時間統計法雖然蘊藏著巨大的潛在效率，但產量不高，也就是著作出版得並不多……

每次，他都需要做出抉擇。要麼，迎合科學雜誌、編輯部的要求：寫得不致引起抗議，不去招惹別人，不去否定那些占統治地位的觀點。他尊重自己的對手，他並不想惹是生非，他只想爭論。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當遷就迎合。如果要引起辯論，他就得採取一定的策略。

反對大多數生物學家擁護的學說，一個人對付大量被公認為泰斗的人物，就要求有耐心和明智的步驟。在某些地方退讓，在某些地方給予應有的回擊……這裡倒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要知道他不僅提出一個新的公式，還需要進行駁斥和否定，所以他應當善於說服別人接受他的見解。

要麼，不管別人，我行我素地發表自己進化論的觀點，不同對方爭執，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也不去考慮自己的想法能否取勝，只考慮如何去論證自己的想法。始終不渝地忠於自己選擇的時間統計法，也就是遵循預定的計劃，一步一步地去做。寫作時，就好像沒有什麼人的激情和自尊心，根本不去注意這個院士關於羅·費歇是怎麼說的，那個院士又為什麼獲得了獎金……

他終於選擇了後一種方案。這個方案決非沒有一點問題，因此他在出版方面遭到了種種刁難。有時他甚至很多年默默無聞。

大家忘記了他。有人打聽：「他現在在哪兒？還活著嗎？」「是呀，就是那個當初看起來挺有前途的柳比歇夫到哪兒去了？」「似乎在一個什麼小地方執教。」潦倒外省的教授不在少數：他們有時候做了點事，後來就毫無作為地消失了，有時在誰也不看的地方刊物和論文集上發表些文章。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站住腳跟的……

不能認為這種情況沒有讓他感到絲毫痛苦。蟄居外省，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是一件危險而毫無指望的事。當代科學的發展日新月異，昨天的明星，今天已難以回想起來了。這不同於文學，文學家可以不同別人競爭，慢慢地寫，還可以寫好了，束之高閣，備而不用。固然在科學領域也可以這麼做，然而非常危險——一切很快就過時了。在17世紀，開普勒可以安慰自己說：「……我寫書是為了給人讀的，現在讀還是將來讀，不都一樣嗎？它可以等上幾百年，要知道，連上帝也等了6000年才等到了理解他工作意義的人。」

把寫出來的東西束之高閣是不愉快的。實際上在每次開始寫作時，他都苦於抉擇。似乎一切都已決定了，但魔鬼一再來誘惑他。這些魔鬼都很聰明，都是合乎時代要求的。它們並不用裸體的蕩婦來引誘他，不在他面前咕嘟咕嘟地斟酒、嘩啦嘩啦地撥弄金幣。它們知道它們是在同什麼人打交道。長長的、油墨未干的書頁校樣簌簌作響，散發出好聞的油墨香味，精裝書光滑的書脊閃閃發光，上面壓出作者金光燦燦的姓名。書頁輕聲說道：「你本來可以做到的，你本來……」不是為了榮譽，絕對不是，只是為了事業的利益。

而每一次成功都能鞏固地位、聲望，這些反過來又使他成為編委會、學術委員會的委員、通訊院士，這些又使他能更自由地出版著作，宣傳自己的生物學思想，並支持自己年輕的擁護者。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再也不能這樣無所作為下去了……在我們的時代，難道還在私人書信中宣揚科學的真相的嗎？這是中世紀的人幹的事！難道他真的期望後代對他的手稿產生興趣，指望時間不把他的著作貶得一錢不值？

時間統計法的標尺

古代的人用祈禱來驅逐魔鬼。柳比歇夫緊緊攥住自己的時間統計法不放，時間統計法起著畫十字的作用。他的時間統計法能使人發現屬於未來的那一點點材料。這樣，他過去發表在外省刊物上的舊作總算沒有落到無聲無息的下場。它們越來越多地被人引用，終於有那麼一天，在國外被轉載了，各地開始源源不絕地來索取單行本。大量的需求讓他引以為榮。另一篇論文又是這樣，這就是指標。

人們突然發覺，這位高傲的人，這位苦行僧和利他主義者，原來也是有正常的功名心的。他不是愛好虛榮，而是有功名心，這兩者是迥然不同的。赫羅洛斯特拉特⁵⁷愛好虛榮，開普勒有功名心。再說，柳比歇夫發現赫羅洛斯特拉特還不算是沽名釣譽者中最為突出的例子：

.....為了自己的「成就」（他燒掉了神廟，終於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名垂千古），他貢獻出自己的生命。大量沽名釣譽的人把自己的成就建立在巨大的、用人屍壘成的金字塔上，危害性要比他大得多。

他不期待別人的讚揚，他學會了自己對自己做出公正的評價。時間統計法提供了客觀的指標，能說明他的情況。他在1963年驕傲地記下了2006小時30分鐘的工作記錄，這是他的最高紀錄。平均每天5小時29分鐘。而戰前，每天大約4小時40分鐘！他清楚地瞭解這些數字的真正價值，他給自己規定了定額，他拿著秒錶監視著自己，他自己獎勵自己，自己懲罰自己。

.....你是你自己最高的審判者；

你對自己勞動的估價會比任何人都嚴格，

你滿意自己的勞動嗎？苛求的藝術家。

他所進行的審判比任何其他的審判都要嚴格，因為他根據記載下來的事實進行審判，每次都仔細地進行調查。

在這樣的審判中，某些壞事突然變成了好事，惡言相向、仗勢欺人之徒竟變成了行善積德之人。

柳比歇夫驚歎道：「善哉！英明的長官，你斷送了我可能取得的光輝前程！」

至高的尺度不是我們所能理解，

是由創世主向達官貴人授意！

藏在這嘲諷的假面具下，他實際上對一切做如此安排也確實感到滿意。他不但善於利用時間的下腳料供自己做有益的事，還善於把命運給他下的絆子變成好事。不管他被派到哪裡，也不管住在哪裡，他總是生活得問心無愧，總是極端緊張地生活。外省嗎？那更好，可以有更多時間工作和思索，那裡環境更安靜，在那裡身體更健康……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能找到好處。他既不妥協，也不期待恩賜——他的時間統計法本身就是提高人的積極性的一種號召。

有人有這樣的天性：他們所待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地軸轉動的地方。他們從事的工作，就是最為重要和最為必要的工作。

一天足足工作五個半小時。一年到頭，持之以恆！難道這還不算成就！這可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

這是什麼？是對自己心滿意足嗎？是妄自尊大嗎？不，不，這是實現本人願望的一種幸福。一個不斷實現自己願望，並為自己的願望生活的人，能給人們帶來最大的利益.....由此產生了對自己而不是對別人——對別人我們都會，首先應當是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他寫的東西像是為自己寫的，他用自己的東西衡量自己。大部分名目繁多的論文都是為別人而寫。從事寫作是為了教導別人，而不是為了理解自己在內心進行自我教育。我認識一些作家，他們從未從自己所寫的東西中做出任何針對自己的結論。他們堅持的東西，同他們本人沒有任何關係。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當他們的書遭到反對時，他們就趕緊去捍衛它。教育的是別人，要求別人去思考，號召別人去行善.....作者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如何也不願把自己的論斷用於自己身上，他認為自己有權把自己同別人區分開來。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有益的，他為自己思想的正確性負責，而不是為他的思想是否同自己的生活和諧一致負責。兩者相符或相悖，這並不重要，誰也管不著，重要的是自己才華橫溢。有才華或是沒有才華——一切正是圍繞著這一點轉動（最多也不過如此）。至於這個才華橫溢的人自己信奉什麼，他本人的道德如何，他是否遵循自己所號召的一切——這是次要的。

暫時一切都還好說。

因為還沒有碰到那麼一個人，他對別人的要求和對自己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等到有那麼一個人的時候，我們馬上就會感到和諧一致的優越性了。所以當我們在科學家、哲學家、作家、思想家和教導別人如何生活的人中找到具有崇高道德品質的範例時，我們是何等喜悅！俄國文化史上這樣優秀的人物特別多——有弗拉基米爾·維爾南茨基、列夫·托爾斯泰、弗拉基米爾·柯羅連科、尼古拉·瓦維洛夫、華西裡·蘇霍姆林斯基、伊戈爾·塔姆⁵⁸.....

我們帶著一種非常特殊的感情閱讀艾伯特·施維采爾的《文化和倫理》一書。施維采爾正是以自己畢生的功勳贏得了向我們心靈發出號召的權利。

如果每個人都能知道自己能幹些什麼

對於有才華的人，我們總是在各方面給予寬宥。

柳比歇夫是屬於不願利用人們對他的優待和寬容的那種富有才華的人。他的日記和書信，記載了他半個多世紀以來為形成自己的個性在精神方面所做的努力。

這樣的自我修養在許多人看來是沒有必要的，甚至令人憤慨。最普遍的是，大部分人認為首先應當是環境和社會作用於人，社會有責任培養人的個性，使個體的個性臻於完善，並對個人的個性提出要求等，所以大部分人順其自然，不對自己提要求。

柳比歇夫卻不然，他自己對自己提出要求，自己監督自己，自己監視自己，自己向自己匯報。

是不是向自己匯報？僅僅向自己匯報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試圖弄明白主宰柳比歇夫的那種感情。這種感情多半是感到有天賦的生命是無價之寶：不僅生命只有一次，不可復得，而且生命中的每一天也同樣具有這種只有一次、不可復得的性質。

不管多麼奇怪，他的純理性竟產生了熱情，由於他的條理性，生活的奇跡每天層出不窮，令人吃驚。他的時間統計法好似使這種神奇性不斷翻新，令人難以習慣。

大多數人不想試著超越自己可能性的極限；他們一輩子也不想試著瞭解他們能幹些什麼，不能幹些什麼。他們不知道，什麼是他們力所不能及的。這種審慎穩妥在科學界是最可悲的。一個科學家按照自己的能力挑選任務，結果獲得了榮譽，聲名大噪，他不會犯錯誤。他

的著作清單挑不出毛病，沒有人有過異議；他的工作始終是卓有成效的；他一旦著手一份工作，一定幹到底。但就在這張長長的著作清單後面，就是那張未寫的和未做的清單——就在這未寫的和未做的清單裡面，在未犯的錯誤中間，在迴避了的冒險甚至羞辱中間，可能就隱藏著真正偉大的發現。在這裡隱藏著自我發現，那是可以肯定的。活了一輩子，連自己——自己應當是你最親近和最熱愛的人——都不瞭解，真是遺憾……

在這個意義上，柳比歇夫檢驗了自己。他不是根據自己的能力去衡量任務，而是根據任務去衡量能力。他認為，有一種精神上的義務，要比保持心靈上的安全感好。

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有句話：「決定人的精神品質的，不是他的行為本身，而是他的意圖。」過去我不瞭解這個想法，也沒有接受它。

柳比歇夫有很多事沒有來得及做——沒有搞出成果，但對我來說，主要的是他想做的事，他的意圖。他這個人精神上的吸引力正是來自他的意圖。

柳比歇夫通過他獨創的時間統計法做了研究和試驗：試驗在寫、讀、聽、工作、思索等各方面，他到底能幹多少，怎麼幹？他不讓自己負擔過重，力不勝任；他總是循著他能力的邊緣前進，他對自己能力的掂量愈來愈精確。這是一條永不停頓的自我認識的道路。他為什麼這樣做？是為了自我修養，是為了最大限度地自我獻身，還是為了大顯身手？

如果每個人都能知道自己能幹些什麼，那生活會變得多麼美好！因為每個人的能力都比他自己感覺到的大得多。他會變得比自己想像的更為勇敢，他會變得更堅韌、更有力、更能適應環境。在列寧格勒

被圍那一年的飢餓的冬天，人的心靈的奇跡，我們見得多了。正是心靈的奇跡，首先是心靈的奇跡，讓那些虛弱不堪、備嘗艱辛的肉體，以其心靈的堅毅和力量，令人驚歎不已。在理論上，連醫學都無法想像人的機體能吃那麼多的苦。人同鋼鐵一樣，同導體一樣，同混凝土一樣，有其容許的負荷極限。可是人們突然發現，這個極限是可以超越的，人可以不靠體力活著——體力已經用完，人已經精疲力竭，但人還可以繼續活著，繼續活動，靠的不是醫學上所說的那種力氣，靠的是對祖國的熱愛、對敵人的滿腔仇恨。在被圍困的時間裡，死並不令人吃驚——死是理所當然的——令人吃驚的是生命力：我們清除戰壕中的積雪，運送彈藥，作戰。

戰時的英雄主義自當例外，但在平時，不是也有會突然精神煥發、非比尋常的時刻嗎？力量也不知從哪兒來的，如泉湧至，頭腦變得敏銳了，想像力十分活躍……這種幸福的、如醉如癡的狀態，在作家稱之為靈感，在運動員名為巔峰狀態，在科學家則叫作開竅；這種情況每個人都有——有些人不常有，另一些人經常有。人超越了自己，超越了他平常的能力和極限，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發生的，重要的正是這一點。這麼說，這是可能的。既然能有一次，那麼為什麼不能有兩次，不能每天都這樣呢？

要點

- 大量的書信為柳比歇夫節省了時間，他經常把書信的內容直接搬進著作中，或者從中找到文章的題目。

- 柳比歇夫通過時間統計法不斷研究：自己在寫、讀、聽、工作、思索等各方面到底能做多少。他找到自己能力的極限，不讓自己負擔過重，又充分發揮所有潛能。

第十六章 超越自己的可能

柳比歇夫並沒有建樹豐功偉績，可他建樹的要比功績的意義更為重大——那就是過得很好的一生。

他為什麼有那麼多時間

超越自己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以柳比歇夫為例來判斷，不僅在緊急的情況下，而且在所有的情況下，人都可以超越通常的可能性來工作。

對於人的潛力，研究得還很不夠。

我考慮這一個問題和考慮自己的一生，還是第一次。我力求從第三者的立場來考慮自己，把我作為本書讀者來考慮，因為這樣好像顯得輕鬆一點。

作者深信，人們將來不會理解為什麼20世紀末的人這麼不善於生活，這麼不善於使用自己的機體，甚至還不如自己的祖先。

隨著對柳比歇夫文檔的研究不斷深入，作者情不自禁地回顧了自己——結果深信，他幾乎以「低於自己」一倍的效率在生活。這是可悲的，但是作者至今還對自己的工作能力感到滿意。

其他方面且不談，在繁忙這一點上，作者這一代人也好，較年輕的幾代人也好，都並未顧惜自己。白天上工廠，晚上上大學；他們又是函授生，又是夜校學生，又是校外考生⁵⁹；他們勤勤懇懇、毫無保留地使出自己渾身的勁頭。

但只要作者不帶任何情緒對比一下事實，那他就能看得很清楚，柳比歇夫在這同樣的50年中，比作者多讀了多少書，多去了多少次劇場，多聽了多少場音樂，多寫了多少東西，多幹了多少事。與此同時，他對周圍發生的一切，要比作者理解的好得多，領悟的深得多。

在這一意義上，完全可以把加繆⁶⁰的「生活就是透闢地理解」這句話應用到柳比歇夫身上。

瀏覽柳比歇夫的書信、札記，作者明白了，他，就是作者，考慮得多麼少，而且懶于思索。他懂得了，勤勤懇懇地工作、熱情地工作，這還不算善於工作。他還明白了，一個好的方法可能比熱情更為重要。

然而作者是不是在別的什麼地方用了更多的時間，是不是他娛樂的時間比較多，或者沉湎於嗜癖的時間比較多，或者陶醉於大自然中的時間比較多？

如果真的這樣，倒也罷了！不難證實，我們這部書的主人公不但睡得多，不開夜車，他還經常從事體育活動，至於領略山河景色那就更別提了。他對生活的樂趣，享受得要比我們多得多。

因此作者找不到任何「然而」作為借口。

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作者打算把一切歸結為柳比歇夫的才華和這種才華的優越性。天哪，可並沒有賦予才華以額外的時間……這裡才華也幫不上忙。可能性最大的倒不如說是時間統計法在這裡起了作用。

小小的時間統計法變成了生活的方法。採用這種方法的結果，柳比歇夫的時間多了一倍。這些時間是從哪兒來的？這是個謎。

作者不由自主地對自己同時間的關係做一番深思。時間都到哪兒去了呢？溜走了——去向不明，作者似乎生活得少於自己的年齡。有能量守恆律，有質量守恆律——為什麼就沒有時間守恆律呢？為什麼時間會無影無蹤地從人類生活中消失了呢？

想到這個被大自然所疏忽的問題，作者感到，這失蹤的時間肯定在什麼地方存在著——作為對我們的譴責，作為我們的罪孽而存在著。

本書主人公完美無缺這一點就是對他的一種譴責。奇怪的是本書主人公在生活中是如此美好，與人交往時是如此令人愉快，但塑造出來卻並不好。他的一生非常合乎道德標準，所以顯然有作者沒有看透之處。要麼沒有寫出來，要麼寫得過分了。

有一個新聞工作者對作者說：

「事情不會是這樣的。看起來，您的主人公是一個只有一種，然而是一種非常熾烈的激情的人。這麼說，他就不是一個和諧的人。這就是怪事了：我們希望人全面和諧地發展，然而大家都知道，對於哺育人類的歷史，最可愛的卻是一生專注於一種激情的人……」

他深信，「一種，然而是一種非常熾烈的激情」會排除和諧的發展。激情妨礙人全面發展——這倒是一個令人愜意的處世秘訣。最好沒有激情，這樣要保險得多。什麼都要有一點，似乎一切為人稱道的志趣的總和就構成了和諧，似乎真的存在著沒有激情的和諧一致的人。

可能這對某些人很相宜，很符合願望，但不知為什麼作者經常想起一些偉大的作家、科學家、藝術家的範例——他們既是學識淵博的人，又是具有熾烈激情的人，有時甚至過了頭。

然而他們的激情不是狂熱，而是忘我的熱情，是創造性精神不可或缺的熱情。

柳比歇夫既全面發展，又具有他必不可少的、獨一無二的激情。兩者之間的不協調並沒有妨礙他——他放棄了青年時代立下的禁慾主

義的誓言，這是有道理的。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向作者闡明時間的問題。

柳比歇夫的方法可以節約原有的時間，但不能增加額外的時間。關鍵甚至也不在量上：柳比歇夫的時間獲得了不同的質，並且可以認為他同時間之神建立了某種私人的關係。

對待時間的態度

時間的奇特早就使作者感興趣了。例如，作者發現，幼小的孩子對時間的流逝感覺很遲鈍。人對時間的感覺，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步強烈、逐步敏銳起來，到了老年——有生之年愈少，時間的腳步聲就聽得愈真。

作者記起來，有一次飛越大洋去美國，飛機上有一個婦女坐在作者身旁織毛衣。毛衣針在她手中丁丁作響，一針一針地織著，這情景使作者愣住了。在洲際時間裡流逝著我們祖母們古老的、毫無變化的時間：爐台上昏昏欲睡的小雞不時吱吱地叫，聖像前點著小油燈，散發著麵包的香味，一切都同作者童年時代在科什基諾村時的情景一模一樣。但此刻波音噴氣式飛機的機翼正掠過亞速爾群島……作者也記起了戰爭、坦克的三合安全玻璃、瞄準鏡上的十字準星以及那突然停頓的時間。時間顯然同心臟同時停止不動了——射擊聲寂靜了，坦克的馬達聲中斷了，在白熱化的戰爭間歇裡，只有坦克瞄準鏡上的十字準星在顫動，德寇的自動推進炮在迫近……

這樣，時間有時過得慢一些，有時過得快一些，有時它停了下來，呆住不動。有的時候，特別敏銳地感到時間的步伐，這時，時間飛馳而去，快得只來得及讓人驚呼一聲，連回顧一下都來不及。不知不覺一天又過去了，人重新又站在鏡子前刮起臉來；而有時，時間卻躑躅不前，慢得像被黏住了一樣，簡直叫人難受。它忽然被拉長了，幾分鐘的時間拉成一條望不到頭的線。這種種到底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是時間擠得滿滿的緣故嗎？真是這個原因嗎？到底什麼時候你覺察不到時間的流逝——是在有很多工作的時候呢，還是在休息的時候？排滿了工作的日子可以飛馳而去，也可以過得慢慢吞吞，慢得叫

你精疲力竭。不，這裡的情況千變萬化，因此似乎搞不大清楚。時間的速度到底取決於什麼，什麼在催促它，什麼在阻礙它？

大多數人對時間都持有自己的態度，各不相同，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對時間的態度格外與眾不同。他的時間不是取得成就的時間，他擺脫了趕過別人，奪取第一，超越什麼，獲得什麼……的願望。他熱愛時間，珍惜時間，不是把它當作工具，而是把它看成是進行創造的條件。他對時間十分虔敬，同時又體貼入微，他認為時間對人們如何使用它並不是無所謂的。時間不是個物理概念，不是時針的轉動，而像是個道德概念。在他看來，浪費時間就好比奪走科學研究的時間，就好比濫用和搶走自己的服務對象的時間。他堅信，時間是最寶貴的財富，不能亂用到惱氣上，不能亂用到競爭角逐或滿足虛榮心上。在他看來，對待時間的態度是個道德問題。

一個人在什麼地方有權使用自己一生的時間，在什麼地方無權濫用。在這方面，柳比歇夫為自己定出了一些道德上的禁令，規定了使用時間的道德限度。

能幹的人和有計劃的人使人感到他們是時間的主人。

對時間的崇拜，愈來愈甚。對時間的崇拜成了精幹地抓工作和善於生活的標誌。時鐘的指針在催促，人們向前飛奔，唯恐落後。人應當熟悉情況，達到時代的水平，與時代相適應。人犧牲自己的自由，把時間當神明來供奉。被支配的不是時間，而是人。時間在發號施令。飛奔的時間疾馳而去……

時間之神嚴格地計算著成就：出版了多少著作，做了哪些答辯，獲得了什麼學位，得到提升了沒有，到哪些地方去過……在這意義上，柳比歇夫不依附於時間，也不害怕時間。

當作者隨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時間時，他體驗到一種解放的幸福。這樣的時間充滿了光明和安寧。一天全部的時間都吸取著最重要和最本質的東西，如同綠葉的表層吸收陽光一般。

考察柳比歇夫的時間統計法，作者似乎透過放大鏡看到了時間。一分鐘走近了；一分鐘緊接著一分鐘綿綿不斷地流逝，但它不是毫無變化、對一切漠不關心地流逝，它關心人們是否重視它，它盡量延長自己，呈現出凝結塊和空洞體。結構有著某種含義，在作者眼前如同出現了思想的溪流，時間變得可以理解了……

對宇宙時間或世界時間——作者不敢妄加判斷；至於人類的時間，他深信人可以學會去感覺，甚至能聽到它潺潺的流逝聲。

時間彎過來，首尾相接，接成一個圓圈，過去的時間追上並超過了現在的時間，如同在愛麗絲漫遊的奇境中一樣。在作者眼前，不斷流過浪費了的、溜走了的時間，流過了白白荒廢的、曾經充滿了青春活力和希望的年華——這是空虛的、被吮乾了的時間的殘骸。

遺憾的是紀實散文不允許作者提供形形色色幻想性畫面。否則作者想展示我們內部潛在的大量時間，展示被柳比歇夫發現的豐富的時間的寶藏——蘊藏在人們日常生活深處的未被挖掘的時間。

如果像古希臘人通常所做的那樣把時間比作激流，那麼柳比歇夫就是這激流中的發電站和聯動發電機。在深邃的某處，有一台渦輪機在轉動，力求用葉片擋住在我們中間通過的激流。正是在這方面——而且也僅僅在這方面——柳比歇夫具有機械性。

可以把每一個人當作時間的消費者，他將時間分別用於各種思想、感情和工作。雖然只用了不大的一部分，其餘的時間都丟掉了，但大家仍然習以為常地認為時間不夠，時間太少。

柳比歇夫的時間永遠是夠用的。時間不會不夠用——時間不管多少，總夠用來做一件事。柳比歇夫的時間就有這種特徵，而且不僅他的時間是這樣，他的全部生活福利也是這樣：年輕時，柳比歇夫生活條件很優越，到了老年，他只領一份微薄的養老金，但不論什麼時候，他都無意追求大量物質福利，他要的只是必需品，而必需品對他來說永遠是夠用的，大家都知道，既然夠用，就不會嫌少。必需品好就好在它同水、麵包、陽光、桌子……一樣不會引起煩惱，不會成為累贅，不會惹人討厭。

除了事業方面的一切，柳比歇夫不但尊重和熱愛現在，而且尊重和熱愛過去。他強烈地感覺到時間與時間之間的聯繫，強烈地感覺到契訶夫在短篇小說《大學生》中寫得那麼精彩的那條看不見的鏈子。柳比歇夫對每一個學術問題的思想淵源和思想發展都極感興趣，甚至為之激動不已。他反覆思索、重新估價「體驗到的一切」，有時，甚至被歷史的繩索捆住手腳。為什麼過去能對柳比歇夫起到那麼大的作用？作者不瞭解。因此他援引了契訶夫卓越的短篇小說。契訶夫在這個短篇小說中也是沒有做任何解釋，然而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

柳比歇夫從自己主要的工作中擠出時間來寫了對教師、學校、雙親、A.古爾維奇、K.達維多夫、M.伊薩耶夫……的詳盡的回憶錄，其中充滿了對過去的衷心感激，可是現在的人們卻如此輕易地為了將來而忘記過去。

作者對柳比歇夫的時間不勝欣賞、羨慕，對此作者並不感到羞愧。柳比歇夫的時間如水晶般晶瑩、勻稱，使人為之驚歎不已。幾十年的時間可以一眼看透，在漫長的歲月裡，沒有絲毫模糊之處，也沒有禁區。在我們的時代能這樣坦率地度過一生——這是罕見的事。

過得很好的一生

作者深信，理智和人道同時打交道日益成為緊急的事情。這不僅是一個節約時間的技術性問題，這個問題能幫助人瞭解自己工作的意義。時間同礦藏、森林、湖泊一樣，是全民的財產。人們可以合理地利用時間，也可以把它毀掉。打發時間是很容易的：聊天、睡覺、徒勞的等待、追求時髦、喝酒，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遲早我們的學校會給孩子們開一門「時間利用」課。作者堅信，從小就應該培養孩子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對時間的熱愛。應該教孩子們怎樣珍惜時間，怎樣找時間，怎樣取得時間。

最主要的是要讓他們學會匯報使用時間的狀況。柳比歇夫自然是個理想的楷模……

不，作者根本沒有被自己的主人公迷住。作者知道主人公有很多弱點和偏見，他對人文科學的忽視和他對美學所持的傲慢態度實在令人氣憤，他對普希金的意見，尤其令人難以忍受，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滿情緒也是如此。一言以蔽之，什麼缺點他都有。但任何人，甚至最偉大的人，也不應當從近處去觀察，並深入細緻地觀察他的愛好、習性。

誰一旦同柳比歇夫接觸過，總是願意再去找他。作者不僅根據自己親身的體會，而且根據許多人的體會指出這一點，而有這樣體會的人，其數量還在不斷增加。

當然，傷心的是如今自己已經年華虛度，因而已無法利用柳比歇夫的經驗了。甚至沒必要去計算，到底曾無緣無故白白浪費了多少歲月和多少其他別的東西。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又應當有亡羊補牢的精

神：既然任何一段時間都不算短，那就說明同時間建立一種新的相互關係在任何時候都不算晚。不管一個人的殘年還剩多少，不管這一念頭是在人生的哪一個階段產生的！甚至可以說，時間剩得愈少，就愈應當更明智地使用時間。

但就是現在，當如此簡單明瞭地得出了必需的結論之後，作者不知為何還是不願意改正過來。總覺得這麼做沒意思。作者似乎有點不知好歹地思索起這麼一個問題：他的主人公能不能算真正的英雄？他的一生能不能算作英勇的一生？他值得人們去做做嗎？這一切是否真是這樣.....

英雄主義——這是璀璨奪目的光——也是無比努力的燦爛光輝。人的行為遠遠超出一般職責的範圍，才能成為英雄。英雄建樹功勳的時候，準備為了真理、為了他人、為了祖國犧牲一切，他冒著喪失一切，乃至生命的風險。所有這一切，柳比歇夫都不具備。

他有的不是奪目的光，而是忍耐，是從不放鬆的自我檢查。他日復一日地提高對自己要求的標準，毫不留情。但應當說這也是功勳啊，否則什麼才算功勳呢？！功勳一年比一年更加積極努力。他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不讓自己喘一口氣，也不期待榮譽和聲望。他只對自己提要求，而且他對自己提的要求愈多，他對自己的缺陷也就看得愈清楚。這是從容不迫，每日每時建樹起來的功勳，也是最難建樹的一種功勳。他每天都在加強自我監督和自我檢查。但還有人在懷疑，此處用「功勳」兩字是否恰當，既然這麼做給人以滿足，那還算什麼功勳？

總有這樣一些愛懷疑的人。老天哪，雖然並沒有適合這種人的肥沃土壤，但這樣的人永遠不會絕跡。懷疑者提出的問題使作者感到為難，接著作者自己也開始有點懷疑了。作者想，既然這個十字架絲毫沒有使柳比歇夫感到沉重，反而使他感到滿足，而且他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會丟掉這個十字架，這還算什麼十字架呢？！他為了自己的時間統計法又做出了什麼犧牲呢？他什麼也沒有犧牲掉。他並未由於時間統計法而吃到什麼苦頭或碰到什麼危險。不管他的堅韌不拔、他的勤勤懇懇和他的頑強意志多麼有成效，也沒有必要推崇備至——這豈非同誇獎小孩子食慾旺盛一樣嗎？

這麼一考慮就必然得出結論：如果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使自己感到幸福，那他的作為就不可能算什麼功勳；既然不是功勳，那就沒有什麼值得號召的；至於說到為科學服務，那實際上不是他為科學服務，而是科學為他服務……

作者並不是馬上就要懂，這正是柳比歇夫自己的觀點，因而一切就更令人驚奇了。因為柳比歇夫要在每日每時的自我克制中感到幸福，這需要具備怎樣一種精神力量啊？我們雖然從遠處觀察這一不斷昇華的精神，但也仍然禁不住產生欣喜和羨慕之感，禁不住對這人類精神的巨大能量深表敬佩。

柳比歇夫並沒有建樹豐功偉績，可他建樹的要比功績的意義更為重大——那就是過得很好的一生。這一生的奇特性和神秘性就在於，柳比歇夫把一生中的特殊現象看成自然現象，也許這確實是自然的理性生活。可以說，一個人珍惜每一秒鐘，並使每一秒鐘都過得很有意義，同時又把這看成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現象，那是最為困難的一件事。他受之於科學的要比他給予科學的多，這一點對他來說，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在我們看來卻是奇特的，因為他似乎已盡其所能，把一切都獻給了科學。

他的一生中還蘊藏著許多這一類的秘密和奇特的東西，老實說，作者對此並不是都能認清和理解的。比方說，作者就無法從中歸納出若干條建議，雖然本書即將結束，作者仍然不能做出最後的結論，給讀者出點什麼主意。作者希望讀者不用作者出主意，因為作者自己思

緒萬千，深切地感謝本書的主人公，因為他讓作者對自己一生的發展產生了懷疑。

要點

- 時間統計法是一種讓人超越自身可能性的方法，柳比歇夫的時間比別人多了一倍。

- 時間統計法可以節約時間，但不能增加額外的時間。它的關鍵不在時間的數量上，而在於時間的質量。

附錄 與時間統計法無關——談《奇特的一生》的創作⁶¹

鄧蜀平 譯

許多實幹的、有遠大抱負的年輕人對柳比歇夫這一十分明智的、合理的時間統計法很感興趣，指望這個方法帶來成效。這種願望裡有某種不對頭的東西，某種柳比歇夫所沒有的——就像我已在小說中一再強調過的，與柳比歇夫、與他的時間統計法毫無關係的東西。

問題就在於：一個人只有向自己提出遠大目標時，這個時間統計法才能成立。

紀實散文越來越引起我的興趣，創作使我厭煩了。您知道，創作歸根結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實的，情節歸根結底全是想出來的。這一切似乎很自然，是文學中大家通用的方法，但這近來卻使我煩躁，我開始尋找另外的方法來描寫生活中最本質的東西。

目前人們對紀實文學，即所謂「寫生」文學談得很多。對作家來說，譬如，對紀實文學作家來說，「研究生活」是什麼意思？我總算走運，因為我同科學家們有長期的接觸，對學者們的生活也比較熟悉，因此有依據。一般對研究生活的簡單理解是：打定主意要寫什麼，再動手去瞭解情況，這就有與新聞業混同的危險。新聞業有其自身的範圍和規律，與藝術並不完全相同，它反映現實的方法與文藝所固有的反映現實的方法也不一樣。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作品過分用事實約束作家，事實成了難以擺脫的負擔。

我很重視寫紀實散文前的調查階段。作為一個作家，只有通過調查，才能深入理解收集的事實，發現時間這一主題。研究事實，一直追溯到產生矛盾的起因，從這裡，即從主人公心靈深處去看待事實，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這裡也有文學必不可少的創作，但不是憑臆想，而是憑深刻理解和觀察。我可能說得不夠確切，因為有許多東西對我來說也是新事物。

紀實散文往往會遇到材料成災的問題。周圍事實那麼多，一本本的筆記本都記滿了，使你陷入事實的汪洋大海，來不及深入研究，也無法站開一點，從遠處統觀全貌。紀實散文與特寫有區別，當然二者之間的界限是相對的，但總有界限。紀實散文既要是散文，又要是文學，這一點很重要。紀實散文的情節不是設計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而應當從材料內部去發現，去挖掘。主人公也不能簡單地加以臨摹……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最使人感興趣的自然還是現實生活本身。我甚至可以說得更過分一些：使人最感興趣的是生活的非典型性——即個別性。譬如柳比歇夫，一個不典型的人，完全是獨一無二的，是一個罕見現象，一個奇跡、一件怪事。可是他的生活是司空見慣、普普通通的，難道不是這樣嗎？（可能實際上他的生活也是不尋常的，只是我沒有發現它有任何不尋常的地方。）在他的生活中找不到獨特的、驚人的、某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絕無僅有的東西。既然這些在生活中都沒有，那麼，您也曉得，文學家是不會對它感興趣的。可是當你一旦捕捉到，認識到它的奇特性時，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以深思，雖然它未必就一定能成為文學寫作的對象……

我這本寫柳比歇夫的中篇小說裡就提到了幾位這類不平凡的人物。我曾經有過一種至今仍未放棄的想法：寫一本帶註釋的小說，更確切地說，是帶補充小說的小說，在補充小說裡我可以詳細地介紹施萬維奇、伊萬諾夫、斯米爾諾夫、季摩菲耶夫·耶索夫斯基、費洛諾夫這樣一些我的小說中為全面襯托柳比歇夫形象而提到的人。

就拿昆蟲學家施萬維奇來說吧，他曾在列寧格勒大學工作，終生研究蝴蝶翅膀上的花紋。他遭到嘲笑。許多人——特別是在頭幾個五年計劃期間——認為他幹的不是正事，對國民經濟、植物栽培等均無益處。蝴蝶翅膀的花紋——十足脫離實際的煩瑣哲學！抽象科學！對此施萬維奇能說什麼呢？他一句話也答不上來。想必他也曾因從事一種被眾人認為古怪的事業而深感痛苦吧。

可是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了。列寧格勒被圍困。軍事目標必須被偽裝起來。這時發現蝴蝶翅膀花紋構圖原則乃是迷彩偽裝最理想的自然界結構，是迷彩偽裝的科學根據。當時所有人對迷彩偽裝只有十分模糊的概念，於是吸收施萬維奇參加列寧格勒軍事目標的偽裝工作。而他為保衛列寧格勒免於空中威脅做了十分重要、十分有益的事情。

我在小說第十一章提到施萬維奇的時候，絲毫未談及這些情節，我只指出這位科學家的主要品質，提到奧赫金公墓裡施萬維奇墓上刻有一個他心愛的蝴蝶翅膀的花紋。

再拿畫家費洛諾夫來說，我在第十四章中比較詳細地談到了他。至於他的姐姐，葉芙多基婭·格列波娃，我在小說中只說了她的名字。然而正是她，在列寧格勒被圍困期間救出了他兄弟的卓越畫幅，親自背出了這些畫——總共有400幅，她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怎麼竟能做到這一點。我問到她這件事的時候，她說：「達尼伊爾·阿列克桑德羅維奇，您知道，我現在確實不記得我當時是怎麼把這些畫拿到俄羅斯博物館的幾個接收站去的。」但保存下來的收據證明，這批交付保管的

畫正是從她手中接收下來的。她自己挨餓，已瀕臨死亡，卻親自把這批畫背到博物館，交付保管。是她保全了這批畫，因為費洛諾夫一家的住房被炸毀了。

這本關於柳比歇夫的小說的文獻性，說來也真奇怪，關鍵在於理解材料。我面前的文獻多得不可勝數，堆積如山。我從全部材料中只挑選了一個主題，我必須充分理解這個主題。我必須不僅弄懂許多日記本的意思和內容，不僅理解他為什麼寫日記，這對他的生活有什麼影響，而且要理解他的目標。應當指出，柳比歇夫同任何一個人一樣，自然不會把主要的東西都寫下來。但是他對自己思考得很多——在這一點上，他也是與眾不同的。一個人幾乎從來不會用筆寫的方式去思索他內心珍藏的理想。但是作家卻應當以主人公內心珍藏的理想為出發點。必須這樣做，否則就無法理解材料。

好吧，就算這是機器，是唯理主義，是對生活實行監督，把生活變成詳細的計劃條規，可是，如果這樣做，就能保持甚至增加自己的自由呢？如果這樣做，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就能變得更加豐富呢？如果這一套詳細計劃，強制自己的時間統計法能帶來更廣闊的天地、幻想和更豐富的感情呢？如果是這樣，那麼時間統計法是不是站得住腳呢？因為這樣做的結果，人就能變得更美，更有趣，他的生活也會變得更加充實。柳比歇夫在這個世界上能活多久，這是他不能決定的，可是他，作為一個人，能有充分價值地生活多少時間，卻正是由他決定的。他也做到了最充分地施展才能，最大限度地發展自己身上的寶貴品質，吸引著人們，使人們傾慕他。這也是他的時間統計法的結果，如果你同意這樣看的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那麼一切關於人是機器的論調還有什麼意義呢？！到底我們怕什麼呢？我想，是怕給自己規定紀律。當然嘍，沒有這個時間統計法生活會更輕鬆一些，就像一般說來某個階段不學習會更輕

鬆；不提高自己，不為別人做事也更輕鬆。但是，如果不去考慮輕鬆不輕鬆的問題，而考慮需要不需要的問題，那麼人必然會嚴肅地考慮如何利用他一天、一個月、一年中荒廢掉的那些時間。假如能把一個人在生產中、生活中花費掉的時間擺出來給他看，他一定會發現他白白地、糊里糊塗地浪費掉的那一部分生命，並為其大吃一驚。

我收到的讀者來信中也有這樣的反映：「這太可怕了，一個令人噁心的典型，難以容忍！」「當然，這是一個絕無僅有的人，可是上帝保佑，可別讓我也這樣生活。」還有：「給自己每分鐘規定詳細計劃，這等於失去一切自由，這等於自我摧殘，把自己變成機器。」

從這類來信的各式各樣的意見中，我們感覺到的不僅僅是對時間統計法的恐懼心理，還有要設法抹黑時間統計法的企圖。然而這種反應有時反而使我高興，因為它證明：人們讀完這本書以後，感覺到了他們並不是像應該的那樣生活，所以竭力為自己辯護，竭力迴避正視事實，於是慌忙抵抗，說時間統計法束縛自由了，壓制激情了，有把人變成機器的危險了等。

時間統計法不會扼殺靈感，因為人適應它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性。每個人能做的，比他所做的要多得多，我們還沒有達到一個人能夠達到的限度的一半。人的精神潛力在很大程度上還原封未動。當看到人們不善於有價值、有意義地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全部天賦時，我們是很痛心的。我們現在利用自己，就如利用自然界一樣缺乏計算，我們使用自己的辦法不科學。看來這個問題還沒有全部展開在人們、全人類面前，但這個問題正在展開，因為每個人都是最寶貴的財富。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這是每個人和全人類面臨的日益增加的任務。

從讀者來信中，特別是從讀者口頭髮表的意見中，我漸漸發現了一種令我驚訝、令我不安的東西。許多實幹的、有遠大抱負的年輕人

對柳比歇夫這一十分明智的、合理的時間統計法很感興趣，指望這個方法帶來成效。這種願望裡有某種不對頭的東西，某種柳比歇夫所沒有的——就像我已在小說中一再強調過的，與柳比歇夫、與他的時間統計法毫無關係的東西。

問題就在於：一個人只有向自己提出遠大目標時，這個時間統計法才能成立，因為我在小說中已談到，柳比歇夫利用時間的方法是與對待時間的道德態度不可分的。命運賦予我們的生活、時間是無價之寶，應當利用它來不僅給自己（絕不是只給自己），而且給別人，給周圍的人們帶來最大的利益。方法，利用時間的方法，都必須與生活的目標和意義，與道德品質協調一致。

看來應當由每個人自己來制訂自己的時間使用法，但不管怎樣都應當深思一下自己的生活在怎樣度過。上面說的那些來信中還一再說明：很多人都想換個樣子生活，想生活得更明智、更合理，但是不知該怎麼辦。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使這種要求日益尖銳。譬如說，在用最新科學技術裝備的生產單位裡，每個人的時間被擠得滿滿的，達到了飽和程度，生活、勞動組織得十分合理，有時每一分鐘的利用都是經過周密考慮的。可是人一走出大門，這一切也就完了——他又掉進了時間的大海。工作時他節約每秒鐘，而現在呢，他為買啤酒排隊達好幾個小時之久，或者閒扯老半天，或者呆頭呆腦、漫不經心地看電視。

如何能做得更多、更快、更好——如果只用這種觀點對待時間統計法，那麼得到的好處也只是附帶的。這自然也很好，但還不夠。關鍵在於一個人希望從生活中得到什麼。也有人的生活目標是把道德意義完全排除，這樣的人使用時間統計法就會損人利己，不知會搞出什麼名堂來。這如同武器一樣，看掌握在誰手裡。

這就是使我這個作者感到不安的問題。後來我又想：珍惜時間的方法也可能有助於培養道德感情，本來對待任何事物、任何作品，人們總是免不了會從個人立場，從狹隘的利己主義立場來對待。

[1]法國作家大仲馬的長篇小說，又譯《俠隱記》或《三劍客》。

[2]《父與子》的主人公。

[3]費爾馬（1601—1665），法國數學家，解析幾何的創始人之一。

[4]貝色麥（1813—1898），英國設計師，酸性轉爐吹煉法的發明者之一。

[5]托馬斯（1850—1885），英國冶金學家，鹼性轉爐煉鋼法的發明者。

[6]現在的聖彼得堡。

[7]列索夫斯基（1900—？），蘇聯生物學家。蘭道（1908—1969），蘇聯物理學家。史克洛夫斯基（1893—1984），蘇聯作家。

[8]夏爾頓（1881—1955），法國古生物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施遼丁格（1887—？），德國理論物理學家。

[9]意為業餘愛好者或半瓶子醋。

[10]洛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國數學家。

[11]又譯「史懷哲」。

[12]費歇（1890—1962），英國數學家。

[13]貝爾格（1876—1950），蘇聯地理學家、生物學家。瓦維洛夫（1887—1943），蘇聯生物遺傳學家、植物栽培學家和地理學家。貝克列米捨夫（1890—1962），蘇聯動物學家、寄生蟲學家。

[14]賽納卡，古羅馬的哲學家、政治家、作家。

[15]施利曼（1822—1890），又譯「謝裡曼」，德國考古學家。

[16]維爾南茨基（1863—1945），蘇聯地球化學家和礦物學家。

[17]奧加廖夫（1813—1877），俄國貴族革命家、思想家、政論家和詩人。克魯泡特金（1842—1921），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地理學家。梅契尼科夫（1845—1916），俄國生物學家。貝赫捷列夫（1857—1927），俄國精神病學家。

[18]虎克（1635—1703），英國自然科學家。

[19]俄國革命民主主義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麼辦？》的主人公。

[20]巴爾扎克的小說，《驢皮記》的主人公在賭博輸得精光之後，從古玩鋪主人處得到一張能使他的願望得以實現的具有魔力的驢皮。這張驢皮隨著主人公各種願望的逐一實現而不斷縮小；當驢皮消失的時候，主人公的生命也隨之結束。

[21]這詞出自拉丁文gilarus——快樂的意思。

[22]意為多嘴多舌。

[23]這個詞出自希臘文nomados——遊牧的意思。

[24]鮑克耳（1821—1862），英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

[25]意為撈一把。

[26]柳比歇夫的小名。

[27]柳比歇夫這個姓氏的原意為好心腸。

[28]玻爾（1885—1962），現代丹麥物理學家。

[29]庫爾恰托夫（1902—1960），蘇聯物理學家，「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1904—1967），美國物理學家，「原子彈之父」。

[30]希羅多德（約公元前480年—約公元前425年），古希臘歷史學家。

[31]從我，是進入悲慘之城的道路；從我，是進入永恆的痛苦的道路；從我，是走進永劫的人群的道路。正義感動了我的至高的造物主；神聖的權力，至尊的智慧以及本初的愛把我造成。在我之前，沒有創造的東西，只有永恆的事物；而我永存；你們走進這裡的，把一切希望都捐棄吧。——作者注。中譯文引自朱維基譯《神曲·地獄篇》，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頁。

[32]13世紀初，羅馬教皇建立了名叫多米尼克派的僧團，主持宗教裁判所，竭力鎮壓反天主教、反封建制度的起義。

[33]蒂托·李維（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古羅馬著名歷史學家。

[34]1991年改名為聖彼得堡國立大學。

[35]林耐（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學家，創立動植物界人為分類法。

[36]卡·馮·伯爾（1792—1876），俄國博物學家。

[37]儒勒·凡爾納（1828—1905），法國科學幻想小說作家。

- [38] 林德曼（1844—1928），俄國科學家、農業和林業昆蟲學創始人之一。
- [39] 伏倫卓夫（1782—1856），俄國陸軍元帥，普希金曾在他手下做過事。
- [40] 15世紀俄國諾夫戈羅德城總管鮑列茨基之妻，曾領導貴族集團反對把俄羅斯土地並歸莫斯科管轄。
- [41] 開普勒（1571—1630），德國天文學家。
- [42] 瓦格納（1813—1883），德國作曲家。
- [43] 阿蒙德森（1872—1928），挪威極地旅行家和探險家。
- [44] 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莫洛佐夫（1854—1946），俄國革命家、科學家和詩人。
- [45] 維爾高爾（1902—1991），法國作家和藝術家。
- [46] 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蘇聯詩人和翻譯家。
- [47] 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以力大聞名。
- [48] 法布爾（1823—1915），法國昆蟲學家。
- [49] 克雷洛夫（1769—1844），俄國寓言作家。
- [50] 法國天文學家拉普拉斯（1749—1827）於1796年提出的關於太陽系起源的一種學說。
- [51] 帕烏斯托夫斯基（1892—1963），蘇聯作家。
- [52] 神話傳說中的基督教「聖人」。
- [53] 4世紀羅馬帝國希臘正教的著名主教。
- [54] 意大利地名。
- [55] 佩滕科弗（1818—1901），德國衛生學家。科赫（1843—1910），德國科學家、微生物學創始人之一。
- [56] 王爾德（1856—1900），英國唯美主義作家。
- [57] 赫羅洛斯特拉特是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他為了要出名，於公元前356年縱火焚燒古代藝術的優秀作品——以弗所的阿泰密斯神廟。
- [58] 蘇霍姆林斯基（1918—1970），蘇聯教育家。塔姆（1895—1971），蘇聯物理學家。

[59]不在學校學習，只參加考試的學生。

[60]加繆（1913—1960），法國作家和哲學家。

[61]《奇特的一生》在蘇聯《阿芙樂爾》雜誌1974年第一、二期發表後，在讀者中引起了一些爭論。蘇聯《文學問題》雜誌1975年第一期刊登了評論家維·德米特裡耶夫同小說作者、蘇聯科學界人士座談這一小說的發言。現將格拉寧的發言摘要譯出，以《與時間統計法無關——談〈奇特的一生〉的創作》為題附在這裡，供讀者參考。

[62]艾勒（1707—1783），瑞士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家。高斯（1777—1855），德國數學家。赫爾姆霍茨（1821—1894），德國自然科學家。